捷克斯洛伐克史纲

〔捷〕弗郎蒂舍克·卡夫卡著

叶　　林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目　录

第一章
历史的发端

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历史发展的自然背景是今天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三个地区，即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斯洛伐克。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属于两个非常接近的西斯拉夫民族。捷克人的故乡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最古老的捷克编年史学家科斯马斯在十二世纪初叶，关于波希米亚地区曾经这样写道："四周环绕着群山，形成这个国家的疆界，乍看起来宛若由一个连亘不断的山脉包围起来……说来奇怪，这里四周全无河川流入境内，而所有大小溪流完全注入一条大河，名为'拉贝河'（即易北河），经此而注入北海，由此可见全境位置之高。"摩拉维亚横亘于波希米亚和斯洛伐克之间，摩拉维亚的东、北、西三方也都环绕着丛山峻岭。只有南疆是开阔的摩拉瓦河沿岸的多瑙盆地，这里（哈纳一带）是欧洲最肥沃的地区之一。

斯洛伐克人的国家斯洛伐克位于东陲，一直延伸到乌克兰民族居住的地区。喀尔巴阡山脉横贯境内，全境只有一小部分属于多瑙河平原盆地。

由于地理位置的优越，自从太古以来，就有人在这些地区定居下来。斯堪的纳维亚冰河止于北境的群山之外；阿尔卑斯冰河终于休马伐山脉（这个山脉后来成为捷克—巴伐利亚的边界）。在冰河泛滥之前，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成为动物避难的场所，这里的草木生长茂盛。早在旧石器时代初期，约当公元前200000年，原始人类在这里找到了理想的猎场和安全的匿身处所。多种多样的动物吸引了成群结队漂泊的人们长期逗留在这里，群居的人数越来越多。猎人栖居在这里的区域，要比中欧其他地带更为广阔。摩拉维亚成为旧石器时代晚期一个历史上有名的国度（公元前70000—10000年），正是在这里，当时中欧最大的人类栖居地，发现了著名的普尔舍罗瓦的普尔舍摩斯蒂人（Předmosti u Přerova）。这些定居者后来成为出色的熟练猎人，他们甚至能猎取例如猛犸象一类的巨兽，随后进化成为在生理学上更高级类型的一种人（Homo sapiens fossilis）。也

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最早的艺术表现形式：妇女和猛犸象的小型雕像，显然是专门为作某种偶像崇拜时用的(根据猛犸象猎者在南摩拉维亚的居留地的名称而命名为“维斯托尼蔡的维纳斯神”)。

当冰河自边境山麓永久退出之后，当地典型的动物例如猛犸象、犀牛和驯鹿也就随之绝迹，这一带地方便覆盖了森林，虽然森林覆被的区域逐渐显著减少，但这些地方仍以多森林著称。由于自然条件的变更，因而迫使居民改觅比较狩猎更为可靠的生活方式，这些居民的狩猎对象早已换成一些新的品种，例如鹿、野猪和熊。他们改为从事畜牧和农业。在目前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这一地带，人类历史上的这一巨变是在新石器时期(约当公元前3000年)。作为捷克全境特征的更高度的农业耕作水平由此奠定了基础，而斯拉夫人的农作制度也随着这个路线发展起来。新石器时代这里的农业人口是属于被称为多瑙人的大群体，多瑙人的文化在第涅伯河—维斯杜拉河地区的彩陶，和在中欧的旋体陶器[1]之中保存了下

① 旋体陶器系塑雕成螺旋形的一种陶器装饰品。

来。多瑙人可能是斯拉夫人最早的祖先。他们定居在这一带最肥沃的地区，形成邻里相望的一连串村落，他们的建筑是相当大的长方形木屋，墙壁采用具有氏族社会时期典型的柳条编织法。从供奉用的女神雕像可以看出当时尚处于母权制时代。在农业方面包括了各种主要谷物和豆类的栽培以及畜牧业，除此以外，某些家庭手工业例如陶业和粗布的纺织业已开始发展起来。在新石器时代的末期，东南方的人民对于彩陶传播于摩拉维亚方面起了强烈的影响。东南欧当时成了最进步的欧洲文化的中心。在地中海地区以及黑海沿岸出现了以后发展成为希腊文化盛世的初端。

约当公元前2000年，在捷克地方出现了矿石的冶炼，首先是炼铜。本地的矿床所在，当时尚无人知晓；矿砂和铜器都是从外边输入的，可见当时捷克同其他国土的贸易已经开始活跃起来，这又引起了以后的人口移动。由于畜牧业的地位日益重要，在工作中主要以男性为中心，因而为过渡到父权制开辟了途径。在这个时期，已经可以看出在氏族的各个成员之间财产分配不均的迹

象：各人获得的牲畜开始成为他们自己的财产。从考古学的发现上，清楚地说明了由于所有权而产生的社会差别。有许多坟墓十分简陋，但另外一些坟墓则修饰得十分豪华壮观。居住的情况也分为两等：较富足的居民的房屋建筑于山冈上，而较贫者则居住于平原与河谷。这时发生了各个氏族及部落之间最初的战争，最早的侵略者开始征服原来的定居者。

由于青铜是铜与锡的合金，而且是一种比黄铜更为有用的金属，因此青铜的发现，使捷克地方成为青铜时代（约当公元前 1400—1000 年）欧洲发展的先进地带，因为捷克境内的矿山（克鲁什涅山）盛产锡矿。原铜是从埃及和中亚细亚经由爱琴地区输入捷克的。青铜器皿的生产量加大起来，因为它们的质量高超，所以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技术水平的渐趋一致，使得过去一直过着单独生活的不同民族和部族的居民加速联合起来。

当青铜时代，在今天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境内包括三个不同的人种集团，即乌涅提采人（是根据布拉格以北的一个地名命名的，在这里曾经

发现了大量青铜器)、圆墓人和卢齐支人[1]，后者又叫做瓮葬人(他们把死者火化并将骨灰藏于瓮中)，他们在历史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青铜时代中期，他们定居于东北部地区，是由第涅伯河与维斯杜拉河之间的宽广地带大量迁徙过来的。他们完全是以农业为生的居民，因此与古老的新石器时代农业文化有着直接的联系。同时，“圆墓人”(这个名称的起因是由于他们喜欢在自己首领的墓穴上筑起巨大的圆墓，直到目前在南波希米亚还能看到这种坟墓)则从南德意志移人南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这部分人民主要以畜牧为业。

在不断的冲突当中，这些人种集团逐渐彼此混杂起来。在铁器时代(大约从公元前 1000 年至公元初期)，这种混杂的过程达到最高峰。捷克地方的铁矿非常丰富，而炼铁术的发明又使得铁器和兵器的大规模制造成为可能，这样就给手工业和农业生产带来了新的推动力。当时的人种集团从外形上看还有着显著的特征。卢齐支人逐渐发展成为最初的斯拉夫居民，圆墓人则变成历史上

---

① 由卢齐支地方而命名。

的凯尔特人或高卢人。凯尔特部落发展得较快，并形成了他们自己的“拉铁尼”文化①，曾经暂时压倒了原来的斯拉夫居民。在波希米亚，波伊人部落占居优势。古代地理学家对中欧国家特别重视，是由于有一个时期世界各国都感到由这个地区所带来的威胁，因此他们把捷克地方称为“波海姆”(Boiohemum)，意指“波伊人的国家”，这个名字的拉丁语形式“波希米亚”(Bohemia)一词，成为德语和拉丁语系的相应基本称谓。在摩拉维亚占统治地位的是凯尔特族的寇汀斯人部落（塔西佗这样称呼他们），他们统治的范围可能一直延伸到斯洛伐克。不久以后，凯尔特各部落由于进攻罗马帝国而名垂欧洲历史，这时他们统治了西欧相当大的一部分土地。由于捷克地方是成熟的凯尔特文化的一部分，这个事实对这里随后的发展起了有利的影响，因此这个时期有时被称为“捷克古代的黄金时期”。凯尔特人一系列的技术上的改进（铁犁铧、旋转磨以及其他等等），对于原始的斯拉夫居民农业发展方面起了进一步的推动

① 根据瑞士的拉铁尼居留地而命名。

作用。

城市的存在(所谓“凯尔特人城市”最著名的有柏伦附近的斯特拉多尼策),城市中由于使用货币的结果而促进了货物的交换，证明手工业和商业都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从各种迹象看来，大概在捷克土地上的凯尔特人已经达到了开始采用有组织的奴隶制阶段。

公元前一千纪末，凯尔特人的统治崩溃了。捷克地方遭到来自北方的日耳曼族的马科曼尼人和跨德人部落的侵犯，并把这块土地暂时吞并入马波德①帝国，但这仅只是一个短暂时期。

日耳曼各部落继续向南侵犯，有一个时期停留在斯洛伐克山地。在公元第一世纪的时候，捷克地方和斯洛伐克直接处于罗马帝国的势力范围，罗马帝国在图拉真皇帝时代(公元98—117年)开始修筑著名的“罗马防线”，这条防线的堡垒沿多瑙河流域一直延伸到巴尔干，卫戍据点深入捷克境内(最北端及于南摩拉维亚的穆索夫，位于多瑙河以北33英里的地方，其他据点在目前的布拉迪

① 马科曼亲王之子，系由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宫廷培养出来的。

斯拉发附近)。当地居民在这些据点同罗马文化发生了接触，特别是发生交易关系。斯洛伐克成为日耳曼人袭击罗马防线的基地之一，在公元166至180年之间，这种军事行动发展成为“马科曼之战”。在公元172年，由马克·奥勒略皇帝率领的罗马大军深入斯洛伐克展开反攻。这位罗马皇帝正是在这里，在赫朗河岸，由于胜利在握，在希腊写下了他的第二本哲学论文集：《沉思录》。罗马军团战将在特伦钦古堡的岩石上刻下的题词，至今犹可辨识，可以作为第二罗马军团远征的证明。

当罗马帝国同大量向南侵入捷克地方的日耳曼人进行斗争的时候，这里古老的农业社会正在发生变化，进入历史上的斯拉夫人时期，这种变化由于原居第涅伯河与维斯杜拉河之间的斯拉夫人的大量迁入而加强起来。在四世纪下半叶，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带来了匈奴人的数度入侵捷克地方，但并未能摧毁自古以来就居住在这里的斯拉夫人的牢固的统治。最早的编年史作家写下了传说故事，从这些故事中可以使人想起当时在捷克境内的许多部落（例如多德比和兹里恰尼部

落），以及他们的强固堡垒。这些部落的名称有的还保存在一些地名中。这是由于在部落之间的战争中，较弱的部落被征服，并被构成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的那些更强大的部落所吞并。

我们可以看到，在几个世纪里，这些部落的统一过程由于一些外来事件，主要说来就是在六世纪末和七世纪初多瑙河流域的阿瓦尔人的入侵而加速起来。阿瓦尔人蹂躏了斯洛伐克，但在捷克地方遭到了抵抗。在公元620年以后不久，这些部落当中掀起了一次暴动，暴动者立萨莫为王（根据有关这些事件的唯一史料，即弗莱德嘉的编年史所载，萨莫系一法兰克商人，但这个姓名显然是斯拉夫人的后裔）。阿瓦尔人的争夺霸权的野心被粉碎了，随后由一个巨大的部落同盟（还不是一个国家）建立起“萨莫帝国”。这个部落同盟变成十分强大：在同法兰克的达果巴王的一次战争中，最后在沃加斯提斯堡——这个地方的位置至今尚无从查明——经过三天的战斗，同盟完全击溃了法兰克帝国。“萨莫帝国”的中心可能在摩拉维亚。它的领域可能一直延伸到卢齐支塞尔维亚人的领土（在今天的萨克森境内）和上奥地利

——当时也是斯拉夫人的居留地。在公元658年萨莫卒后，关于他的“帝国”的命运便没有记载了。

第二章

大摩拉维亚帝国——最古老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国家

在萨莫死后直至九世纪中叶这一段历史的空白点是无法来填补的，至于就这一时期的政治事件来说,除了一些臆断的说法之外就无从知悉了。在这个国度里，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发展促成了封建制度的兴起。

从公元第一千纪中期前后起，斯拉夫人的家族制度瓦解了。土地仍旧是原始公社的共同财产，但交给个人耕种，收成也归个人支配。这种制度已经是土地逐渐过渡到私有制的一个阶段。部落首领运用他们的权势把最大块的肥美田地攫为己有，并强迫原来的居民即公社的自由成员为奴替他们工作。这样一来，就要在他们的周围布置武

力，这些兵力同时是为了保护他们不受外来部落攻击的力量。这样就奠定了封建国家兴起的基础。

史料中提到，在八世纪末叶捷克地方与查理大帝东征有关的事件。这个强悍的法兰克王对阿瓦尔人发动了多次的攻略，他的军队曾经数度通过捷克境地。考古学资料证明，在八世纪的时候，南摩拉维亚和西斯洛伐克在经济上发展得更为强大，因为在这里部落联合的过程比波希米亚要快些。从大片的墓地上就可以看出强烈的对照，统治阶级家族的坟墓奢侈豪华，而平民的坟地非常简陋，这说明当时已经奠定了阶级社会的基础。九世纪初叶基督教的初期发展，说明统治者如何急需寻求教会作为思想意识上的支持力量，因为教会告诉人们说，帝王的统治是出于“上帝的恩惠”。

在一些文件、编年史料和传说故事中都提到，大约在公元830年起的默伊米尔王朝统治下的大摩拉维亚帝国，它曾经把自己的势力延伸到尼特拉的普里比纳公爵统治下的西斯洛伐克公国。大摩拉维亚帝国的兴起不久就引起了同法兰克封建主之间的冲突。在846年，日耳曼人路易——查

理大帝之孙——远征摩拉维亚，推翻原来的统治者，并立腊斯提斯拉夫(846—870年)为君主。但不久腊斯提斯拉夫就摆脱了罗马—法兰克帝国的势力影响，并兼并了邻近的波希米亚和卢齐支斯拉夫人的土地(在现今的萨克森境内)。

东法兰克帝国(后来的德国)同保加利亚的波里斯王(汗)缔结了盟约。这些外交策略促使腊斯提斯拉夫不得不通好于拜占庭帝国，以求加强自己的地位，拜占庭帝国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强国。晚近在考古学方面所发现的材料证明，摩拉维亚帝国在很久以前就同拜占庭有了十分密切的文化和经济关系。两国的政治联盟是在拜占庭教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当时罗马和拜占庭之间业已发生剧烈的冲突，但还没有发展成为公开的分裂)。由于新教会把基督教传入捷克境内，因而加强了拜占庭的影响，统治阶级认为这个教会能比过去的教会更为有力，它能够在国内传播基督教，并用斯拉夫语举行礼拜。这个新的举动不仅是由于考虑到对外政策而决定的——削弱巴伐利亚教会，而且也考虑到国内政策：希望加速对国内人民进行基督教化，

从而加强君主的统治[①]。

在863年，君士坦丁（后来他使用了西里尔的名字）和美多德兄弟二人来到摩拉维亚，他们是从萨洛尼卡来的希腊人，他们都懂得斯拉夫语，并对教会问题富有经验。他们发明了一种特殊的斯拉夫字体（格拉果尔文字），并把一些最重要的祈祷文译成萨洛尼卡一带的斯拉夫语方言（古保加利亚语，语言学家称之为古斯拉夫语）。由于当时各种斯拉夫语言的差别很小，所以在摩拉维亚也完全能够看懂这种文字。

看来腊斯提斯拉夫似乎是由于倾心斯拉夫基督教会，所以他也打算加强对中欧的其他斯拉夫人部落的影响。根据当时有关圣西里尔的斯拉夫人的传说，他送致拜占庭的信息说："我们的人民已经拒绝信奉异教，并且已经遵守基督教的法律，但我们并没有教师能够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把基督

① 据最近的发掘工作，特别是在摩拉维亚的米库尔切蔡和斯塔腊-麦斯托（旧城区）两地进行的发掘（这些发掘材料尚在研究整理中），对于大摩拉维亚帝国的历史和文化方面可能获得新的知识。根据这些发现，远在西里尔和美多德到达之前，在这个国家的境内就已经有了从巴伐利亚传来的基督教会，可能即所谓爱尔兰-苏格兰教会。

教的真理传给我们，因此，在这一点上，其他国家就可能仿效我们的例子”。通过这种方式就体现了民族平等和各民族语言平等的大原则。在斯拉夫教会里正式使用民族语言做礼拜，使得广大的人民能够参与在当时具有最高文化价值的生活。不久以后，奥特福莱德·魏森堡向法兰克人介绍摩拉维亚的事例说：“为什么法兰克人害怕用法兰克语来颂赞上帝呢？”

在斯瓦托波勒克的统治下(870—894 年)，大摩拉维亚帝国的国力达到了鼎盛时代。它的疆域扩大到西里西亚的斯洛伐克人部落的领域，可能包括克拉科夫地区，以及后来成为匈牙利领土的一部分(潘诺尼亚)，这个地区也是斯拉夫人的居住区。这样一来便出现了一个强大的西斯拉夫人的国家。这里又是以美多德为首的大主教区的独立辖区，并使用经教皇裁可的斯拉夫语的祈祷文。诸侯兼主教韦列赫腊德的领地成为远近闻名的地方。虽然东法兰克的封建统治者及其同盟对大摩拉维亚帝国屡次进攻，可是并无成效。斯瓦托波勒克修改了他的先辈所拟订的国家外交政策。他不是谋求拜占庭帝国的支持，而是力求取得罗马

教廷的支持，后者在当时同法兰克帝国的关系不好。同教廷结盟所付出的代价是牺牲斯拉夫语祈祷文，因为教皇认为这是拜占庭政治野心的一个危险种子。美多德的门徒和信从者都被逐出国外，而在教堂的礼拜仪式中又开始使用拉丁文。可是斯拉夫语祈祷文的使用业已根深蒂固，不可能完全加以废除，这种祈祷文的使用在波希米亚一直维持到十一世纪。

斯瓦托波勒克死后，虽然他的名字在邻近各国，不管是日耳曼人、俄罗斯人，或是希腊人的脑子里，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十世纪，拜占庭皇帝和历史学家君士坦丁·波费洛詹尼托斯对他的英名备加颂扬），可是大摩拉维亚帝国却被国内各派势力所割据，至于这种分裂的原因，我们还不十分清楚。边疆地区开始脱离原来统一的国家结构。最后由于匈牙利部落的不断侵犯，并突入了多瑙河平原，结果造成国家的覆灭，在公元903—906年，大摩拉维亚帝国被消灭了，继之而起的是在波希米亚新兴的一个封建国家。

大摩拉维亚帝国是最古老的西斯拉夫人国家，组成这个国家的不仅包括波希米亚、摩拉维

亚和斯洛伐克的斯拉夫人，而且还有卢齐支的塞尔维亚人和波兰人(小波兰)，同时通过潘诺尼亚的斯拉夫人而与南斯拉夫人联系起来。这是第一个包括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国家。

在大摩拉维亚帝国出现了最古老的各种斯拉夫文化。斯拉夫语即旧教会斯拉夫语，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直至十一世纪末)成为所有斯拉夫人最老的通用书面语言，圣经和一些拜占庭文学著作曾经译成这种文字，还有许多传说故事和教会颂诗的原作也是用这种文字写的。这种语言的地位在当时为仅次于拉丁语和希腊语的第三种国际语言，由于采用它作为摩拉维亚的教会用语，这样就更加强了它的权威。斯拉夫字母的发明和它由原来的方言发展到文言的水平，这说明了斯拉夫文化尽管同拜占庭文化保有联系，可是却具有它的独立性。在语言上表现出这样的独立性是在别处找不到先例的。在随后的一个长时期里，拉丁语仍旧是欧洲其余地方的一种学术用语。在这种语言中并不带有特殊的民族特征。

大摩拉维亚帝国的覆没对斯拉夫人民的历史造成了悲惨的后果，由于匈牙利人的入侵，西南

两支的斯拉夫人陷入分裂的状况。

当摩拉维亚的斯拉夫教会瓦解(885年)之后，斯拉夫文化部分传播到波希米亚，特别是传播到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俄罗斯。在十世纪初期，保加利亚的斯拉夫文学异常发达，不久又创造了第二种斯拉夫语字体，即西里尔字体。南斯拉夫人至今仍然使用这种字体，俄罗斯字母就是由这种字体演变出来的。各种斯拉夫语之间的差异逐渐越来越大，其自然结果就是古斯拉夫语逐渐变成一种死的语言，也就是变成一种官方语言，首先是成为教会专用语，直到现在东正教会里仍然使用这种语言。

大摩拉维亚帝国是捷克国家和斯瓦托波勒克王国各种传统的来源：在一些史料中都把斯瓦托波勒克称为“君王”(rex)。捷克国成为摩拉维亚帝国的继承者，而摩拉维亚帝国的对外政策常常表现出侵略的野心。

第 三 章

捷克国家的起源

公元 895 年，波希米亚各部落从摩拉维亚帝国脱离出来，并投靠巴伐利亚的勒根斯堡教区当局，从那个时候起便成立了以波希米亚为中心的捷克国家。在这个时候，捷克人统治了居住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大多数其他部落。捷克人居住在本国的中部，以强固的布拉格城堡为他们的中心据点。于是捷克人的名称就变成这个国家的名称了，而且所有讲斯拉夫语的地区都这样称呼它。这个战无不胜的部落为首者是普什米塞家族，这个家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神话中的农夫普什米塞和女先知利布舍公主，编年史学家科斯马斯曾经记录了有关他们的民间传说故事（在斯美唐纳的歌剧《利布舍》中又赋予她以一种不朽的形象）。

普什米塞家族中第一个留下史料最多的是瓦茨拉夫（文采斯拉斯）亲王（在位时间为 921—929

年)。瓦茨拉夫是一个热心的基督教皈依者,他在争夺王位中被人暗杀了。天主教会一贯支持欧洲年轻的封建王朝, 支持的办法是赋予它们的重要成员以圣职, 正如同对待查理大帝、路易、斯蒂芬等人一样,现在也采取同样办法对待瓦茨拉夫。有许多关于他的生平轶事的传说故事不久就把他的名字传遍欧洲,众所周知的英文圣诞颂歌《贤王文采斯拉斯》可以作为明证。在丹麦、波兰、德意志、意大利和其他等地的一些教堂里供奉着圣文采斯拉斯,许多地方又使用文采斯拉斯作为教名,从西班牙和葡萄牙一直传播到南美洲(在阿根廷还很常见这个教名)。瓦茨拉夫死后不久,人们便根据当时的信仰习惯, 把他当作捍卫捷克独立和捷克民族的神灵。这样, 在整个中世纪, 瓦茨拉夫的肖像出现在象征捷克国家主权的标记上, 人们把他的肖像刻制在印信、钱币、军旗和圣瓦茨拉夫王冠上, 而颂赞他的颂诗载入了官定本教会圣诗里。

波列斯拉夫一世从他的兄弟瓦茨拉夫手里篡夺了王位, 在波列斯拉夫一世统治的时代(929—967 年), 发生了捷克同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激烈

冲突，后者想要把捷克国变为帝国的直属之列。捷克同强大的鄂图一世皇帝之间的这场残酷冲突延续了一十四年，以波列斯拉夫的失败而告终。在波列斯拉夫一世的统治下，完成了早期的普什米塞王国的领土扩张，它包括了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克拉科夫，可能还包括了西里西亚和卢齐支。可见王朝的版图几乎和大摩拉维亚帝国的领域一样。不久以后，捷克国家的形成最后大功告成，在这个国家里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教会组织，公元973年在布拉格成立了以波列斯拉夫二世（卒于999年）为首的主教区。

波列斯拉夫一、二世两代出现了初度跻于强国地位的捷克国家的极盛时代。虽然在捷克北方诸邻邦之中，德意志帝国征服了易北河流域的许多斯拉夫部落，可是捷克国依靠同东方强大的基辅国的友好关系，终于能以维护了自己的独立，抵御了德意志帝国的冒险的攻击。当时捷克国家强大的经济力量可以从它铸造大量银币（迪纳尔）用于活跃对外贸易，特别是同波罗的海沿岸各地的贸易上看得出来，在这些地方曾经发现了大量捷克迪纳尔银币。但是活跃的贸易也吸引了从东方

来的商人，他们来到了第一个外国慕名者称之为"白石之城的布拉格"。这位外国慕名者就是阿拉伯旅行家亚伯拉罕·伊本·雅各，他在十世纪中叶曾经访问过布拉格，他的言论一直留传到今天；按照他的说法，波希米亚是"所有北方诸国当中最美好的和粮食最丰裕的一个国家"。

十世纪的捷克国的文化生活是以摩拉维亚帝国的斯拉夫文化丰富遗产为基础的，这可以由具有高度水平的普什米塞宫廷文化看得出来(例如，瓦茨拉夫亲王能够读写拉丁文和希腊文)，这个宫廷的文化水平和当时欧洲许多王朝的低级水平比起来，有着显著的不同。这个时期是古老的斯拉夫文化在捷克地方繁荣发展的时期，但是有关这方面的材料却只有零星片断保留了下来。关于这方面最重要的材料就是十世纪一个本地作者所写的圣文采斯拉斯的斯拉夫语传说故事。流传很广的颂诗《主啊，怜悯我们吧！》大概就是产生于十世纪中叶，在整个中世纪的时代里，它都是作为一首捷克颂诗来歌唱的。在这个时代，捷克文化对波兰和匈牙利也起了强烈的影响。除了模仿拜占庭风格的斯拉夫文化之外，以别涅迪克汀修道院

为中心的罗马拉丁文化迅速发展起来，这种文化主要是在艺术方面。从布拉格城堡遗留下来的罗马式建筑遗迹上可以得到证明，特别是从著名的十世纪圣维图斯圆形大厅，以及华丽的金泥彩饰本《叶玛王妃法典》(叶玛王妃是波列斯拉夫二世的妻子)的风格上可以看得出来。

在十至十二世纪，残存下来的独立农民也过渡到农奴制。居民的生计基本上依靠成熟的农业制度，主要包括各种农作物和养畜业。从技术观点看来，与西欧和中欧其他国家的农作方法并没有什么两样。手工业生产仍旧与农业保持着密切关系，并没有多大重要性。农奴按照临时租佃制向封建主承佃土地，并把地里的收成交给封建主支配，后者随时都可以实行逐佃。此外，农奴还需要在地主的土地上执行劳役；他们要向王公缴纳赋税和向教会捐输。他们的个人自由是极为有限的。根据现有资料看来，反抗贵族的情况只限于一些微小的斗争。到十二世纪末，捷克贵族已经牢固地掌握了土地所有权。君主把地产交给贵族原来是作为一种暂时性采邑，作为他们在军队中和在国家行政机关中服务的报偿，现在已经牢

固地掌握在他们自己手里了。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捷克贵族分化为两个集团，即上层贵族(大领主)和下层贵族(骑士及小骑士)。从十三世纪起，很大一部分土地——除了君主的领地之外——转入了教会手里，特别是到了修道院手里，君主把大量土地慷慨地赠予教会，作为它们效力加强国家权力的报酬。从一开始，德意志人在教会封建主当中就拥有强大的势力。

包括世俗和僧侣(修道院长和教长)在内的贵族权势日益增长，因而削弱了君主的地位。君主越来越依赖贵族中的各个集团，特别是在越来越频繁的争夺王位的斗争中，这种情形就更为显著。贵族中的各个集团各自坚持从普什米塞王室里提出他们中意的王位候选人，这种情形简直有点象神圣罗马帝国的情况。

争夺王位的斗争其起因每每是由于一种旧习惯，那就是继承君主宝座的不是统治者的长子，而是传给王朝的最年长的成员(即年资最高的)。君主们往往企图推翻这种规定，使其有利于他们自己的后嗣；于是贵族们便认为这是他们扩张自己权力的好机会。由于这种混乱所引起的冲突使

得历代罗马皇帝有可能干预捷克国家的内部事务。十世纪至十三世纪的历史就是反抗侵略成性的德意志封建主企图征服捷克国家的无情斗争的长篇记录。可是，在胜负无常的长期交替过程中，德意志封建主并未能消灭捷克国家，只是他们时常迫使后者处于自己的藩属地位。捷克同罗马帝国之间的联系，由于历代罗马皇帝需要捷克君主帮助他们实现对外侵略政策，特别是在意大利方面的政策，因而给予他们以各种优惠权利。公爵弗拉第斯拉夫二世于1158年获得王号便是作为对他个人的册封。他的受封是由于他派遣捷克军队帮助红胡子腓特烈皇帝围攻米兰。捷克统治者的世袭国王称号首先是由普什米塞一世得自国王腓力①(1198年)的。普什米塞一世利用了神圣罗马帝国皇位继承的纠纷，于1212年经新选出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承认他的王号，王徽是“西西里金牛”。根据旧传统，捷克王获得一个新的权标——红地上面雄立的一只银狮——作为王权的标记。这个徽记经历一些微小的变更，一

---

① 德意志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译者

直沿用下来，现在仍旧作为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徽。

整个说来，捷克国除了在外交政策方面或多或少地给予神圣罗马帝国积极的支持以外，对它并没有其他的义务。在内政方面捷克是完全独立的：帝国的法规在这里并不适用，捷克国家有自己的货币，有其独立自主的领土和边防境界，如果当朝君主死去，捷克贵族可以自由选立新的统治者。从十三世纪起，捷克统治者在神圣罗马帝国方面享有一种重要的政治地位，因为他们在选立德意志新君的七个选帝侯当中居于首位。

在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嗣后的历史上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就是斯洛伐克不再是捷克国的一部分了。在十一世纪之初，斯洛伐克变成多民族的匈牙利国的一个单位，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1918年。结果使得斯洛伐克民族的发展大大受到了阻滞。匈牙利封建主来到斯洛伐克，并和斯洛伐克贵族混杂在一起，于是后者逐渐丧失了民族性。因此斯洛伐克民族文化和斯洛伐克语言就不能象在捷克地方那样得到有利的发展条件，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来支持。

从十一世纪起，在捷克地方的斯拉夫文化让

位给占优势的罗马拉丁文化。在这方面，除了记述地方圣哲的一些拉丁语传说故事之外，最大的成就乃是优秀的文学作品，科斯马斯（卒于1125年）用拉丁文写的《波希米亚编年史》，这是一部描述自原始神话时代一直到作者逝世的那一年为止的捷克历史的著作。至于用捷克文写的民间文学，就只有一些片断材料保存了下来，其中最重要的是《圣文采斯拉斯颂》，这是为纪念圣文采斯拉斯而作的，显然是十三世纪的作品。

罗马式建筑艺术的发展，特别是长方形教堂的风格，是这个时期的特征。其中最著名的是圣乔治教堂的两个高尖塔，它成为布拉格城空中轮廓的永久标志。兹诺伊莫城（在摩拉维亚）和日普城的罗马式圆形大厅，以及布拉格的四座圆形大厅及其他罗马式建筑物，都被保存下来了。除了教堂建筑之外，在王宫的边角楼堡和布拉格保存下来的一些古代建筑中，还可以看到罗马式风格。十二世纪的一位不知名的建筑师在布拉格的伏耳塔伐河上建成的第一座石桥——这座石桥被称作朱迪司桥——，可以证明其艺术手法，这座桥梁一直为布拉格城市的通商往来很好地服务了170

多年，直到十四世纪才改建成查理桥，这座大桥一直屹立到今天。罗马风格的雕刻只有一些不完整的作品保留了下来，例如，布拉格的圣乔治·巴西里察的三组浮雕。从捷克银币和王室玉玺的浮雕上，都可以看出工艺品的一般的高度艺术成就。捷克银币在当时欧洲铸造的所有银币当中是最漂亮的，这说明当时已有了最杰出的雕刻学派。

罗马风格的绘画保存下来的材料很少；其中比较杰出的有十二世纪兹诺伊莫的一座教堂里的优美壁画和一些金泥抄本的手稿。

第 四 章

作为一个中欧大国的捷克国

由于农业方法的改进，在十三世纪初叶，捷克进入了经济大发展的时代。牲畜的数目增长了，役畜的使用更加增进了，新的农具——例如铁犁——的使用越来越广，土地耕作的三区轮作制（把田地分为三个区段，分别轮作，一块春播，一块秋播，另一块休闲）逐渐推行起来，靠着开伐内地的森林，耕种面积扩大了。新获得的土地是由当地的农奴开垦出来的。但烧山伐林是一桩非常繁重的劳动，假使不让劳动者在这项工作中获得较多的直接利益便无法进行。贵族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由于他们答应把垦殖地交给开垦者世代承佃。于是在农奴和封建主之间在所谓永佃法（又叫做“德意志法”，因为它首先是对德意志移殖

者实行的，他们是从邻邦德意志国家约请前来，到边疆地区进行开垦的，这些地方的本地居民力量不够，不足以担此重任）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和比较自由的关系。农产品产量的提高和农产品在市场上售出的机会增多了，于是逐渐有了可能采取封建性的货币地租来代替劳役和实物租佃，因为货币地租既合乎封建主的需要，同时在大多数情况下，也适合农奴的需要。

由于封建制度的经济和社会方面发生进一步的深刻变化，这些发展才成为可能。农业的发展带来了剩余的产品，这样也就需要手工业有同样的发展。封建主和他们的农民都想把他们的农产品拿来交换工艺品。乡村的手工业者已经不能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需要。从当时的技术发展水平看来，只有实行手工业的专业化，才能使手工业有大发展，而这一点事实上已经开始实现了。可是专业化的手工业不能局限于乡村的范围以内，手工业者为了寻求更多的买主而来到城市，在这里有城堡的护卫，很早以来这里就有了市场，同时还有外国商人前来交易。远近的农民都把他们的产品拿到这些市场上来，于是城市发展成为手

工业生产和贸易的中心。在十三世纪期间，除了原有古老城市(它们最初是环绕着统治者的中心出现的，例如布拉格、布尔诺、阿罗木次、赫腊德次-克腊洛佛和兹诺伊莫)之外，又出现了五十多个新的较大城市。统治当局估计到新的收入来源的可能性，因而支持这些新城市的成长，把它们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并且为了获得货币报偿起见，还允许它们享有各种特权，主要是赋予市民以公民自由、手工业生产和贸易的垄断权，以及修建城池的权利。在十四世纪上半叶，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成长起来这样多的城市，这是在中欧和东欧所无法比拟的。这个稠密的城市网于是成了一个内部相互贯通的独立经济地区，类似尼德兰和法兰德斯。逐渐建立起来的这个自治社会的政府，实权落到一小部分最富有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城市贵族——手里。自从捷克有史以来，商业一直掌握在德意志商人手里，他们坚决地把东方商人赶出这个地区。所以控制捷克手工业者的城市贵族都是些德意志人，特别是由于随后又有大批德意志商人拥入境内，他们受到统治者的支持，这样就更增强了统治者的地位。

捷克贵族对于这些城市的兴起却并不感到高兴，因为他们理解到这样一来，统治集团的力量必然会加强起来。由于这些城市的政府都掌握在德意志人手里，这个事实使十四世纪初叶的第一部捷克编年史(被称为《达里米尔编年史》)有了一个很好的口实，以尖锐和强硬的反德意志精神批判普什米塞王朝的政策。

随着商业的发展，于是就有必要铸造越来越大量的硬币，这样也就需要生产更多的贵金属。当时淘金和采金矿的规模还不很大，但捷克地方由于发现了大规模的银矿而远近闻名。在伊赫拉伐和库特纳-霍腊开办的大规模银矿吸引了大批由中欧各地来的人。在白银生产方面，捷克地方居于当时欧洲的第一位。吸取了罗马法许多原则的 1249 年伊赫拉伐矿业法，几乎被整个欧洲所采用，它被认为是一种最成熟的法规。1300 年的国王瓦茨拉夫二世的矿业法，迟至十六世纪还有人把它译成西班牙文，其中的某些条例以后又变成了美洲西班牙殖民地矿业法的主要内容。1300 年的货币改革规定了一种新的货币单位，即捷克或布拉格的“格罗什”，这种货币质量优良，所以在

国内外都成了一种备受欢迎的支付手段。

捷克地方的经济发展为建立一个强大的封建君主国创造了基础，它力图取得中欧强国的地位。捷克的君主们开始干预德意志帝国的内部事务，特别是在霍亨斯陶芬王朝沦亡以后出现的新旧交替帝位空悬时期(1254—1273年)，这时帝国的势力大衰。在国王普什米塞二世(1253—1278年)统治的时代，捷克国变成特别重要了，德意志人把他称作“鄂图凯二世”。他兼并了奥地利、斯蒂里亚、卡林西亚和卡尼奥拉公国，于是王国的主权一直延展到亚德里亚海岸。他试图在波罗的海岸建立据点以便对波兰施加压力，因而参与了德意志骑士团对立陶宛的数次远征，并在科尼斯堡城(现在的加里宁格勒)建立了维持他的势力的基地。为了确保这样广大的领域起见，普什米塞二世曾经试图取得罗马帝国皇帝的宝座，但他争夺候选人地位的斗争失败了。罗马帝国的亲王们和教皇都惧怕这位“金铁大王”——他的竞争者都这样称呼他。当权的捷克封建主们也都不愿意看到一个精明强干的统治者继承宝座。于是从哈布斯堡王室中选出了一个没没无闻的鲁道夫继承帝

位，果然不出所料，鲁道夫只是他们手中的一个傀儡而已。可是鲁道夫·哈布斯堡却巧妙地利用了捷克王和贵族之间的紧张关系，乘机发动反对普什米塞二世的战争，结果后者被迫放弃他的占领地(奥地利地方直到1918年为止，一直是哈布斯堡的继承领地)，最后战死于疆场。甚至德意志诗人也歌颂普什米塞二世为当代的一位杰出英雄，在但丁[①]的《神曲》中(在第七篇《地狱》篇)替普什米塞留下了永恒的纪念，这个诗篇中的几节里把他描述为但丁同时代的巨人之一。

在普什米塞之子瓦茨拉夫二世的统治下(1278—1305年)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捷克王国，但丁对他的评价却比较低些，把他描写成一个狡猾的外交家而不算是一个战士。瓦茨拉夫利用波兰封建主之间的冲突，乘机使自己被选为波兰国王。当1301年匈牙利的阿尔巴德王室继承无人的时候，他又使自己的儿子取得了匈牙利的王位。甚至当时的罗马教廷也不赞成捷克的策略，而另行提出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统治者安茹王室的一个

---

① 但丁(1265—1321年)是意大利著名的诗人。——译者

成员，作为匈牙利王位候选人。瓦茨拉夫于是同法兰西王“美丽的腓力”缔结盟约，借以抵制教廷的策略，这是历史上的第一个捷法条约。接着就发生了争夺匈牙利王位的支持者之间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瓦茨拉夫二世采取了放弃匈牙利以求保持波兰的策略。可是，即使在波兰，普什米塞王朝的统治也没有维持多久，在1306年最后一代的瓦茨拉夫三世死后，这个统治也就告终了。

在最末一代的普什米塞的统治时期，捷克国家的兴盛也表现在文化生活方面。这是骑士文化兴起的时代。原来的通俗捷克语文变成了文言。捷克贵族的反对德意志殖民者，特别是反对德意志城市贵族，大大帮助了加强捷克文的重要性。除了片断的捷克文传说故事之外，当时最优秀的捷克文学作品是十四世纪初叶一位无名氏作者所写的记述亚历山大大帝的叙事诗，另外还有上面提过的达里米尔的《捷克编年史》，这个作品是用韵文写的。从现存的许多抄本看来，这个史诗是当时传诵一时的读物。捷克文学在这个时期以宗教诗和抒情诗最为出色。当然，在许多文学形式方面，拉丁文仍然占居统治地位，记述最后一代

普什米塞时期的一部非常动人的多卷集，所谓《兹布腊斯拉夫编年史》文集便是一例。有许多德国行吟诗人曾经留居于普什米塞的朝廷，例如梅斯特·西格赫和来因玛·冯·济韦特，后者是当时最伟大的德意志诗人之一。为了报答朝廷的礼遇，他们写下了歌颂瓦茨拉夫一世（卒于1253年）的一些诗篇。在普什米塞二世的朝廷里接纳了一位第一流的德国叙事诗诗人乌里希·冯·爱襄巴赫，瓦茨拉夫二世曾经接待了著名的海因利希·冯·梅森（又叫做"弗脑恩洛布"）。在捷克地方的许多教堂建筑和世俗建筑物上出现了歌德式艺术。贵族的权势在许多城堡的建筑中反映出来，一部分这种建筑物一直保存到今天。有一些宫殿的城堡从建筑学观点看来，堪称异常出色的杰作，例如在兹维科夫、皮塞克和别兹德兹的古堡。在音乐方面，从宫廷的行吟诗歌唱者，以及在舞蹈伴奏的器乐曲的发展当中，都可以看出世俗精神的反映。

在1306年至1310年的争夺捷克王位的四年斗争期内，使得贵族的权势更加扩大了。最后，选立了西欧卢森堡王朝的约翰为王，他的父亲是亨

利七世皇帝。为了争得王位，他曾被迫答应给予捷克贵族一系列的特权，在整个中世纪，这些特权变成了他们的大宪章，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他们有权征税。从这个时期起，贵族在政治生活中开始起着十分明显的独立作用，这一点可以从议会中表现出来，可是当时各个城市在议会中都还没有代表。卢森堡的约翰(1310—1346年)的统治有一个特征，就是贵族和僧侣阶级的权力日益增长。约翰王把他的大部分时间花费在向国外扩展的冒险行动上，把捷克王国只看作是征敛税收的来源，而将政府委诸封建寡头统治。他的领土扩张欲望驱使他越过阿尔卑斯山，并且一度占有了意大利北部的若干城市。他曾支持德意志骑士团侵略波兰的计划，并在百年战争中帮助法兰西反对英格兰。在这次征战过程中，约翰王于1346年克莱西之役战死在疆场上。在这个时期，捷克国获得了赫普地区，把某些西里西亚侯国和上卢齐支永远变成本国领土的一部分。

在斯洛伐克，十三和十四世纪也是一个经济发展的时期。由于境内多山，耕地范围自然很小。移民定居在这里的逐渐增多起来，特别是在十三

世纪下半期随着凶悍的鞑靼人的入侵而更见增多。比起波希米亚来，这里的城市增长要慢得多了。沿着一些旧城市，例如布拉迪斯拉发、尼特拉和特尔拉伐，又成长了一些新城市，例如科希策、普雷肖夫和一些矿区市镇。在斯洛伐克也发现了巨大的金银矿床，于是出现了重要的采矿中心，例如班斯卡-希提亚夫尼察、班斯卡-比斯特里察和克里尼察，这是由于利用了波希米亚采矿法规的缘故。斯洛伐克的矿山变成了匈牙利国王财富的基础，他们开始铸造金银硬币(弗林)。在十四世纪初叶，即当封建寡头政体的时期，富豪马吐希·恰克成了西斯洛伐克的统治者，他在特伦钦的城堡里建造了一座小型王宫，一直到1321年他去世以前，他始终维持着专制统治。后来匈牙利王查理·罗伯特（卒于1342年）又恢复了对斯洛伐克的主权。受到一般历史条件的限制，斯洛伐克的文化生活的发展不及波希米亚。经过了几个世纪，斯洛伐克语才成为文学语言，同时捷克文成了书面语言。在艺术方面，罗马风格在斯洛伐克一直维持到大约十四世纪，从那时起，罗马歌德式过渡的风格在这里传播得要比波希米亚

更为广泛(例如在班斯卡-希提亚夫尼察和克鲁庇纳)。到了十四世纪，歌德式风格在布拉迪斯拉发、兹伏冷、普雷肖夫及其他等地的发展臻于顶峰。

十四世纪下半叶，捷克地方的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在手工业生产和采矿业方面。在一些城市里，繁荣的纺织工业成长起来了(例如在伊赫拉伐和布尔诺)，产品输往欧洲东南和东部各地(波兰、奥地利、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两个侯国)。在采矿业方面，库特纳-霍腊占居重要地位，在其规模和建筑艺术的成就方面成为王国第二的城市，仅次于布拉格。特别是在查理一世(1346—1378年，卢森堡的约翰之子)统治时期，对外贸易有了很大的发展，他实现了历代捷克王想成为神圣罗马皇帝的幻梦(查理一世的帝号是“查理四世”)。帝国朝廷所在地布拉格(这个地位一直保持到1400年为止，在这一年里，查理之子瓦茨拉夫失去了皇位)成为欧洲最著名的城市之一，由于它的优美自然环境和华丽的建筑，在欧洲诸名城当中，布拉格被列为最出色的一个。查理通过若干联姻关系和他的财政

政策，把捷克国家的边疆延伸到西里西亚侯国和下卢齐支的其余部分，这个版图一直维持到1635年为止。其他兼并过来的领土，不久又丧失了，例如布兰登堡，以及远至纽伦堡的一些帝国封疆。

查理于1348年在布拉格创办了一座大学，这是中欧、北欧和东欧的第一座大学，它成为全国的学术中心。值得注意的是，这座大学的建立是作为捷克的国立大学而不是帝国的一个机构。捷克文不仅成为各方面所应用的书面语言，包括神学和学术著作用语，过去在这方面都使用拉丁文，而且还采用作为帝国行政机关的官方语言，并作为贵族与市民的通用语言。在查理统治时代，德文作为一种书面语言的基础也已经奠定了，在十六世纪初叶，路德字体成了德文的最终形式。捷克语言发展的程度，除了意大利文和法文可以与它相比之外，在中欧可以说独树一帜。捷克文的发展颇得力于斯蒂特尼的托马斯(卒于1401年，他是一位哲学家，曾经用捷克文写成通俗的神学著作)和约翰·胡斯的著作。

胡斯奠定了书面语言的群众基础，并且创造了一种新的正字法，这种正字法的基本原则在今

天还在使用。由于捷克文变成国语，使得下层贵族和市民们更容易接受文化。各种旧形式的文学，例如记述圣凯撒林的捷克传说，已趋衰微，而宗教诗歌和抒情诗正在放出奇葩异采，宗教性的戏剧和讽刺作品则正在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在法律著作、游记和辞典编纂方面都在使用捷克文。到了十四世纪末叶，圣经的捷文译本成为时代的异采。在十五世纪初期，约翰·冯·萨兹写成了他的著名中世纪德语散文作品《波希米亚农人》。

十四世纪下半叶，捷克和其他国家的文化接触更加频繁起来了。一方面是邻近各国，例如德国各省、波兰、奥地利和东南欧，派来学生到布拉格大学留学，因为当时在这些地方还没有成立这种学术机构（波兰的克拉科夫大学创立于1364年，维也纳大学创办于1365年，来比锡大学成立于1409年）。另外一方面，同法国和意大利的文化关系得到很快的发展。这方面的主要推动力当然是由于卢森堡王朝时代倾向于法国文化所致，这样就有许多法国艺术家同波希米亚发生了接触。当时法国文学中的巨匠之一，诗人季老慕·德·马肖特，曾经服务于约翰王御前，并写了一些作

品讴歌他的生平功迹。查理四世曾延聘法国建筑师阿拉斯的马提亚来到波希米亚，他开始在布拉格城堡修建圣维图斯大教堂。查理王朝的成员同日益开展起来的人文主义运动发生了更加密切的关系。在1356年，意大利诗人彼特拉赫曾经访问查理朝廷，在此六年之前，罗马政治家寇拉·迪·连佐也曾前来访问。这些意大利客人虽然在政治目的方面没有获得人们的同情，但他们却引起了人们对人文主义运动的兴趣。关于查理王朝的文化气氛，彼特拉赫曾经写道："我要坦白承认，在任何地方也不会象在皇帝陛下的朝廷里，以及在他周围的达官显贵中间所见到的那样，毫无粗野气息，而充满了人文主义色彩。他们都是些真正杰出的和有着高度文化修养的人，从他们的温文尔雅和饶有风趣的行径上看来，他们真可谓希腊的子孙"。由于查理四世之女安娜成为英王理查二世之妻(她被称颂为"善良的王后安娜")，于是捷克同英国也建立起了文化联系。在绘画方面，意大利和法兰西的影响与捷克传统相结合，于是产生了一种版画，在当时的欧洲无与伦比，例如伍希·布罗德大师、特里本大师、特奥道里茨大师

的作品。在雕刻方面也有一些杰作，例如从彼得·巴勒工作室那里收集的王朝和宫廷一些成员的胸像，这些胸像被安置在布拉格的圣维图斯大教堂的拱廊上。在建筑术方面也有许多优美杰作，例如圣维图斯大教堂，库特拉-霍腊、色德列茨、科林和卡尔斯坦堡等地的大教堂，这些建筑在今天看来仍旧具有艺术欣赏的价值。

第五章

胡斯革命运动

降至查理统治的末期，他的强大帝国开始碰到难关。经济发展所达到的水平，就当时环境来说业已无法逾越。农业生产量特别是市场交易规模，在现有的耕种方法范围内，已经臻于极峰。单靠剥削普通人民使其生活日益恶化，仍旧无法满足贵族漫无止境的需索。教廷的无边的财政野心更是构成危机征象的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因素。查理四世在外交政策方面依靠罗马教皇，另外一方面，他于1344年在布拉格建立大主教区，以加强教会的地位，从而帮助教廷在捷克地方进行征敛以增加收入。有一个时期，教皇在西欧方面无法满足其财政需求，于是便把注意力集中于银矿矿藏丰富的捷克地方。教会机关既然以敛财为目的，这样也就变成了罗马教皇的永久性财政收入的来源。由于这些事实，再加上教会财产上的封

建主的贪婪腐化（教长们向农奴榨取的财物远比他们自己应当向教皇提供的贡物多得多），这就造成了教会内部的风气败坏，因为教会机关对所用人员只着重于理财能力而不问其道德品质。在十四世纪的时候，教会拥有的土地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因此罗马教皇的财政政策直接损害了相当大部分的农奴，而对其余原来就怀疑教会所负神圣使命的人，则因这个政策一贯支持违法行为而使他们群情激忿。再者，在那些高级僧侣当中，大部分都是德意志人，所以对教会的反抗也就带有民族性质。在城市里也是这样，市民们对教会中举行礼拜时公然进行交易的空前丑态，以及对繁苛的捐款和要求布施的僧侣的强索而感到激忿。此外德意志贵族也以教会的热心同盟者的姿态欺压捷克手工业者，企图插足于市政管理之间分得一份。

不论在城市或在乡村，低级贵族也都感到他们是被压在下面，在他们中间兴起了反抗教会的普遍浪潮，事实上这种反抗情绪在普通人民中间还要更加广泛。随着胡斯革命运动的勃兴，这种日益增长的反抗情绪发展成为反对整个封建主义

的压迫制度。

胡斯运动的战斗力量是由普通人民当中产生的，而下级教士当时也曾在人们的意识形态方面进行了一些启发工作，因为在十四世纪末期，他们中间也开始指责教会的贪财和高级教士们的荒淫无耻行为。基于这个原因，所以约翰·威克里夫① 的工作引起了广泛的反映。十五世纪初叶，教会反对派领袖布拉格大学校长扬（约翰）·胡斯（约 1371—1415 年）相信，教会的堕落是由于把它养得太肥了。他告诉人们说，当教会的财产没有被剥夺以前，不论教会本身或者整个社会内部的任何改革都是不可能的，因为“狗打架是为了争骨头。把骨头拿走，它们就打不起来了”。

胡斯有一个特点是与威克里夫恰恰相反的，即他对人们发表的主张是在布拉格的伯利恒教堂当着做礼拜的听众面前宣讲的，并极力说明他的主张应付诸实施。胡斯的观点首先是迎合了市民和下层贵族的利益，同时也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各个集团的支持，他们把教会财产还俗归公的主张当作是反对整个压迫制度斗争的第一步。在

① 英国宗教改革家，1320 前后—1384 年。——译者

1412年，当胡斯公开指责贩卖赎罪符的时候，教会和他的支持者之间发生了公开的冲突，在这次冲突中，人民群情激昂。国王瓦茨拉夫四世(1378—1419年)出面帮助教会，有三名积极参与反对贩卖赎罪符斗争的工匠被处死刑。胡斯丧失了国王的支持，于是他被驱逐出布拉格。他避到南波希米亚的科吉-格腊德克(山羊堡)，在那里得到下层贵族中他的支持者的保护，他向国人宣扬他的主张，并写出了他的捷克文杰作(特别是《布道录》——Postilla)，和拉丁文作品《人民议会》(De ecclesia)，在这些作品里他尖锐地批判了罗马教皇的教权和整个罗马教会。他也参与了圣经捷克文版翻译的最后工作。

1414年在康士坦斯召开了宗教会议，目的是要恢复罗马教会的权威，因为当时三个相互竞争的教皇演出的臭名远扬的丑剧使教会的威信扫地①。胡斯也奉召出席这次会议。虽然他自己确

① 1378年教皇格里高里十一世逝世后，同时产生了两个教皇，一个是罗马的乌尔班六世，一个是法国人阿维依的克力门七世。1409年在比萨城召开的宗教会议又选立了新教皇亚历山大五世。——译者

信，在这次大会上有各地教会最高代表出席，他可以乘机讲解和为自己的主张进行辩护，但这些代表们根本没有打算同他进行争辩。会议并未能判定他确有污蔑圣经的事实，但会议强令他撤销自己的主张。他拒绝这样做，于是在1415年7月6日他被处以火刑活活烧死。

胡斯之死在整个捷克地方引起了深刻的激动，大家把这认作是对整个民族的冒犯。这证明，协商的大门现在业已封闭，唯一可走的路只有进行武装斗争。这个运动除去采用了胡斯的名字以外，又把领圣餐的圣杯作为运动的标记。胡斯的信徒们开始实行让世俗信徒参加圣餐礼时可以吃面包和酒，原来在天主教会里只有教士司铎们才能在做弥撒时饮圣杯里的酒。在外地，人民开始找偏僻的地方主要在小山头上聚集起来，在这里他们领受圣餐并听取大众的宣讲者的讲道，宣讲者对大家说，现在已经是时候了，“不久就再也没有主人和国王了，人民全象兄弟姊妹一样地生活在一起”。革命的浪潮也席卷了各个村镇。当瓦茨拉夫王试图平伏布拉格革命的惊涛骇浪时，由哲里夫斯基教士率领的人民于1419年7月30日攻

打市政厅，他们把市议会的议员们扔出窗外①，接着就接管了市政府。德意志贵族和教士们被赶出布拉格，其他城市也起而效法，他们的财产都被没收。在乡村里也发生了类似的攻打修道院的情事，一些贵族乘机插手夺取教会的田地。1419年瓦茨拉夫王因忧于国事而中风暴卒，一般认为国王的逝世预兆着旧制度的灭亡和"天国"的降临。

在布拉格的革命行动当中，城市贫民不断受到市民们暧昧态度的阻挠，这些市民替自己的财产担忧，因而总是设法同教会以及王位继承人瓦茨拉夫的兄弟西吉斯孟（德意志和匈牙利的国王）妥协，可是在乡村里，普通人民于1420年在南波希米亚的塔波尔建立了新的革命中心。在这里奠定了一个新社会的基础，在这个社会里把"天国"的理想变成了事实。一切封建特权都被取消了，所有人民都被宣布为平等，财产归公，军政和民政"首领"（官员）都由人民大众选举。在南波希米亚的其他城市里（例如在皮塞克和沃德腊利）

① "扔出窗外"（defenestration）是胡斯革命时期起义者在忿怒下对统治者的一种报复行为，即把他们从窗口扔到刀矛林立的街上。——译者

也实现了这个纲领。在塔波尔，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人们企图创造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只是由于实现这个意图的经济和政治先决条件，在当时都没有具备，因而决定了它是要失败的。

当城乡贫民在力求结束封建社会制度的时候，市民阶级和下层贵族却只满足于取得教会方面的一定改革。他们的纲领以“布拉格四条款”为基础，在这里面主要是要求使教会财产充公还俗，允许世俗信徒领圣餐时吃面包和酒，取得对圣经自由解释不受限制的权利，以及对“重大罪恶”的一般处罚，即指对世俗的罪行和教会人士的各种越轨行为都要受到同样处分。他们摒弃了平民们所走的革命道路，恰恰相反，自由市民和下层贵族在寻求通过谈判以确保承认既得权益。但当西吉斯孟对于胜利已有确信之后，便推翻了一切谈判，于是市民和下层贵族只有同保卫国家的人民大众的力量结合起来，舍此别无其他出路。

1420 年，罗马教皇和西吉斯孟发动了对胡斯革命运动的十字军征讨，参加这次征讨军的有来自全欧各地的雇佣兵约十万之众，大部分为德意志人。十字军一路烧杀抢掳，直向布拉格挺进。

应布拉格方面的救援请求，从塔波尔和波希米亚的其他地区派来了驰援的部队。在维特科夫山一役，特罗茨诺夫的扬·杰兹卡统率下的革命联军获得大胜，在这次战役中胡斯革命运动者的娘子军也投入了战斗。为了纪念这个胜利，这次战役按发生地点命名为杰兹科夫战役。在战败之余，干涉者的军队便灰溜溜地溃散了。

在 1420—1431 年之间，罗马教皇和西吉斯孟组织了五次对胡斯革命运动者的进攻，所有这些进攻都可耻地失败了。胡斯运动的战士们所对阵的十字军并不懂得他们失败的意义。与他们的敌人不同，胡斯运动的战士不仅充分相信他们是为正义而战，并且还开始应用了新的战术。杰兹卡组织了一支巧妙灵活的农民步兵，并且又第一次在野战中使用了轻型火炮(在此之前，只有在攻打城堡中才使用大炮)。步兵在同封建主义者的甲胄骑兵作战时，使用了装有防御设备的大车进行自卫，如果需要的话，只要用铁索链很快地就可以把战车连环起来，这样战士们在任何战场上都可以伏在连环战车后面向敌人射击。胡斯革命军的另一优点就是他们的惊人机动性、他们的神出鬼

没的战术和机巧地利用地形作战。从杰兹卡所订的军律就可以证明胡斯革命军的优异组织品质，在这个军律中包括了对每一个军事单位的详细指示，并使普通战士得以参与军事命令的决策。胡斯革命军的威名在十字军的心目中简直是谈虎色变，以至在最后的遭遇战时，例如塔霍夫之役(1427年)和多马日利策之役(1431年)，十字军一听到对方战车辚辚之声和微闻胡斯革命军的战歌《你们是天兵天将》，就望风而逃。直到1424年杰兹卡死去之前，虽然在最后的年代里他的双目业已失明，但他始终还是身先士卒站在战无不胜的大军前列。他始终不懈地坚决拥护“布拉格四条款”，由于他坚决反对同西吉斯孟方面打任何交道，他赢得了追随他的普通人民的爱戴。所以人们把他比做英国革命中的伟大领袖奥利佛·克伦威尔，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在1421—1422两年间，一当局势变得很清楚，在塔波尔实行的公社财产所有制显然已经无法维持下去的时候，市民和下层贵族就处心积虑地要把贫民的代表从运动的领导集团中排挤出去，并想把“四条款”变成共同的纲领。因为市民

阶级特别是布拉格的市民们，以及胡斯运动中的贵族，对于所追寻的目的业已基本达到（驱逐德意志贵族并没收其财产、教会财产充公还俗，以及市民阶级在议会中取得代表权），他们便越来越想准备接受西吉斯孟和教会方面提出的条件，甚至不惜就此妥协。至于教会和西吉斯孟方面，在一代天才将军大普洛科普指挥下的胡斯革命军的攻击下惨遭挫败，同时面临这种形势：胡斯革命者的大军深入德意志境内，直扑波罗的海，大军所过之处激起了不满教会的平民的革命热潮，于是他们丧失了用武力击溃胡斯运动的任何希望。

最后，1431 年在巴塞尔举行的宗教会议便不得不为停战谈判敞开了大门。过去教会曾经拒绝胡斯的条件，现在却答应了胡斯运动者：教会被迫在“双方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谈判，并且不得不通过会议上的争辩来护卫自己的主张。结果教会的威信大受打击。它把唯一的期望寄托在这样一种可能上，那就是由于这次谈判会在胡斯运动的队伍中引起分裂，并且由于会议所作出的决定会影响到使胡斯军的野战部队脱离大普洛科普的统率。在秘密谈判中，宗教会议同胡斯运动的右翼

之间达成了单独签订和约的协议，这个和约被称为“巴塞尔条约”。对于胡斯纲领，教会方面只是承认了纲领中有关圣餐问题的一条，而西吉斯孟则答应在有关财产问题上维持现状，也就是说承认教会财产归公还俗和没收德意志贵族的财产。在这个纲领的基础上，宗教会议和胡斯运动者的右翼之间结成了联盟，一起反对拒绝作任何妥协的野战军部队。在1434年的里旁战役中，左右两翼之间发生了一次武装冲突，在这次冲突中野战军部队受到了决定性的挫折。现在同教会以及同西吉斯孟实行最后和解的道路上已经没有障碍了，西吉斯孟终于在1436年取得了捷克的王位，但一年之后就死去了。巴塞尔条约成为捷克地方的法律，并且成为圣杯派教会存在的法律基础。圣杯派教会的信徒自认为是“教会的忠实儿子”，他们甚至还有特殊的礼拜仪式，例如领受圣餐酒和用捷克文做礼拜，但他们拒绝服从罗马教皇当局，因此他们也就拒不向罗马作任何捐输。

由于对教会权势给予了严重的打击，胡斯革命运动对于教会财产的归公还俗和民族教会的形成等问题的解决起了重大作用，这些问题又是十

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面临的重大课题。因此，胡斯纲领在国外引起了巨大的反映：在德国产生了胡斯派的积极的信徒，例如约翰·德朗道夫、彼得·突脑和弗里德里希·莱塞尔，班堡、帕骚和马格德堡等地的人民也纷纷起义；在法国，1423年土尔内城(皮卡迪)爆发了以吉勒斯·麦索特为首的革命，这次革命的行动口号也是以“布拉格四条款”为基础的；在波兰和匈牙利也都产生了同样的影响。英国的威克里夫教派①信徒也与胡斯革命运动者有着显著的联系。彼得·潘恩(在波希米亚大家称他为“英吉利什”)是胡斯派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他是一个英国人，从宗教法庭逃跑出来到了波希米亚。在捷克地方，尽管胡斯革命运动最后失败了，但它还是使广大的农奴和城市居民得以豁免了所有教会的各种苛捐杂税，特别是教会的什一税，从而使生活得到改善。胡斯运动也使下层贵族的危机暂时告一结束，他们的地位靠着牺牲教会财产而获得改善，城市的市民在政治地位上得到了巨大的收获，他们取得了选派

① “威克里夫教派”(Lollard)提出各种社会要求，这个教派的信徒被当作异教徒而遭到各种迫害。

代表参加议会的权利，从而获得了特权地位，这是当时在东欧和中欧唯一的例子。

胡斯运动对于捷克教育史说来具有最重大的意义，因为胡斯信徒所办的学校使普通人民接受了教育和文化。在塔波尔的这种学校上学的有男女儿童，这在中世纪是闻所未闻的；学校讲课使用的语言，不是拉丁语而是捷克语。胡斯运动进一步提高了捷克语和捷克文学作品的重要性。最后，捷克文重新又采作教会中举行礼拜仪式的用语，在教徒们的眼光中具有拉丁文的同等地位，因为在过去天主教会教徒都惯于仅仅使用拉丁语。捷克文用作官方语言的局面也更见稳定了，到了十五世纪末，捷克文在中欧已经作为一种外交语言通行起来。在文学的个别部门例如诗歌和神学著作方面，也获得了最高的发展，这对国外特别是对波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音乐方面，特别是赞美诗中，捷克文的应用得到了重大的进展。

由于胡斯革命运动在整个捷克生活中是这样根深蒂固，因此它成为捷克人民的民主斗争的起点，并成为人民革命传统的源泉。就这个运动在

斯洛伐克所引起的巨大反应看来，胡斯运动标志着在捷克和斯洛伐克两大民族之间建立更密切的联系方面的一个重要阶段。

第 六 章

封建寡头谋夺捷克国家统治权

1437—1526年

1437年卢森堡王朝覆灭以后，争夺王位的斗争为封建寡头的权势铺平了道路。在胡斯战争时期暴发起来的几个大名门贵族家庭（甚至一些信奉天主教的贵族也乘机接收了教会财产而美其名为“保护”），试图完全控制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其中最著名的是南波希米亚的罗兹姆贝克家族。

直到波迭布腊迪的依里（乔治）从捷克贵族当中被选立为捷克王（1458—1471年在位）之后，这种趋势才暂时中止，依里王试图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王国政府，这个政府依靠城市市民和下层贵族，因而和他原阶级的政策处于对立的立场。随后本国的圣杯派教会也支持他的政府。但是依里王的

政治家风格的工作遭到罗马教皇方面的嫉视，后者撕毁了巴塞尔条约，宣告发动征讨捷克人的新的十字军，并联合了匈牙利国王马提亚参加这次征讨。贵族们也都支持外国干涉者，然而干涉者并未取得任何决定性的胜利，最后终于被击退了。在另外一方面，国王乔治又是一个干练的外交家，他赢得了欧洲其他国家越来越多的同情，因为他们也都身受罗马教皇政策的痛苦，由于面临着土耳其压境的威胁，教皇便采取了极力促使当时军力最强的这两个国家互相作战的政策。国王乔治提出的建立欧洲各国君主联盟的倡议获得了广泛的重视，这个倡议主张各国君主间的争端不应诉诸武力而应在联盟法庭通过谈判来解决，加盟的成员应包括法兰西王、神圣罗马皇帝、威尼斯总督，以及加斯底里国王。由于这个联盟剥夺了罗马教皇左右一切的地位，于是在其尚未成熟的期间就被教皇扼杀了。法兰西王朝对于这个倡议却甚表好感，于是路易十一世便同乔治订立了一个友好条约。

彼得·赫尔契茨基(卒于1460年)在他的言论中表达了本国贫民业已幻灭的希望，他们曾经指

望胡斯革命运动能够解除一切封建主义的重负。赫尔契茨基用捷克文写的著作非常尖锐地谴责了整个封建制度。他根据福音书的训示，反对任何方式的使用武力，而号召进行“心灵上的斗争”和主张只采用消极抵抗。赫尔契茨基这种原始的教旨的深奥和纯朴，在几百年以后引起了列奥·托尔斯泰的兴趣。赫尔契茨基的信徒们于 1457 年组织了一个“捷克兄弟会”。它从圣杯派脱离出来，另外组成了一个独立的教派。它一开始就反对任何积极斗争，宣扬从精神上实现自我完善，把一切国家政权机构置于不顾。兄弟会的成员大多是小商人和贫农。

波迭布腊迪的依里死后，匈牙利王马提亚和波兰君主弗拉第斯拉夫(雅格隆王朝)之间展开了捷克王位的争夺，结果后者由大多数贵族和市民拥立为捷克王。几个国王间的对抗使得大贵族能够通过参加某一派别以加强自己的地位。这种局面只有由于 1490 年马提亚的逝世才最后稳定下来，这时弗拉第斯拉夫也被选立为匈牙利国王。这样一来，捷克地方和匈牙利便合为一国，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 1918 年。这种联合局面的积极效

果之一便是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之间建立了更加密切的关系，因而使捷克文化在斯洛伐克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软弱无能的雅格隆王朝的国王弗拉第斯拉夫二世(1471—1516年)和路德维克(1516—1526年)的政府给封建领主们制造了机会，使他们得以把自己的统治权力扩展到捷克国家全境。所有的显要职位都抓在一小撮最有权势的大家族手里。大贵族们向市民阶层的政治地位展开了进攻，试图把他们从议会中驱逐出去。虽然大贵族的努力结果证明无效，但市民们也被迫放弃了许多经济特权，这样一来就大大损伤了他们的地位。封建贵族们开始在自己的领地上兴办起越来越多的酿酒厂、养鱼塘、养牛场，开采各种贵重金属和经营商业。这种情况导致了向臣民征收新税和限制他们的个人自由，特别是禁止他们自由迁移。十五世纪末叶，平民一再举行起义反抗这些压迫，但每一次的事件都被镇压下来了。

国王的统治，事实上只是徒有其名。1526 年，当路德维克王被迫对抗土耳其人的袭击时，两国的贵族们都袖手旁观，使国王陷于窘境，因而遭

到失败，并于匈牙利南部的莫哈奇一役中战死在疆场。于是捷克和匈牙利的王位再一次空悬起来。

这一时期中文化发展方面最重要的事件是印刷术的传入。在捷克地方印刷术的应用为时颇早，第一本捷克印行的书籍于 1468 年问世。到 1526 年至少已经创办了五个大规模印刷所，并且已经出现了最早的捷克印刷工人。1515 年出版了最早的捷克文报纸，那还是不定期刊行的类似有关特殊事件的报道性小册子。由于胡斯革命运动的失败，人文主义在这里没有象在其他国家进行得那样广泛。捷克人文主义的一个特征就是它坚持在文学中有系统地使用捷克语文，这部分是由于受到当时市民阶层在文化方面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的缘故。弗谢格尔第的维克多林·柯奈尔是当代最著名的捷克人文主义者。捷克文学与胡斯运动派的伟大遗产一脉相传，但是创作艺术却面临着更复杂的情势。捷克版画已经不再是欧洲艺坛上的骄子，丹麦画派此时取得了优越地位。《美丽的圣母马利亚》画像已被市民风格的通俗圣母马利

亚像所代替，这种风格适合于城市居民的趣味，而市民们越来越支持这种创作艺术。

在建筑术方面，晚期歌德式风格极为盛行，这可以从别涅迪克特·雷特的代表作中清楚地看出来，他完成了库特纳山的圣巴巴拉教堂的建筑工程，并设计建造了布拉格城堡中弗拉第斯拉夫大厅；另外还有布拉格的布拉希腊城门的建筑师马吐希·雷塞克。胡斯派的影响在音乐方面，尤其是在通俗赞美诗中也可以看到，这种诗歌形式如此发达，以至于影响到德意志改革派圣诗的旋律结构。有一些乐曲创作在许多优美的赞美诗本中保存下来了。

斯洛伐克和捷克两地之间更密切的接触加强了用捷克文作为斯洛伐克人书面语文的地位，同时斯洛伐克通俗语言中的一些成分也传人捷克文字中。最古老的斯洛伐克文学手稿出现于1479年。1467年在布拉迪斯拉发创办的一所大学(Academia Istropolitana)促进了斯洛伐克文化的发展，并且在斯洛伐克的人文主义传统方面占居了重要地位，尽管这座大学只维持到1490年就停办了。斯洛伐克的歌德式建筑在木雕艺术杰作上

达到了登峰造极的辉煌成果，例如列伏查的巴伏耳的作品，至于科希策圣伊丽莎白教堂的建筑，那就更不消说了。文艺复兴在斯洛伐克境内——例如在巴德约夫——要比在捷克地方出现得更早得多了。

第七章

国家独立的丧失

1526—1620年

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利用中欧面临土耳其人的威胁和贵族们的意愿，乘机把抵抗土耳其战争的负担转嫁到一个联合统治者的肩上。由于斐迪南一世(1526—1564年)被选立为捷克和匈牙利国王，因此捷克、匈牙利和奥地利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多民族的君主国，这个国家一直存在到1918年。斐迪南一世试图利用捷克地方富饶的经济资源以支持王朝的对外侵略政策，一方面要进行对法兰西和对帝国中新教派诸君主的战争（神圣罗马皇帝兼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系斐迪南的兄弟），同时又把尼德兰、西班牙和美洲殖民地的领土都包括到他的利益范围内，所有上述地方组成哈布斯堡王朝的“日不落”的世界帝国的一部分。斐迪

南的这种企图与捷克国家的利益毫无共同之处，不久就引起市民阶层和贵族的反抗，而农民也加以反对，因为他们担负的捐税有增无已。斐迪南想重使天主教成为国教的计划，也引起了大家的反对。因为在波希米亚居民中不到十分之一的人数是天主教徒。在捷克国境的诸邻邦内（摩拉维亚、西里西亚、上下卢齐支）天主教会的势力较强，但路德派的主张却与之对抗。斐迪南的恢复天主教化计划所引起的结果就是，任何反对哈布斯堡的抗拒都假借了为争取宗教自由而战的形式。当圣餐派教会(圣杯派)因其所采取的妥协态度而丧失其信誉时，捷克兄弟会却背弃了赫尔契茨基最初的使其成为一个贵族和市民的教会的训示，而和路德派教徒一起站到最前列来了。

随后发生了施马尔卡登战争，在这次战争中，神圣罗马帝国的新教徒诸君主起来反对哈布斯堡王朝，在捷克地方激起了1546—1547年的第一次反哈布斯堡统治的起义，领导这次起义的是市民阶层。这次起义失败了，斐迪南利用他战胜市民阶层的机会，废除了他们在胡斯战争中所赢得的最大权益——政治地位的自由。城市居民被置于

王国的监视之下，在议会中他们的观点要服从于国王的意愿。市民居民的经济权力也受到了限制。

1547年城市的失败是哈布斯堡王朝和贵族们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巨大胜利。自十六世纪中叶起，贵族们开始扩展他们在大领地上办的企业，从面使广大的农民群众的情况更加恶劣起来。除了酿酒厂之外，在南波希米亚的特里本和印得尔谢胡夫-赫拉岱茨一带的大规模养鱼池的修建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养鱼事业在今天的捷克经济中仍然保持了固有的地位，捷克鲤鱼因质量优美面行销全欧。1547年扬·杜勃腊弗斯刊行了他的重要著作《池塘养鱼业》(De piscinis)，这本书使捷克养鱼业扬名国外。大约在十六世纪中叶，贵族领地上的各酿酒厂开始大规模酿造淡啤酒（以小麦制作)。在摩拉维亚东部开始兴办养羊事业，在边境地区贵族们从事银矿和锡矿的开采。十六世纪初期在雅喜摩夫发现了巨大的银矿床，不久就驾凌了库特纳-霍腊矿场之上。在这里铸造了著名的银币，德文称为“约阿兴斯塔勒”(Joachimsthaler)，欧洲和美洲的通用的货币名称即由此而来：thaler—dollar（塔勒——元)。当手工业生产受到

基尔特行会组织限制的时候，布匹的生产却有所增长，捷克、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的布匹在波兰、俄罗斯、奥地利、匈牙利和巴尔干半岛各地打开了销路。北波希米亚、卢齐支和西里西亚的亚麻布获得了更大的发展，这种产品经由来比锡开始远销于海外市场。亚麻布产品不受行会组织的限制，所以现在人们才可以谈到开始进行手工业工场生产（这就是依靠织工在自己家里生产的所谓分散的手工业工场制）。摩拉维亚的帽子也大量输往东欧和东南欧。炼铁工业也在行会制度之外获得发展，特别是在1600年左右建成了第一座高炉之后有了更大的发展，因为这种炼铁炉便于连续不断地熔炼。

在斯洛伐克，哈布斯堡的统治意味着斐迪南和当选的匈牙利王扎波里亚之间糜烂地方的战争。在德意志贵族的压力下，斯洛伐克的城市居民也站到哈布斯堡一边，而本地贵族则支持扎波里亚。哈布斯堡王朝只能保持住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西部，所以在将近二百年间布拉迪斯拉发成为哈布斯堡匈牙利的首都（匈牙利的真正首都布达于1541年为土耳其人所占）。斯洛伐克南面与

土耳其帝国接壤，斯洛伐克人民身受土耳其人侵袭之害，同时又遭受哈布斯堡的士兵抢掠。斯洛伐克矿工的境遇特别凄惨，在这里因为有富格尔和突卓家族的投资，在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交替的时候，银矿和铜矿的开采臻于极盛时代。1526年在班斯卡-比斯特里察，矿工们因工资过低而引起一次巨大的暴动，这是自胡斯战争以来最大的一次革命事件，此后在整个十六世纪里继续不断发生了许多次斗争。一般人民越来越拥护新教，可是哈布斯堡王朝却企图号召耶稣会会员来镇压捷克和斯洛伐克两地的新教。但贵族也热心支持路德教派，因为他们十分赞成没收教会财产。

十七世纪初期，王朝又出现了王位继承的危机。在匈牙利发生了以伊斯特万(斯蒂芬)·玻契卡依亲王为首的大规模反叛，而对土耳其的长期战争仍在进行着。鲁道夫二世皇帝的兄弟马提亚利用当前局势想乘机抢夺王位，于是挑动起了一次内战。反哈布斯堡的新教派贵族迫使进退维谷的鲁道夫二世(1576—1611年)于1609年承认宗教自由，这样一来他们就获得了对哈布斯堡进行合法抗拒的机会。在捷克地方同奥地利的哈布斯

堡王朝的关系中，捷克的地位如同尼德兰对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一样。在全欧洲，哈布斯堡政权日益衰弱，镇压捷克反抗运动的图谋，引起了反抗哈布斯堡的起义（1618—1620年），这次起义变成了三十年战争的序幕。

捷克起义开始于1618年5月23日，在这一天起义者把统治者马丁尼采和斯拉伐塔掷出窗外（1612年哈布斯堡王朝已经把京都从布拉格迁往维也纳）。这次事件成为一次总暴动的信号。经过选举产生了一个由三十位执政组成的政府来管理捷克地方，耶稣会会员被逐出国境，哈布斯堡的王位被宣告推翻了。起义的军队在图伦的印得里希·马吐阿斯伯爵统领下兵临维也纳城下，但并未获得决定性胜利。德意志新教同盟首领巴拉提纳特的弗莱得里克被选为捷克王（1619—1620年）。由于他是英王詹姆斯一世的女婿，因而他指望获得英王的支援。这次暴动主要只是贵族们的事，只是属于争夺国家权力的斗争；市民阶层并未完全卷入其间，至于要求不能得到满足的更广大的平民群众就更少过问其事。从一开始起，这次起义就依靠国外的支持。可是英国并未伸手援

助，只有尼德兰给予了一定的财政援助，而特兰西瓦尼亚的哈玻尔·贝特兰和萨沃伊君主维克多·叶曼纽耳给予了军事援助。由于城市居民表示漠不关心因而缺乏金钱，使贵族无法建立一支充实的雇佣军队。在另外一方面，哈布斯堡王朝却能依靠西班牙和罗马教皇的巨大财力支援。1620年11月8日在布拉格附近的白山一役中，起义军溃败，布拉格投降，巴拉提纳特的弗莱得里克逃出国外。起义很快被敉平了，但由此而引起的欧洲的大冲突此时已逾越捷克国境，演变为三十年战争。

白山之役的失败在捷克历史上是一个不祥的日子，因为由此而终于破坏了国家的独立。捷克王室领地成为哈布斯堡王朝的几个省份，在这里统治者的意愿乃是唯一的法律。市民们保留的权利被剥夺了，贵族的权势，特别是在法庭方面的势力加强了。自从胡斯运动以来，天主教会的权势第一次又恢复了，并且重新把它的财产接收过去了。天主教会被宣布为唯一的国教，农奴们必须信奉天主教。对于自由居民（即贵族和自由市民）则许其自行抉择：或者成为天主教徒，不然

就尽速离开这个国家。德语被宣布为和捷克语具有同等地位。可是由于在白山战役之后，大多数官员都由奥地利或德意志贵族充任，因此德意志人不久就占了优势。在 1621 年有二十七名起义领导人在布拉格旧城广场被处以绞刑作为一种威慑行动，所有与这次起义稍有关系而被牵连者，财产均被没收。将近四分之三的田地由此而遭没收，获胜的哈布斯堡王朝把这些土地赐与或以极低廉的价格卖给了奥地利、德意志、意大利和西班牙贵族（例如：施瓦森堡、曼斯费尔德、科洛列多、皮科洛米尼、乌埃塔、本奎等），因为他们曾经帮助镇压捷克各等级的起义。颇大一部分新教徒逃亡了或者迁移出国，随后他们在瑞典军中服务，继续参加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战争。市民们因财产被没收而变得一贫如洗，许多市民宁愿避居国外而不愿成为天主教徒。由于捷克文化的推进主要依靠市民阶层，所以他们的迁往国外使捷克文化的发展受到了极严重的挫折。

十六世纪期间波希米亚文化生活中最主要的一个特征便是市民阶层居于领导地位。十六世纪捷克兄弟会会员、名作家扬·布拉霍斯拉夫（1523

—1571年）的作品，以及世纪末根据钦定本圣经(Kralice Bible）原文精心重译的捷克文圣经新译本，表达了捷克文学中的人文主义的发达登峰造极。为求使捷克语规范化起见，于是出版了一系列的文法书和字典。和西欧的文艺复兴恰恰相反，市民阶层最有代表性的纯文艺文学作品在这里并不繁荣，诗歌也是一样，而诗歌是当时波兰文艺复兴期间最引为自豪的；捷克书籍主要属于科学性质的（历史的和自然科学的、法律的、经济的和技艺性质的），这些书籍是用捷克文和拉丁文写成的。这反映了市民对自然研究的关心，和对生产及其利用方面观察的兴趣。乔治·阿格里错拉在雅喜摩夫矿中得到启示和材料，于1556年出版了他的著作《采矿和冶金学十二书》，这部著作获得了世界声誉。这个世纪最伟大的捷克自然科学家哈耶克的塔德阿斯·哈耶克（卒于1600年）出版了第一本捷克植物志，他又是捷克地方拥护哥白尼的太阳中心系学说的第一人，并成为子午天文学的奠基者。他曾试图测量波希米亚的确实面积并绘制波希米亚地图。在医学方面也获得了引人注目的进步。十七世纪初叶，查理大学校长扬·

耶生纽斯（1621年被绞死）制作了第一个解剖标本。在鲁道夫二世统治时期，布拉格又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首都，当地文化生活的高度水平吸引了许多外国科学家来到该城。鲁道夫宫廷接待了著名的丹麦天文学家图霍·德布腊赫，他十分器重哈耶克的研究工作。另外还有德国天文学家兼数学家约翰涅斯·凯普勒，他在布拉格研究的期间制定了有关行星运动学说的最早两项法则。

由于有了一些完善的印刷所，因而使文学有可能获得发展，其中尤其以依里-麦兰特里奇出版社印行的捷克书籍具有高度水平。

在捷克和摩拉维亚的许多城市里(例如，布拉哈提策、特尔策等)，“捷克文艺复兴”中文艺复兴风格主要在建筑术方面有了发展，这些城市中优美如画的广场和拱廊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在宫廷和一些封建领主那里，主要是意大利建筑师在服务，他们创建了许多城堡，例如巴杜比策、里托米什尔、奥波契洛、策斯基-克鲁姆洛夫、印得尔谢胡夫-赫拉岱茨和布乔维策等古堡。别尔威德列夏季别墅和布拉格城堡中的米乔夫腊球艺厅，把布拉格点缀得更加美丽。在音乐方面，大众所

喜好的教堂合唱队接受了爱好声乐复旋律的文艺方面兄弟会会员的影响。尼德兰学派复旋律风格最重要的作曲家是波尔吉策的克鲁什托夫·哈兰特(卒于1621年)，他是复音颂赞歌和五部合唱音乐的作者。胡斯派合唱的通俗传统风格特别是由捷克兄弟会保存下来了，并印行了一系列的包括大众合唱歌的赞美诗歌本。在十六世纪期间，捷克地方共出版了七十多种这类赞美诗歌本，共约印行了一百五十版，将近十万册，这不但表明了这种大众合唱歌的高度水平，而且也可以说明当时的整个文化生活的高度水平。

在斯洛伐克也象在捷克地方一样，市民阶级在十六世纪的文化生活中占居显著地位。由于捷克语成为斯洛伐克语改革中的教会用语，同时由于捷克文神学著作特别是捷克文圣经的传播，因而捷克文化的影响更见加强了。本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期间，在斯洛伐克的特尔拉伐、巴德约夫、班斯卡-比斯特里察和布拉迪斯拉发城创办了印刷所。城市市民是一些热心的建设者，因此斯洛伐克的许多城市的地位由于一些优美的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而提高起来，例如班斯卡-比斯特里

察、列伏查和班斯卡-希提亚夫尼察。

在捷克地方的暴动失败之后，许多著名的作家流亡国外，例如，巴维尔·斯特兰斯基在他的逃亡生涯中写出了他的《关于捷克国家》一书（此书曾译成许多种欧洲语文）；白山叛乱之战的编年史作家资霍尔的巴维尔·斯卡拉，以及捷克文化史中的巨子之一，著名的教育家和哲学家扬·阿莫斯·考门斯基（科明尼乌斯；1592—1670年）。科明尼乌斯是捷克兄弟会的最后一批主教之一，他的著作奠定了现代教育学的基础，例如：《教学法大全》(Didactica magna)、《论文集》(Informátorium)、《图画世界》(Orbis pictus)、《语言学入门》(Ianua linguarum reserata)及其他等等。他教导人们说，学校应该不问社会地位和性别，对所有人等一律开放不加歧视，教育应该以实践和直观教学为基础，灌输知识应该采取谆谆善诱的方式避免使用强力。虽然科明尼乌斯在自己的祖国没有机会实验他的教育计划，但当他客居于英国、瑞典和在尼德兰时，他至少能够部分实现了自己的计划，最后他死于纳登。杰出的捷克雕刻家瓦茨拉夫·霍拉尔也是旅居国外并在那里工作，主

要是在英国。

相当大一部分捷克贵族和市民被迫移居国外，以及大量外国人(多半为德国市民和贵族)流入捷克，导致留下来的贵族和市民逐渐丧失了民族性，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初期终于德国化了。只有在平民当中和在乡村里才保存了捷克语言和文化。

第 八 章

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时代

1620—1918年

第一节 “黑暗年代”和民族复兴（截至1848年）

在三十年战争期间(1618—1648年)，捷克地方一再遭受到交战双方军队的可怕蹂躏。在战祸的惊恐之余，饥荒和瘟疫接踵而至。捷克全国的人口减少了一半，降至一百五十万人。过去异常繁荣的土地，现在变成一片残败的景象，由于上下卢齐支割让给萨克森而疆域缩小。一切苦难主要都落在农奴们的身上。劫后余生的农奴们在强加于他们身上的封建负担下苟延残喘。法定劳役提高到每周要做好几天，因为由没收别人财产而暴发起来的贵族们在他们领地上栽种谷物供出口。小土地所有者在经济上也为徭役负担所毁，

由于经常派差致使他们无暇在自己地里工作。农民的个人自由现在实际上已降至最小限度，所以简直可以说已经形成一种新的农奴，即所谓“副牌农奴”。哈布斯堡王朝因须维持他的军队而不断需要更多的钱饷，于是对居民课以重税，而农民的困苦程度还要更深一层，因为根据耶稣会的命令强使他们改宗皈依天主教所采取的暴力手段是前所未有的。嗣后的一段时期真正是名符其实的“黑暗时代”(“temno”)。

捷克地方从三十年战争的灾难中恢复得很慢。在十七世纪末期出现了新的经济发展的征象。农业仍旧停滞不前(大领地上的法定劳役所获收成不可能超过一定限额，因为它采取了最残暴的强迫手段)，其他生产则开始重新有所增长。

我们可以把1680至1781年间的这一段时期称为捷克地方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纺织业生产的基础包括亚麻布、棉布和棉织品制造，开始有产品输往远洋市场。特别是在1740年以后，当哈布斯堡王朝和普鲁士之间的冲突结果丧失了著名的纺织工业基地西里西亚，于是哈布斯堡政府试图另在其他地方特别是在波希米亚寻找替代产地以

加强发展纺织工业的时候，这些纺织工业部门更加繁荣起来了。捷克的手工工场企业采用工资劳动，而不是使用徭役工，同时实行了分工和采用简单的机器。有了分工便有可能利用妇女的非熟练劳动，甚至可以使用童工。除了纺织工业以外，玻璃制造业也有了惊人的发展，特别是在发明了新的加工技术和发现了波希米亚的晶体矿之后。这样一来就奠定了波希米亚玻璃的世界声誉，到十八世纪上半期，波希米亚玻璃代替了威尼斯玻璃，在国外市场上树立了统治地位。纺织工业和玻璃工业多半集中于多山的边境地区，在三十年战争之后，许多外国移民主要为德国人重新在这里进行殖民。由于这一带土壤贫瘠，因而使得这些多山地区在农业上无法进一步发展，于是居民自然而然都进行家庭手工业生产。在手工业生产方面的古老传统以及山间的水流给最初的机器提供了丰富的水力，也是重要的因素。纺织工业的发展始于波希米亚北部克尔科诺舍山（巨山）和克鲁什涅山（矿山）的山麓地带；玻璃工业是在波希米亚北部原有企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十八世纪末叶波希米亚玻璃的输出稍见衰退，但自十九

世纪初叶在尼萨河上的亚布洛内次(在北波希米亚)发现了色晶体矿之后,又为顺利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阶段。

哈布斯堡政府根据重商主义原则支持制造业生产,因为这种事业给帝国财政收入带来极大好处。当玛丽亚·泰勒莎(1740—1780年)和约瑟二世(1780—1790年)专制君主政体的所谓开明统治时期,采取了一系列的支持工业的进步措施,例如豁免国内的通行税和关税。可是,工业发展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乃是农奴制,这种制度使最大多数的居民束缚在农业方面和从属于封建领主。因此最初只有贵族才能够经营手工工场,因为唯有他们才能支配必要的劳动资源。同时拥有资本的商人和其他提倡者在冶金、玻璃和采矿工业方面的创业精神在这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最后农奴制度的崩溃还是由捷克农奴自己促成的。无法忍受的压迫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农民起义。在三十年代期间,这些起义还只限于一定的领地,但在1680年便爆发了一次巨大规模的起义,包括了波希米亚的大部分地区,迫使哈布斯堡政府只得颁布一些措施减轻徭役,因为这种徭

役已经证明是行不通了。1775年又发生了一次最大规模的起义，在这次起义中可以看出胡斯运动的传统。虽然这次暴动被镇压下来了，但却震撼了君主政体。在这些事件的压力下，约瑟二世只得颁布诏令宣告废除农奴制；可是封建奴役即指对封建领主的从属关系和徭役仍旧保留下来了。1781年约瑟又颁布了宣布宗教自由的告示，文告中宣布除了天主教以外，实际上承认路德教派和喀尔文教派的信仰，这样一来就使得非天主教徒的手工业者和手工工场工人可以居住于君主国的领土之内而不必担心宗教迫害。在玛丽亚·泰勒莎和约瑟二世统治时期的一系列的改革最后归结于废除农奴制，结果哈布斯堡帝国变成了一个类似十八世纪的法兰西的专制国家。在这里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府和一个受过法律训练的官僚集团，外加上一支强大的军队和警察。因为哈布斯堡帝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些改革的消极作用就是德意志化的趋向，其目的也就是只承认德语的地位。

农奴制度的废除和宣告宗教自由，对于捷克地方的经济发展和捷克民族的进步两方面都有深

远的影响。捷克地方变成哈布斯堡君主国工业最发达的部分。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工业方面，随着这种转变一道来的还有更深远的变化。国内需要有新的教育形式。1707 年在布拉格创办了一所工业学校，于 1826 年改组为工艺专科学校。大量农村人口涌人德意志化的城市，在这里奥地利资产阶级创办了一些新的制造工业，因此捷克成分加强起来了，这不仅是由于捷克人是生产者，同时他们又是消费者。一个新的捷克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形成起来了，他们在捷克语言和文化一度衰落的情况下，对政府方面极力推行德意志化的反应，是为争取恢复捷克语言和文化而作不懈的努力。

在斯洛伐克，和捷克地方的情况比较起来，资本主义生产的开始要迟得多了。哈布斯堡政府有意地只许匈牙利始终成为帝国的农业附属物，所以说这种迟缓是应该由哈布斯堡政府负责的。至于贵族们，也应该负一部分责任，因为他们只是集中在自己的领地上兴办工业，在那里他们多半以法定劳役形式使用农奴工作。最残酷的农奴制形式在斯洛伐克和整个匈牙利生根远较在捷克地

方为早。斯洛伐克的农奴制和古代的奴隶制甚少区别，在1514年多热起义失败之后，这种农奴制就由《维尔宝济法典》(《三一法典》——opus tripartitum)固定下来了。由于贵族对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不予支持，因此1785年匈牙利的废除农奴没有取得贵族方面的谅解，结果形同具文。匈牙利后来的落后，究其原因，与这一事实也有部分关系。1677—1678年由凯兹马罗克的伊姆列·泰克利伯爵领导的一次反抗被镇压以后，斯洛伐克居民的情况更见恶劣了。这次事变对匈牙利的意义正如同白山战役对波希米亚的作用一样。哈布斯堡王朝宣布了他们对匈牙利王位的世袭权利，废除了旧匈牙利宪法和实行了残酷的反动改革。重新实现天主教化也影响了大多数斯洛伐克居民从而增加了他们的痛苦。在玛丽亚·泰勒莎和约瑟二世统治的时期也企图在斯洛伐克实现德意志化，正如同在捷克地方一样，他们遭到了日益增长的民族意识的抵抗，在这里早就开始努力制定一种书面的斯洛伐克语言。1635年在特尔拉伐创办的匈牙利天主教大学和在布拉迪斯拉发成立的福音学会，对于斯洛伐克知识分子的成长起了重大

作用，从十八世纪终了时起，这里成为努力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心。

十八世纪末叶，哈布斯堡君主国成为反对法国革命的最热心的打手。这个统治集团对于法国革命怀着深深的恐惧，力图采取一切手段以防止人民当中对这次革命的任何良好反映。在当时业已建立了秘密警察，其职责在于维持专制秩序和追究不满政府政策的任何表现。利奥波德二世(1790—1792年)、弗兰茨一世(1792—1835年)和斐迪南五世(1836—1848年)时期，是最严酷的反动时期，这个反动时期是和帮助建立这种统治的梅特涅伯爵的名字分不开的。这个反动统治时期的特征之一，就是执行了坚决的德意志化政策，根据这个政策，学校中讲课只许使用德语，甚至在大学里也规定以德语代替拉丁语的地位。可是，有赖无数爱国者的热心努力，捷克的语言和文化并未因这些措施而被消灭。

捷克社会和经济生活中所发生的进一步巨变，结果使这个国家的民族运动扩展起来。十九世纪最初年代里，在捷克地方开始了工业革命的过程。从工场手工业到大规模工厂生产的过渡，

首先开始于纺织品生产，稍后在食品工业和重工业中，蒸汽机的传入在工厂生产中起着决定作用。贵族们所有的手工工场逐渐停办了，代之而起的是资产阶级兴办的工厂。从英国输入的新机器，特别是纺织品印染机，代替了许多工人的劳动。工业革命使各个部门的分工加强起来，并且对交通事业也产生了重大影响。1832 年在捷克—布迭约维策到奥地利的林次之间建造了欧洲大陆的第一条马车铁路。这条铁路是由佛朗蒂舍克·安托宁·格尔斯提讷建造的，不久以后，他于 1837 年又修筑了俄国境内由彼得堡至皇村① 的第一条铁路。然而，未来是属于蒸汽火车铁路的。1839 年维也纳—伯尔热次拉夫—布尔诺铁路开始通车，在 1841 年这条铁路又由伯尔热次拉夫延伸至阿罗木次，随后更延长到加里西亚的波胡明和波赫尼亚。捷克工程师扬·皮尔勒设计建造的布拉格—阿罗木次铁路线于 1845 年通车，布拉格—波德莫克利—德雷斯顿线于 1851 年通车。1827 年，维沃卡表兄弟以改进铁犁著称于世，1827 年约瑟

① 即现在的普希金市。——译者

夫·列塞尔发明了船用螺旋桨，1815年约瑟夫·波哲克设计制造了一辆蒸汽车和一艘汽艇（1816年）。工业革命创造了许多新城市，除了最大的和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布拉格之外，就要数波希米亚北部的利贝雷次城。在1780—1840年间，捷克地方的人口（包括摩拉维亚在内）增长了60%以上，达到六百万之众。

大规模工业化的结果带来了新的社会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当中，捷克人占绝大多数，可是在大城市里则德意志人占压倒优势，而捷克资产阶级多半在外省。除了封建主与其所属人民之间的冲突和封建主与市民之间的冲突之外，现在又有了资产阶级和工人之间的斗争了。造成争端的通常原因是工资低、生活标准低，以及有一个时期由于机器的使用日多而造成的部分工人的被解雇，因而引起了一个反对机器的暴动，暴动者企图捣毁机器。1844年在布拉格和利贝雷次这类骚动发展到了顶点，但所有这些事件都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

在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复兴中，文化起了重大作用。在努力提高捷克语地位方面的杰出人物

中有大语言学家约瑟夫·多布罗夫斯基（卒于1829年），他奠定了现代捷克文法的基础，另外还有约瑟夫·容曼（卒于1847年），在他所编的捷德词典里搜集了新旧捷克语的丰富词汇。1784年在布拉格成立的捷克皇家科学协会成为知识分子社会生活的中心。捷俄民族的接触以及关于斯拉夫世界和文化的知识，使捷克民族复兴的过程加强起来了，这方面主要应归功于多布罗夫斯基。在历史学研究方面最杰出的是斯洛伐克人巴沃耳·约瑟夫·萨法里克（1795—1861年）——他是斯拉夫考古学的奠基者——以及最伟大的捷克史学家佛朗蒂舍克·帕拉茨基（1798—1876年）。帕拉茨基通过他的著作证明了斯拉夫人民对于欧洲文化的创立所起的作用；在他的不朽名著《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捷克民族史》中，他阐明了捷克民族史的意义。优秀的解剖学家和生理学家、布拉格查理大学教授约瑟夫·普罗察兹卡（1749—1820年），对自然科学造诣极深，他所著的多卷生理学手册，在十九世纪初叶就已经译成许多国文字。扬·伊万格里斯塔·普尔基涅（1787—1869年）是一位世界闻名的生物学和生理学专家，是细

胞学理论的奠基者。

捷克文学最早的真正缔造者是诗人扬·柯拉尔(卒于1852年)、佛朗蒂舍克·拉迪斯拉夫·策拉科夫斯基(卒于1852年)和浪漫派诗人卡列尔·希聂克·马察(卒于1836年)。马察的抒情叙事诗《五月》是十九世纪捷克诗歌中最优秀的作品，这首诗曾经译成了若干种欧洲语言。

捷克新剧和杰出的戏剧家约瑟夫·卡耶坦·图耳(卒于1856年)，对民族复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从十七世纪中叶起，巴罗柯式(baroque)成为艺术中占统治地位的风格，在十八世纪末期这种风格便为古典派所代替。另外一方面，罗可科式(rococo)艺术风格在捷克地方却从来也没有扎下根。贵族和教会手中积累了大量财产，这为巴罗柯式建筑的大量发展创造了可能性，这种建筑使城市和村庄特别是布拉格市，具有一种特殊风格。巴罗柯式建筑物大多出自外国建筑师之手，主要是意大利建筑师。在世俗建筑物中最杰出的是布拉格的一些宫殿，例如瓦伦斯坦宫和车宁宫。许多巴罗柯式教堂兴建起来了，在布拉格特别是

下城的圣尼古拉教堂，赫腊德察尼的洛列托教堂和布热夫诺夫修道院。郭万尼·桑蒂尼和启里安·依格腊兹·但曾霍弗尔是巴罗柯式建筑最著名的大师。在雕刻家中最优秀的是马提亚·布伦(他的作品有查理大桥上的一些雕像，以及库克斯的雕饰)、斐迪南和扬·布罗科夫；在画家中有卡列尔·施克列塔、彼得·布兰德耳、扬·库彼茨基和代弗里涅茨·雷勒。1799年在布拉格创办的美术学院具有重大意义，这是造就绘画家的最高学府。

虽然在文学方面由于官方实行德意志化政策而变得黯然无光，而美术在捷克环境下又在一定的程度上代表了受聘的外国艺术家的活动，但捷克音乐却真正表达了这个时期的文化。早在十八世纪捷克音乐就获得了国际声誉，在这个时候捷克人证明他们不仅是各种乐器的大师，而且也是古典音乐的作曲者和先驱者。佛朗蒂舍克·哈佛·布里希为海顿同时代的人，他是能够在国内进行创作的少数捷克作曲家之一。当时许多其他音乐家为了经济的原因不得不离开祖国，并且在国外成了名。边达家族在柏林是很出名的，其中之一

依里·安托宁·边达（卒于1795年）成为音乐剧的创始者，他实现了卢骚的观念，对于“歌唱对白剧”的发展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曼海姆，扬·瓦茨拉夫·斯塔米茨（卒于1757年）和佛朗蒂舍克·哈佛·里赫特（卒于1789年）成为海顿和莫扎特的维也纳古典音乐的前辈。他们两人都是在摩拉维亚的雅罗梅里策城堡举办的音乐演奏会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伟大的音乐天才佛朗蒂舍克·米察（卒于1744年）曾居住在这里。被称作“圣波也摩”的约瑟夫·密斯里维切克（卒于1781年），在意大利成为一个著名的歌剧作者。他的作品曾经影响了年轻的莫扎特。怪不得，有高度音乐修养的捷克听众，尤其是布拉格听众，比维也纳本身的听众更能欣赏莫扎特的天才。他的作品《费迦罗的婚礼》在布拉格受到这样热烈的欢迎，以至莫扎特很愉快地为布拉格听众写成了一个新的歌剧：他的著名的作品《唐·郭万尼》，他亲自在布拉格排演了这个歌剧，并于1787年指挥它的演出。维也纳的捷克音乐家也有一些不朽的有名作品，在这当中有天才作曲家沃依特赫·伊罗维茨、巴维尔·弗拉尼茨基、列奥波尔德·柯哲鲁，

以及夭折的雨果·沃里舍克(1825年)，他被认为是弗兰茨·舒伯特的先辈。安托宁·雷夏（卒于1836年）是一位著名的音乐理论家，他的论作曲的手册一直到十九世纪的下半期在全欧仍然被普遍采用。1811年在布拉格创立了公立音乐专科学校。

斯洛伐克民族运动创造了它自己的书面语言。安托宁·伯诺拉克于1790年根据西斯洛伐克的方言写成了他的文法书。在这个时期写成了最早的斯洛伐克散文作品，扬·霍利（卒于1849年）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出版了他的歌颂古代斯拉夫人的诗集。当代最伟大的诗人扬·柯拉尔用捷克文写了一些作品，他所搜集的一些民间诗歌，对于斯洛伐克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扬·查卢普卡（卒于1871年）的著作中出现了斯洛伐克戏剧。在布拉迪斯拉发以路多维特·司徒尔（1815—1856年）为首的新教徒高级中学的周围聚集了年轻的斯洛伐克知识分子，路多维特·司徒尔是斯洛伐克民族运动的组织者，这些知识分子舍弃了原有的斯洛伐克书面语言，在1843年制定了一种新的标准文字，这是以中部斯洛伐克

方言为基础的，这种文字在今天仍旧继续使用。这种改革的成效由于司徒尔的这一辈人的优秀诗歌创作而巩固起来，这方面最优秀的代表作包括在安德烈·斯拉德科维奇（1820—1872年）和扬科·克腊耳（1822—1876年）的著作中。科学研究工作都集中在特尔拉伐大学和布拉迪斯拉发的高级中学里。

第二节　争取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独立的斗争（1848—1918年）

自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专制政体已开始显露了清楚的危机征象。德意志、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波兰（在加里西亚地区）的资产阶级普遍感到不满，因为封建主义的主要伴随物，例如落后的农业、徭役制度以及仍旧有效的基尔特行会规章，这些妨碍自由企业充分发展的重重障碍仍然存在着。由于政权仍旧完全掌握在贵族手里，就更加使他们激怒。捷克和斯洛伐克的资产阶级被迫反对哈布斯堡政体，因为他们属于被压迫的民族，他们的基本民族权利被剥夺了，不许他们

有自己的学校，并且不承认捷克语和斯洛伐克语为官方语言。尽管奥地利警察和检查制度严密地监视着公众生活，但西欧自由主义原则在这里继续传播着，最后集中提出的要求是立宪、市民在议会中应有其政治代表、实行普选和废除农奴制。捷克资产阶级还提出了民族平等的另一要求，他们拥护“奥地利—斯拉夫主义”，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奥地利帝国是保护捷克民族反抗德意志资产阶级压迫的最好保证。他们强调说，哈布斯堡君主国里斯拉夫人占绝大多数，因此应该成为斯拉夫的国家，而不是德意志—匈牙利人的国家。历史学家佛朗蒂舍克·帕拉茨基和新闻记者卡列尔·加弗利契克·博罗夫斯基（卒于1856年）是奥地利—斯拉夫主义的公开拥护者。由于平民对哈布斯堡政体的反抗日益增强，现在已经使其处于动荡不安的地位。自1811年的财政崩溃之后，王朝已经无法从严重的经济难关中自拔，他试图以加征奇重的苛捐杂税来解救困境。1831年斯洛伐克东部爆发的农奴和城市贫民的起义，进一步震撼了君主政体的基础。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捷克地方经历了严重的

经济危机。最发达的工业——纺织业——受到外国竞争的威胁，特别是英国的竞争威胁，因而不能使众多的产业工人维持必要的生活水平。受到封建主义束缚的落后的农业制度，无法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此既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求，同时也不能向工业提供足够的原料。

普通人民受生活费用日益增长的影响最大。工人们受到失业的痛苦，原因是，一方面采用了效率越来越高的机器，另方面工厂定货日渐减少。当1847年的农业歉收使降低生活费用的指望化为泡影，而各工厂又开始纷纷裁减工人时，终于无法可使革命的风暴平息下来。1848年1月在意大利爆发了革命；同年2月23日法国国王路易·腓力的政府被推翻，并宣布成立共和国。这些翻天覆地变动的消息促进了捷克的革命。

一个激进的资产阶级团体，包括著名的作家卡列尔·沙比纳(斯美唐纳歌剧的作词者)、约瑟夫·瓦茨拉夫·弗里奇和叶马纽耶耳·阿诺德等人在内，受到法国革命的鼓舞，接受了革命的民主思想，但他们并不满足于在路易·布朗和圣西门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中他们所熟悉的社会

主义共和国理想。这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对于工人阶级的凄惨生活地位感到悲愤，愿意帮助他们。当法国的二月事件消息传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开始鼓励人民行动起来。他们于1848年3月11日在圣文采斯拉斯浴池大厅召集了布拉格人民的一次重要集会，商讨向皇帝提出请愿书。小商人、工人和学生的参与，表明人民成分占居优势，可是，对于捍卫自己的纲领，其中包括提出工作权利和无补偿地废除徭役制的要求，在他们还没有这套本领而且在思想意识上还没有准备。于是在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和一些贵族的代表的压力下，在请愿书所包括的纲领中剔除了所有激进的社会要求的内容，着重提出的乃是一些民族要求，例如在官署和学校中使用捷克文，建立捷克自治机关。在圣文采斯拉斯委员会①中，自由资产阶级也占居优势，这个委员会是革命运动的执行机关，这些分子满足于斐迪南五世皇帝在答复请愿书时对他们所作的含糊其词的许诺。不久以后，在维也纳发生了革命，推翻了专制政权，打倒了梅特涅

① 因委员会设于圣文采斯拉斯公共浴室大厅而得名。

并宣布实行宪法，在政府发表的简短声明中，答应赋予全体居民以基本公民权利，和准备召集一次由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

波希米亚的革命运动并不限于布拉格一地；在乡村里农奴们都拒绝执行徭役和缴款；有些地方的农奴甚至从他们的主人手里夺走田地。这些事件是自发性的，没有系统而且互相隔绝。激进派民主主义者并未能唤醒乡村去进行坚决而统一的战斗，以铲除一切封建桎梏。这样，自由资产阶级就得以使这个运动整个说来越来越成为只是具有民族性质。德意志资产阶级的政策是打算建立一个大德意志帝国，捷克地方将包括在帝国的版图中，这样就可以继承“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①的传统。捷克资产阶级当然害怕这样一来会把经济上的强者德意志资产阶级引入，因而拒绝这些要求。在捷克地方的德意志资产阶级对这种态度的答复是退出中央革命机关——即民族委员会，这个机构是由圣文采斯拉斯委员会改组扩大而形成的。这样一来，革命运动就分成两个阵

① 神圣罗马帝国已于1806年瓦解。

营——捷克集团和德意志集团。

在斯洛伐克也发生了类似的分裂。斯洛伐克人的民族势力遭到了匈牙利资产阶级方面的反对，当匈牙利革命在胜利进行的时候，没有考虑到斯洛伐克人的感情，根据1848年4月11日的法律宣布匈牙利语为匈牙利国内唯一的官方语言。这样一来，便在斯洛伐克人和匈牙利人反对匈牙利反动势力的共同战线中间播下了不和的种子，而匈牙利反动势力则恶毒地利用了这种矛盾。

捷克自由资产阶级害怕无产阶级和可能的农民革命，因面试图同贵族及哈布斯堡王朝妥协，他们认为这种策略可以挣得对他们的民族权利的要求的许可。泛德意志主义者和泛马扎尔主义者[①]都力求统治奥地利帝国，这样就为在布拉格召集"斯拉夫人会议"创造了条件，这次会议是路多维特·司徒尔所倡议的，参加会议的有哈布斯堡帝国统治下的各个斯拉夫民族的代表（除了捷克人

① 即泛匈牙利主义者。——译者

和斯洛伐克人之外，还有加里西亚的波兰人、匈牙利东北部的乌克兰人、匈牙利的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以及奥地利的斯洛文人)。

这个会议于1848年6月2日至11日期间举行。会议是在不断增加的不安气氛下召开的，因为奥地利将军温狄什格莱兹恰于其时到达布拉格，他所负的使命是来“维持秩序”的。温狄什格莱兹是一个露骨的反动派信徒，甚至连捷克的自由主义者都不能接受他，他的到来被认作是最后的挑衅。不久就发生了他的军队和布拉格革命运动之间的冲突，接着发展成为1848年6月12日到17日的布拉格起义。市内早已设置了许多防御工事，现在就用来抵御奥地利军，在这里发生了血战，温狄什格莱兹下令炮队轰击布拉格城。最初出现在防御工事旁边的是工人、学生和手工业者；可是自由主义者和民防团(自由市民的武装组织)却叫人民失望了。许多自由主义政论家不鼓励革命的手段，却哄骗他们的读者，要使他们错误地期望和平解决冲突，从而起了不良的影响。在许多外地省份里也发生了暴动。由城乡无产阶级组织的武装支援队纷纷开赴布拉格救援，

但他们在途中就被帝国军队截击和消灭了。

斯拉夫人会议被解散了，暴动被血腥地镇压下去了。虽然如此，但它证明了捷克人民的革命精神并未被哈布斯堡王朝所扑灭，人民决定使用武力来反抗他们的压迫者。虽然维也纳政府充分利用了它所取得的胜利形势，乘机撤销了原来准备的捷克议会选举，只允许参加帝国议会的选举，并解散民族委员会，但它并不敢过分激怒人民群众。维也纳政府召回了温狄什格莱兹，也没有过于严厉地处置起义的领袖。连哈布斯堡政府也感到，假如它能继续执政的话，有许多问题需待解决。在这些问题当中最迫切的是农奴问题和徭役制，这是农村中最感不满的方面。1848 年 9 月 7 日，奥地利议会通过了德意志人左翼自由主义议员汉斯·库德利赫提出的一项法案，根据这个法案废除了农奴制以及一切货币和实物贡赋。有赖捷克自由主义代表的投票表决，徭役制也被废除了，但须作补偿：农民在未来若干年内担负赎买的债务。封建主由此获得了他们所需要的资本，把他们的半封建的地产变成资本主义企业。议会并未实现它的最主要任务：公布宪法。

1848年10月，维也纳又发生了一次革命，国会迁往摩拉维亚的克罗麦里兹城。只有极少数激进派民主主义议员留下来了；多数捷克右翼代表都一起逃往克罗麦里兹，他们在那里采取了反对维也纳革命的立场。捷克自由主义代表们总是认为，捷克民族的利益是与王朝以及皇帝的利益一致的，他们以为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服务可以换取承认捷克民族权利。他们却没有看到，捷克民族的利益同革命运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维也纳革命受到温狄什格莱兹的攻击而展开血战，斐迪南五世退位。弗兰茨·约瑟一世(1848—1916年)即帝位，在国会批准甚至算是比较稳健的新宪法之前，约瑟就解散了克罗麦里兹国会。皇帝未经国会的同意，就单独公布了一个被删改得支离破碎的"钦定宪法"来代替这个宪法。

在全欧注视下的最激进的匈牙利革命也遭到了失败。哈布斯堡王朝被废黜，一个以拉约斯·柯树特为首的共和国宣布成立。由于他错误地处理了民族问题，因而匈牙利革命运动就疏远了匈牙利的斯拉夫居民，即斯洛伐克人和克罗地亚人。由一批新教和天主教教士领导的斯洛伐克民族运

动，于1848年5月10日在里普托夫斯基-斯伐提-米库拉什宣布了它的民族和政治要求。他们要求象匈牙利议会一样建立斯洛伐克议会，开办斯洛伐克学校并承认斯洛伐克语为斯洛伐克的一种官方语言。布达佩斯的革命政府的答复是宣布戒严令。于是司徒尔、胡尔班和霍德扎等首领不得不逃出国外。正是在这个时候，马图什卡所作的《塔特腊上空的雷电》之歌——现在这个歌词已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国歌的一部分①——在斯洛伐克风行起来，人们把它作为反对马扎尔化的抗议之声。哈布斯堡政府迫于这种形势不得不对斯洛伐克人就有关他们的民族解放纲领作出了一些漂亮的诺言，可是政府并不想使这些诺言兑现。然而政府的目的却达到了：斯洛伐克人终于受驱使起来攻击匈牙利革命。革命就这样地被孤立起来了，在1849年8月被哈布斯堡政府在沙皇尼古拉派遣的俄国军队的援助下所镇压。

捷克自由主义政治家因克罗麦里兹议会的解散而遭到了彻底失败，同时也显示出他们以前的

① 国歌的第一部分《我的故乡在哪里》系佛朗蒂舍克·施克洛普于1834年所作。

行动多么成问题。激进派民主主义者再度开始鼓励人民反对政府。新的反对派是以著名的捷克新闻记者卡列尔·加弗利契克·博罗夫斯基及其他一些人为首的，他原来曾拥护帕拉茨基所领导的自由资产阶级的纲领，虽然他在许多问题上不同意帕拉茨基的看法。在自由主义者遭到失败以后，他竭尽全力反对维也纳的反革命政策。他的意见与那些激进民主主义者有所不同，他没有看到整个斗争的社会意义，首先是他不了解一个新的阶级即工人阶级业已进入政治舞台。在俄国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米·亚·巴枯宁的思想影响下，激进派民主主义者于1849年5月策划了一次反对政府的计谋。可是密谋被出卖了，事件的为首者约瑟夫·瓦茨拉夫·弗里奇、卡列尔·沙比纳、叶马纽耶耳·阿诺德及其他等人被判多年监禁。

1851年年底，"钦定宪法"又被废除，哈布斯堡王朝再度成为没有宪法的体制，并由首相亚历山大·巴赫独揽大权，因此他的名字被用来称呼这个政体："巴赫专制政体"。书刊检查又恢复执行了，并实行了更严格的警察监督，以致所有政治表现的自由都被抹煞。行政、司法和财政制度

均经改组，并建立了内阁，这个政府的某些旧制一直维持到1945年。庞大的警察机构和大量军队使这个君主国家承担了沉重的债务。在1859年同得到民族复兴的意大利的战争中，暴露了这个政体的弱点，这次战争的结果哈布斯堡王朝遭到了失败。由于战争中的挫败，使巴赫下了台，但这并没有使专制政体有所松缓。为了开辟新的财源以解救陷于破产的局面，迫使哈布斯堡政府对有钱阶级作出政治上的让步，于是资产阶级重新又提出了政治权利的要求。

因此弗兰茨·约瑟一世不得不在1860年放弃独裁政体，并于1861年2月颁布宪法，根据宪法资产阶级获得了部分政权。新建立的帝国议会(Reichsrat)拥有相当大的立法权。可是拥有土地的保守派贵族和德意志大资产阶级仍旧占优势。议会选举采取选举代表团制度（curiœ），也就是说选举权的取得以纳税额为准。这样一来，社会生活中的紧张程度便显见和缓。新的出版法的颁布，使得有可能出版了一些捷克报纸，其中最重要的是《民族报》(Národní Listy)，该报支持所谓民族党的激进派，该党又分裂成以帕拉茨基及雷格尔

为首的"老辈捷克人"保守派，和由约瑟夫·斯拉德科夫斯基及尤利乌斯·格列格所领导的比较进步的"少壮捷克人"派。这时成立了一些重要的社团组织，例如1862年建立的"鹰社"(Sokol)体育运动组织。

民族党曾拟有成立奥地利帝国联邦的纲领，这个计划是以恢复捷克王室领地的历史传统权利——也可以称之为"捷克国家法"——为基础的。捷克的事务由捷克议会和一个捷克民族政府管理。这种思想乃是否认自然法原则的，在民族党的领导人政治家之一帕拉茨基的《奥地利国家的概念》一书(1865年)中，清楚地表达了这种思想，这种想法破坏了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运动的联盟，因为斯洛伐克人不能够诉诸历史和法律的公断。民族党中的老辈捷克人派打算寻求拥有土地的大贵族和最早的捷克工业家来支持这个纲领；少壮捷克人派方面则集中注意于农民、工匠和知识分子。和老辈捷克人恰恰相反，他们不同意以这种消极抵抗的策略作为实现上述纲领的手段，于是在稍迟以后于1874年，他们组成了自己独立的政党。

1866年爆发了哈布斯堡帝国和普鲁士之间的战争。这次冲突的责任应由普鲁士承担，因为它企图控制德意志联邦，其成员中包括奥地利在内。面临当前的危机，政府开始进行谈判以求取得议会中的反对派捷克和匈牙利议员的支持。匈牙利代表们断然拒绝任何形式的援助，只要他们关于成立自治政府和关于民族自由的要求不能得到满足的话；而捷克议员们则再次表示效忠于王朝，并充分支持拥有土地的贵族。战争的结果是奥地利军队于1866年7月在东部波希米亚的赫腊德次-克腊洛佛的溃败，于是哈布斯堡王朝投降。奥地利被逐出德意志联邦，在联邦中普鲁士起了操纵一切的作用，因而奠定了一个新的德意志帝国的基础，新帝国是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战败法国之后建立的。

担心匈牙利贵族和资产阶级方面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奥地利政府答应了匈牙利议员们的要求，而拒绝捷克代表的要求。1867年帝国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包括来塔河以西的所有奥地利领土（即捷克王室领地、奥地利和加里西亚），另外一部分则包括来塔河以东的地方（即匈牙利王室领地）。

这样一来就建立了一个二元体制，这个二元体制在“奥匈帝国”这个正式名称中很清楚地表现出来了。匈牙利贵族和资产阶级有了自己的议会和政府：除了外交政策、财政和其他某些职能是共同执行的以外，其他权力则掌握在他们自己手里，匈牙利贵族和资产阶级便利用来推行其沙文主义政策，以排斥非匈牙利民族，特别是斯洛伐克人。在斯洛伐克实行了严格的匈牙利化的措施。1848年以后所开办的一些斯洛伐克学校都被封闭了，1862年成立的斯洛伐克人唯一的民族文化团体“斯洛伐克学会”(Matica Slovenská)也被解散了。斯洛伐克知识分子只能够在匈牙利学校里受教育，这个事实再度阻碍了斯洛伐克的文化进步。

1867年的“十二月宪法”对于帝国的体制作出了宪法上的新安排，这部宪法一直维持到1918年君主政体终结时仍旧生效。这部宪法采取了盛行于西欧国家的政治安排，例如集会结社权利、信教自由、出版和教育自由等等。可是这并未铲除某些封建残余，例如拥有全国大部土地的大领地所有者在国家经济和政策方面的特权地位，皇帝、皇族和贵族的政治势力，特别是在军队和外

交政策方面的权势，以及天主教会对文化和教育发展方面的巨大影响。封建主义残余在匈牙利表现得更为清楚，在那里资本主义发展较迟因面资产阶级也比较弱些。虽然如此，但“十二月宪法”基本上从法律方面表现了资本主义制度在奥匈的胜利。

二元体制的建立，以及在这个体制中德意志资产阶级在来塔河以西所有奥地利地方占居统治地位，意味着捷克资产阶级政策及其努力投靠封建主义的失败。捷克资产阶级在反对强大的德意志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依赖同反对德意志资产阶级的贵族所缔结的不稳定的同盟。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看，即使有了这种同盟它还是失败了，因为 1867 年标志着从法律方面承认了资本主义在奥匈的胜利。

十九世纪下半叶，捷克地方的工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特征乃是机器工业的发展越来越超过了纺织工业，结果使城市有了进一步的扩增。与人口增长较慢的纺织工业重镇利贝雷次比较起来，比尔森及布拉格近郊的杰兹科夫、维诺赫拉迪、斯米肖夫和卡林，则人口猛增，比尔森变成

了波希米亚的第二大城市，这些都是最早的机器工业基地。在这个时期创办的一些大企业至今仍然继续存在，例如斯米肖夫的制造滚珠轴承的林霍佛尔工厂、卡林的丹涅克机器制造厂（随后改称捷克摩拉维亚科尔本-丹涅克机器厂），该厂制造各种通用机器，以及比尔森的斯科达机器制造厂。制糖工业也扩展起来了，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开始向国外市场扩张。在布尔诺也建立了一些机器厂，其他部门的工业企业特别是铁路的修建，也有很大的增长。当1867—1873年繁荣时期，银行业有了很大的发展，1869年创立了第一个捷克银行，即“工艺银行”，随后又创设了一些银行和股份公司。在商业企业中，德意志的资本占统治地位。1873年的股票交易的破产间断了经济的发展，并引起了一次经济危机，这次危机一直延续到1879年。较弱的企业破产了，资本更加集中起来，特别是德意志的资本趁机利用了这种情势。资力比较雄厚的机器厂靠着扩增对东欧、东南欧、土耳其、印度和南美的输出而渡过了危机。在这个时期又出现了一系列的新企业，例如1881年成立的克日杰克公司，这是第一个制造电气设备和建筑电气

铁路的企业。在1886年斯科达机器厂建立了第一座铸造工场，并开始生产枪炮和装甲车。由于炼铁工业和沃斯特拉伐-卡尔维那和克拉德诺煤田的煤矿的增长，使机器工业的发展成为可能。摩斯特和伐尔克诺夫地区的煤这时就用来出口，主要输往德国。捷克地方的人口到1890年左右已增长到大约九百万。虽然捷克地方的工业有了迅速的发展，但仍不能维持这样大量增长的人口，因为农业情况还很糟，在农业方面最急需的乃是实行土地改革。占小土地所有者总数五分之四的农民只保有百分之十二的土地，而其余土地则属于大地产和贵族大领地。差不多在所有大地产上都采取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小土地所有者的生产增长得很慢。只有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小土地所有者才采用了轮作制以代替土壤耕作的三圃制，而人造肥料和农业机器则几乎从未使用过。

在这种情况下，移居国外的比率很高，特别是移往美国的人数甚众，从1857年到1890年约有五十多万人迁出捷克地方。1870年以后，出生率下降，这种特征一直保持到1946年。

普鲁士的勃兴及其战败法国，使哈布斯堡王

朝统治集团惶恐不安起来，并迫使他们同捷克政治家们开始谈判。自 1867 年以后，捷克政治家采取消极抵抗策略，拒不出席国会两院会议。捷克反对派只限于同君主和反动政客们进行谈判，他们再一次托庇于有势力的保守派贵族。1871 年谈判的结果，订立了所谓“基本条款”，根据这个条款把现行的双重体制变成三权鼎立之势。条款规定应建立捷克立法会议和一个捷克政府，由捷克人充任总理，他代表捷克地方参加帝国政府。只有涉及整个帝国的事务才提交帝国议会讨论。但是这个“基本条款”并未付诸实施，因为一方面德意志和匈牙利资产阶级力加反对，同时外有普鲁士和沙皇俄国施加的压力。捷克问题解决的失败造成了立宪政策的最后崩溃。由此证明资产阶级在解决有关捷克民族进一步政治发展的基本问题上，无能为力。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捷克工人提出的政治要求越来越坚决。工人斗争的最初目的是争取选举权，因为根据现行选举法，工人们被剥夺了选举权。关于集会结社权利的法律，促进了工人

阶级最初的政治组织的成立和最早的工人报刊的出版。斐迪南·拉萨尔所创导的工人运动，从德国方面鼓励了工人阶级社团的形成，而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学说逐渐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1868年，波希米亚境内利贝雷次城德意志工人组成了全奥的第一个社会民主党组织。六十年代末期，布拉格工人仍旧处在资产阶级的影响下，特别是受到老辈捷克人党的影响，他们企图提倡“自助”合作的办法以转移工人们的政治积极性。另外一方面，少壮捷克人党则力求争取工人们拥护立宪国家主义。在1873年的《工人报》上发表了社会民主党纲领；在1874年召开的纽道费耳代表大会上有捷克工人代表的参加，会议上成立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该党对此后的捷克工人运动的发展起了强烈的影响。

由于工业企业大多集中在德意志资本家手里，这个事实使捷克工人的注意力集中于民族斗争。然而，在1878年4月7日，捷克-斯拉夫人社会民主工党终于成立了。奥匈帝国全境工人运动的勃兴使统治集团惊慌失措，因而他们不得不决定更改他们的策略。显然他们只好对帝国内各

个民族的资产阶级作出让步，以便取得他们对新政府政策的支持，来反对日益开展的工人阶级运动。由首相塔费伯爵领导的新政府(1879—1894年)的任务就是这样的，这是在所有的奥地利政府中最反动和维持得最久的一届政府。捷克资产阶级又同意了在对方作出某些有限让步的条件下参加这个政府，例如政府在1882年把布拉格大学改组划分为捷克和德意志人的两个独立机构，以及承认在外交事务方面捷克语和德语都具有官方语言的同等地位。

在捷克-斯拉夫人社会民主工党建立以后，奥地利政府开始对工人运动采取高压手段，因此社会民主党的历次会议和代表大会不得不秘密举行。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政府认识到想要对工人运动采取镇压手段是徒劳无益的，于是对运动的压制放松了，自此以后社会民主党就变成半合法的政党了。1888年在下奥地利的哈因菲得城举行的全奥代表大会上，达成了奥地利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士在思想意识和纲领上的统一。可是，这次代表大会对民族问题却避不作任何解

决，这显然对奥匈国家内革命的工人运动进一步的发展起了极其不利的作用。

德意志资产阶级理解到，他们已经无力维持在捷克地方的权势，因而打算至少要挽救他们在大多数人讲德语的边境地带的地位，他们准备在这里建立德意志波希米亚的一个特别省。这种主张(即所谓"协议观点")在各个捷克政党看来，只有老辈捷克人党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他们因此就干脆听任边境地区的捷克居民德意志化。在这种民族斗争的群情激昂的气氛下，老辈捷克人党的这种企图造成了它在政治上的彻底失败，于是在1891年的选举中，他们真可谓被赶下了政治舞台。这样一来，建立捷德居民区的计划完全破产了。

随着本世纪中期开始起的全国的普遍进步，捷克文化生活，特别是各级教育事业也都有了进展。根据1868—1869年的法律实行了八年义务教育制，因此文盲的数目已减至最低限度。独立的捷克大学的恢复，使其有可能训练高级捷克知识分子，和进一步推进捷克科学。在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方面，布拉格的捷克工业大学这时也成

为一个独立的机构，除了原有的捷克皇家科学协会之外，1890 年又创设了捷克文理学院。

在本世纪中叶，出现了许多杰出的文艺作品，其中有波哲娜·聂姆错娃（卒于 1862 年）的《祖母》，以及卡列尔·雅罗米尔·叶尔本（卒于 1870 年）搜集的《民歌选》。虽然散文作品和戏剧方面没有出类拔萃的杰作，但捷克诗歌则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主要是指扬·聂鲁达（卒于 1891 年）、斯瓦托普卢克·蔡赫（卒于 1908 年）、约瑟夫·瓦茨拉夫·斯拉戴克（卒于 1912 年）和雅罗斯拉夫·弗尔赫利茨基（卒于 1912 年）的作品。后面这两位诗人又是优秀的翻译家，他们把好几国文字的作品译成捷克文，因此大大促进了捷克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接触。和前此单单注意德国文学的情况恰恰相反，这时对法国、意大利和英国文学中的一些巨著有了较细密的研究。捷克散文作家特别是受到了俄国古典小说的影响。

戏剧对于捷克新文化的形成起了最重大影响。第一件值得一提的是修建一所适合于国人需要能够经常演出的剧院。于是全国发起了大规模的捐输，使用捐输的资财修建了布拉格的国立剧

院，在这座剧院的舞台上面饰以"民族自己的风格"字样的铭刻。国立剧院于1881年开幕不久以后就完全毁于大火，但在1883年又依靠全国的支援重新修复了。这座具有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物是捷克建筑师约瑟夫·杰蒂克（卒于1909年）的杰作，几乎所有年轻一代的艺术家们都参与了剧院的装饰工程。捷克艺术中的最著名的大师之一是约瑟夫·曼涅斯(1820—1871年)，他是世风画的巨匠。步曼涅斯的后尘，米考拉什·阿莱什(1852—1913年）继承了大众艺术的传统和注意研究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学，并且通过对捷克历史中人民生活的描绘，他用艺术形象表达了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和斯拉夫各民族人民对这个民族的同情。捷克风景画家受到法国艺术的影响创作了杰出作品的有：约瑟夫·纳弗腊蒂耳、阿道夫·柯萨列克、尤利乌斯·马夏克和安托宁·希图西；在肖像画和静物画方面最优秀者是卡列尔·普尔基涅。雅罗斯拉夫·车马克和瓦茨拉夫·布罗杰克是最著名的史实画家。十九世纪捷克雕刻艺术史上占统治地位的是约瑟夫·瓦茨拉夫·密斯别克(1848—1922年)的伟大创作。

十九世纪的捷克音乐，继承了十八世纪捷克古典音乐的传统，并有了惊人的进步。注意力集中在创造一部民族的歌剧上面。第一部捷克歌剧是佛朗蒂舍克·施克洛普(前文业已提及施克洛普曾创作了国歌中的一部分《我的故乡在哪里》)于1826年写出的作品《补锅匠》。可是在歌剧这个园地里最大的功绩应归于贝德里赫·斯美唐纳(1824—1884年)，他创作了八部成熟的歌剧，其中最著名的是：《被出卖的新嫁娘》、《达里波尔》、《利布舍》和《吻》。他的交响乐也是很有名的，例如他的交响诗回旋曲《我的祖国》，他的著名作品还有室内音乐(弦乐四重奏《我的生活》)和五部钢琴曲，特别是《捷克舞曲》。安托宁·德沃夏克使捷克音乐闻名于世。他的交响曲作品，例如《新世界》和《伦敦曲》，他的大合唱曲和其他作品，已经变成国际上经常演出的节目。即使在斯美唐纳以后，在一些作曲家的优秀作品中，歌剧仍占有最显著的地位，而德沃夏克自己就创作了好几部歌剧作品，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是《水仙女》。兹德纳克·菲比赫(1850—1900年)的作品在国外名气较小，他写了一些歌剧和交响曲(通俗歌剧《赛马

场》三部曲，据雅·弗尔赫利茨基的脚本而作)。奥塔卡·霍斯亭斯基(1847—1910年)是捷克美学和捷克音乐理论的奠基者。

斯洛伐克文化因受到粗暴的匈牙利化政策的多方压制，它的发展要困难得多了。1868年斯洛伐克的创办国立学校的法令只是一纸空文：文盲仍旧没有扫清，一般教育水平也未能提高，因而阻碍了斯洛伐克工人运动的成长。斯洛伐克的中等学校于1873年都撤销了，而在匈牙利各大学中的斯洛伐克学生所占比率不及百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斯洛伐克文学的首要任务就是力求保持斯洛伐克语言和文化的生命。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斯洛伐克文学中的杰出人物有诗人巴维尔·俄斯扎·格维兹多斯拉夫(1849—1921年)，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对斯洛伐克劳动人民的同情和了解；还有马丁·库库钦(1860—1928年)，他是一位现实主义散文作家。大多数斯洛伐克画家和雕刻家都曾在布拉格美术学院研读过。其中最优秀的是彼得·波亨(卒于1879年)，他以肖像画作品和对斯洛伐克民间习俗的研究著称，约瑟夫·波哲特赫·克来门斯(卒于1883年)也是一

位杰出的肖像画家。拉迪斯拉夫·杜纳伊斯基（卒于1904年）是一位优秀的雕刻家；波亨、克来门斯和杜纳伊斯基成为斯洛伐克民族艺术流派的奠基者。和捷克地方的情况相反，斯洛伐克虽然民歌十分丰富，但在音乐方面却没有多大进展。只有在教会音乐及赞美诗歌方面有着一些比较显著的成就。

在这个世纪交替的时候，捷克地方工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转变往往被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新阶段的基础是在工业方面利用电力和内燃机器，开始使用自动化机器工具和越来越多地在生产中应用化学方法。在这个时期，机器工业有了十分明显的增长，使捷克地方成为欧洲机器工业生产部门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在这里很早就奠定了汽车工业生产的基础。1899年，姆拉达-博累斯拉夫城的捷克公司“劳林和克利门特制造厂”开始生产摩托车，这是欧洲第一个摩托车生产者，1905年捷克摩托车在法国的道尔顿国际竞赛中获得优胜。同一年，该公司成为奥匈帝国的第一个汽车制造厂；其后姆拉达-博累斯拉

夫的汽车生产被斯科达公司赶过了。第一辆捷克制汽车早在1897年就由科普什弗尼策工厂制造出来了，但迟至1906年才转为成批生产。另外一种最初设计的“塔特腊”型汽车也开始了生产。第一个捷克-摩拉维亚机器工厂（后来改称布拉格捷克-摩拉维亚科尔本-丹涅克机器厂）于1907年建立了另外一个工厂，专门生产布拉格型汽车。叶美尔·科尔本于1896年在布拉格创办了一个大规模的电气技术企业，开始生产电车和电厂设备输往全欧。1903年属于佛朗蒂舍克·克日杰克的一个企业修建了波希米亚的第一条电气铁路。1889年创办的捷克-摩拉维亚机车制造厂以及前面提过的布拉格林霍佛尔制造厂过去只输出铁路车辆，现在开始输出铁路机械。食品工业用机器（炼糖机和酿酒厂用机器）、纺织工厂用机器的生产和农用机器的制造都急遽增长。冶金工业的发展加速了工业方面的这些进步，在冶金工业中现在已开始使用平炉炼钢。捷克地方占奥匈帝国工业总产量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整个工业发展的典型特征是资本积聚和最初的垄断组织与卡特尔的形成：工业在这个时候受

到财政资本的统治。捷克资本在捷克地方终于取得了优势地位(虽然德意志资本仍旧相当强大,而西欧资本整个说来还有很大势力),接着捷克资本就开始向帝国范围以外发展，它开始向比较不发达的国家输出,主要是对东欧和东南欧。结果,捷克资本同奥匈帝国在这些国家的侵略性外交政策结下了不解缘。工艺银行在维也纳、切尔诺维策(在布哥维那州)和的里雅斯特设立了分支机构,它成为欧洲范围内的一个银行康采恩。

从居民的各个不同职业的对比数字上可以显示出工业在波希米亚占有统治地位。1910 年的人口超过一千万,其中只有百分之三十六从事农业,其余则从事工业、运输和商业等部门的工作。

斯洛伐克的情况就有所不同，在这里也象整个匈牙利一样，工业发展十分缓慢，而重型机器制造业所占份额为数极小。工业化比率增长缓慢可从下述事实看得出来，即在二十世纪初期，三百万斯洛伐克人当中，工业、运输和商业的从业人员占百分之二十二,而在 1910 年则占百分之三十五。

从上列数字显示出,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工

人阶级已经成为捷克地方的一个重要势力（虽然他们还没有选举权）。1890年5月1日的群众游行示威第一次显示了工人运动的巨大力量，从这一年起，由于不断发生大规模的罢工，迫使煤矿和其他工业部门减少了劳动时间。自1893年以后，社会民主党所领导的工人运动主要是争取普选权。政府于1897年被迫至少作出了部分的选举改革，除了原有四类选举人代表团之外，现在又加上了第五类即一般代表团，这一类当中包括无力缴纳高税额者的代表，也就是工人也可以参加选举。在四百二十五个议员席位当中，这一类代表只分配有七十二席，同时其他各类选民也可以参加这一类的投票，这些选民就是在其他各类选举人代表团中有选举权的有土地的上流人士、富有资产阶级和小康的小地主。在上流社会选举人代表团中，只需五十九票就能选出一名代表，可是在工人选举人代表团中则需七万四千票以上才能选出一名代表。所有的资产阶级党派都反对实行普选的要求。

巴德尼伯爵新政府在教育和其他方面作出了一些让步，主要是涉及使用民族语言的问题，借以

平息捷克人民对少壮捷克人党代表亲奥政策的不满情绪。关于语言方面的法规引起了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反对，他们过分夸大这些法规的重要性，把这作为口实来制造反捷克的示威和在维也纳议会中制造障碍，从而迫使巴德尼政府辞职。最后，在1899年特亨政府终于不得不废除了语言法规，结果在议会中德意志人制造的障碍现在被捷克代表的障碍所代替了，捷克民族主义者开始进行游行示威。由巴德尼语言法规所引起的这种混乱是奥匈帝国内民族纠纷的特征，在帝国以内无法解决这些纠纷，因而成为帝国内部分裂的表现。

社会民主党人低估了民族问题在反对民族主义斗争中的重要性，于是捷克资产阶级得以利用了这个弱点。少壮捷克人党打算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对工人运动的团结播下分裂的种子，因于1897年创立了国家社会党，这个组织滥用了工人的民族情感从而鼓动他们反对其他民族。他们施用蛊惑性宣传，宣称社会民主党工人的国际主义使他们成为民族的叛徒，从而把部分工人拉到他们那一边去。由于担心社会民主势力渗透到乡村，部分大地产所有者另行组织了农民党，结果少壮捷

克人党丧失了这一部分人。这时又出现了几个教会的政党，而1900年由托·加·马萨利克创立的进步党在知识分子当中获得了很大的名气。马萨利克是查理大学的哲学教授，并且是政坛上的一位名流。和其他资产阶级政治家有所不同，马萨利克看到了资本主义内部的深刻冲突，因而试图通过改良手段以防止社会革命。他主要是通过自己的著作《社会问题》一书去影响一些社会民主党领袖，使他们接受他的改良思想，以代替按照马克思主义学说进行社会革命。他也为反对镇压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奥地利政策和反对教会至上的权势而斗争。

自九十年代以后，斯洛伐克的政治生活中也分为若干个集团。包括斯洛伐克工人在内的社会民主党，由于匈牙利工业化落后的缘故，迟至1890年才成立。大多数斯洛伐克工人集中在布达佩斯、布拉迪斯拉发和科希策几个城市。第一个出版斯洛伐克工人报纸的地方是在布达佩斯，而在布拉迪斯拉发于1905年成立了第一个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在斯洛伐克有三个资产阶级的政党：斯洛伐克民族党，相当于少壮捷克人党；教

会的斯洛伐克人民党，由安得烈·格林卡领导；以及呼声党①，其性质类似马萨利克领导的进步党。

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在1905年进人了最后阶段，同一年的俄国革命对捷克人民的这一斗争起了强烈的影响，同时也大大刺激了工人运动。在1907年，经过大规模的示威和罢工之后，终于在一次总罢工的压力下，奥地利政府颁布命令在奥匈国家境内实行普选。第一次以普选为基础的议会选举，大大改变了捷克和斯洛伐克各政党的政治力量。社会民主党在捷克地方赢得了大多数选票，少壮捷克人党丧失了领导地位，同时也落后于农民党，而几个保守派政党则彻底挫败了。在斯洛伐克，格林卡的教会政党领先，而社会民主党人的数目较少。

由于彼此都害怕工人的群众运动，捷克和德意志的资产阶级便结在一起了。当广大的人民群众要求捷克地方政治独立的时候，而捷克资产阶级却热衷于紧密地投靠奥匈帝国，因为这里提供

① 党名取自该党所出版的《呼声报》(“Hlas”)。

了一个有利可图的广大市场，在帝国范围内的落后地区即在匈牙利、加里西亚和巴尔干一带，大有投资的机会，而巴尔干正是奥地利的侵略性外交政策所垂涎的。因此捷克资产阶级各政党在帝国议会内投票赞成对外用兵的建议和发行军事公债，因为通过战争扩张现有市场对他们是有利的。在大战前，马萨利克在外交政策方面虽然与维也纳政府的方针有些出入，但连他也拥护在联邦制的奥地利范围内来解决捷克问题。社会民主党人的领袖也愿意维持奥地利帝国。

在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中，奥匈帝国站在德国帝国主义一边，因为奥匈扩张主义者对巴尔干感到兴趣。捷克民族对这次战争也脱不了历史责任。多数捷克政客相信帝国会取得胜利，因此支持了政府。可是，由少壮捷克人党政治家克拉玛什博士领导的一部分捷克资产阶级则公开站到沙皇俄国一边。许多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在参加奥军开到俄军前线的时候，径自投向对方自愿成为俘虏，他们指望有一天能同俄国人一道肩并肩地攻打哈布斯堡帝国。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鉴于俄国的衰弱，而投靠于西方大国，即英国、

法国、意大利和美国。托·加·马萨利克、爱德华·贝奈斯和斯洛伐克人米兰·腊斯提斯拉夫·施特法尼克在这方面开始了他们的活动。捷克工人阶级通过游行示威、罢工和其他群众斗争形式，站在社会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最前列。可是工人当中的社会民主党领袖，未能很好地认识到民族和社会关系的本质，并且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的维护奥匈国家的政策影响下，采取了消极立场。虽然自 1916 年以后，由于战时的饥荒和贫困而引起了大规模反战和反对政府的局面，但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并没有好好加以利用。1916 年和 1917 年在比尔森、沃斯特拉伐、维特科维策和普罗斯特约夫等工业区的一系列示威游行，都被血腥地镇压下去了，在普罗斯特约夫有二十三人流血牺牲。

西方各大国在战争中所争取的目的主要是反对第一号竞争者德国，它们倒并不想打垮奥匈。美国于 1917 年参加协约国一方面对德作战，美国在这方面的政策也没有两样，这可以从 1918 年初发表的著名的威尔逊总统十四点和平原则看得出来，在这个文件中并没有提到要废除多民族的哈

布斯堡的国家。文件的第十点说到："奥匈国家的各族人民应该获得自治发展的最自由的机会，我们愿意看到他们在国际间的地位得到保护和保障"。

与此同时，另外一些事件大大影响了奥匈帝国的瓦解。1917 年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一个工农政府，颁布了和平法令，并宣布所有各民族都享有自决权，包括退出联盟的权利在内，这个革命刺激了捷克人民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斗争。1918 年 1 月间发生了大规模的总罢工，在布拉格一地参加罢工的就有十五万工人。罢工者要求结束战争，缔结和约，要求赋予捷克民族以自决权和宣布建立共和国。1918 年五月节的纪念采取了一个广泛的政治示威的形式，在游行示威者举起的旗帜上写着"我们要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在斯洛伐克，工人们的情绪也变得更加激昂了，1918 年 5 月 1 日斯洛伐克的工人举行了一次重要的示威行动，在里普托夫斯基-斯伐提-米库拉什通过了一项决议，除了工人的一般要求之外，还要求斯洛伐克和捷克民族建立一个共同的国家。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捷克和斯

洛伐克士兵拒绝为奥匈国家作战。1918年2月间，奥匈海军士兵(包括许多捷克人在内)在波卡-科托尔(当时的卡塔洛)起义，并在海军上将旗舰圣乔治号上升起了红旗。同年五月，一个斯洛伐克军团和一个捷克军团分别在李马夫斯卡-索伯塔和伦堡起义。运上前线的士兵在半途中就逃散了，潜藏到森林里。奥地利的各条战线都开始崩溃。

1918年，西方各大国准备对新生的苏维埃国家进行武装干涉。它们打算利用具有相当大军事力量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这些军团是由在俄国的捷克和斯洛伐克籍的侨民与战俘所组成的，他们曾经与俄国军队共同作战。西方国家的捷克侨民代表准备把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交给干涉者指挥。因此，在1918年5月间，将近5万名捷克和斯洛伐克士兵被卷入了反对苏维埃政府的战争。他们得以控制了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线，并开辟了伏尔加河的战场。尽管最初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并未能达成最后的目的——占领莫斯科。在作战的过程中，军团中的许多成员逐渐认识到，他们不是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人民

的利益而战，而反对俄国革命的战争是为了西方资本家的利益。结果将近有一万人，大多属于左翼社会民主党人，脱离了干涉者的军团，转到红军一边，同红军并肩作战反对白卫军和干涉军(在这些起义军中有一个叫做雅罗斯拉夫·加雪克的，乃是小说《好兵帅克》的作者)。1918 年 5 月底，起义军的代表在莫斯科召集了一次会议，会上成立了旅俄捷克斯洛伐克人共产党。

大战已进入结束阶段。捷克资产阶级深深认识到由革命思想武装起来的群众一旦推翻了政府的话，将要发生怎样的情况。因此资产阶级领袖们决定立即夺取那无法抑制的解放运动的领导权，并制止其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1918 年 7 月，民族委员会开始执行反抗运动的最高机关的职能；委员会中包括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和一名斯洛伐克代表。绝大多数的捷克劳动人民不同意这个屈从于资产阶级政党的政策，因于 1918 年 9 月间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组织——“社会主义者会议”，这个会议由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和国家社会主义者组成。1918 年 10 月 14 日，社会主义者会议号召举行了一次总罢工，这次罢工终于提出了建立一

个独立的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要求。但由于民族委员会的强力干涉，迫使社会主义者会议服从它的领导。1918年1月28日，消息传到布拉格说，奥地利政府业已接受威尔逊总统的和平条款(即十四点和平原则)，总的说来这就意味着奥匈帝国业已投降。在同维也纳政府直接达成了协议之后，民族委员会立即以新的国家的名义接收了政权。在斯洛伐克，资产阶级的代表同样组成了一个斯洛伐克民族会议，会议于1918年10月30日在马了召集，并宣布斯洛伐克同捷克地方合并。

捷克斯洛伐克宣布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消息，使西方大国的代表们甚为吃惊，并迫使他们承认这个既成事实。随着奥匈国家的崩溃，成立了一个独立的捷克国家，斯洛伐克也加入了进来，这样，中断了三世纪的这个独立国家就又恢复了。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生活中的一个巨大进展。这是在受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鼓舞而引起的劳动人民的革命浪潮下实现的。由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成

立，使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能够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国家里，这是两个民族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目的。另外一方面，捷克地方和斯洛伐克的工人阶级和普通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并未就此完结。捷克和斯洛伐克工人不久就认识到，他们还必须继续努力争取完全解放，不仅需要实现民族解放，还需要实现社会解放。

第　九　章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

1918—1939年

奥匈帝国的沦亡，带来了中欧新的经济和政治情况。捷克斯洛伐克是在哈布斯堡帝国的遗迹上兴起的最重要的继承国家。它承袭了奥匈国家四分之三的工业，它在中欧的四通八达的地理位置，使它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虽然捷克和斯洛伐克的资产阶级通过1918年10月28日的革命，取得了新国家的政权，但国际革命运动的规模和势力是资产阶级当局的一种经常的威胁。因此资产阶级代表主要的努力是要确保捷克斯洛伐克能够尽快地奠定坚强的国际基础。在这方面，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利益是和西欧各国政府的利益一脉相通的。首先是法国把这个新国家认作是它自己在中欧执行实力政策的一个重要代理者，因此在

1919年初召开的巴黎和会上，它支持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所提出的领土要求和其他要求。整个说来，它的领土要求得到了满足，于是这个刚刚宣布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疆界最后在和约中确定下来了。因为西欧各国的统治集团想把捷克斯洛伐克当作“一个和平和秩序的岛屿”，使其起着反对苏俄和反对整个中欧革命运动的一个缓冲地的作用，因此它们很乐于把外喀尔巴阡乌克兰地方归并于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内，这里的居民属于乌克兰民族，他们大多愿意并入苏维埃乌克兰。这样一来，捷克斯洛伐克的面积约有十四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为一千五百万，其中大约只有一千万人属于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其余则属于少数民族，人数最多的是德意志族（三百二十五万）和匈牙利族（约有七十万），其余的是波兰人和乌克兰人。捷克斯洛伐克外交政策的特征是它的反苏偏见，而这恰恰是和一般人民的亲苏态度完全相反的。

从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成立之时起，它就面临严重的经济问题，特别是与工业品输出和原材料输入有关的问题。由于前奥匈国家范围内广大市

场的丧失，和受到技术发达的国家竞争的压力，使捷克资产阶级处于艰难的境地。捷克资产阶级摆脱困境的办法是牺牲过去占统治地位的民族(德意志族和匈牙利族)的资产阶级，企图把他们的部分经济特权攫取过来，另外一方面就是牺牲工人阶级，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准。一项重要的经济措施就是股份的“归化”，由于当时的整个发展情况，采取此项措施是有必要的。正如前面所说，虽然奥匈工业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是在捷克领域以内，但控制这些工业的股份公司却集中在维也纳。然而，实行“归化”的主要理由不仅是要转移工业中心，以及把商业与运输企业转移到捷克境内，同时也是要摆脱维也纳方面的经济势力和加强捷克资产阶级的地位。“归化”的结果把大量资本集中到主要的捷克银行，首先就是工艺银行，该行成为全国最强大的一个金融集团。

其次的一项措施便是1919年的币制改革，这使捷克斯洛伐克的货币摆脱了贬值的奥地利货币的影响。和这个措施伴随而行的是高度的通货收缩政策，这个政策也象财产税一样，随后制定成法律了，这些政策的执行，使资本家发财致富，

而把沉重的负担加在劳动人民身上。

捷克资本家也试图渗入东南欧市场。另外一方面，西欧资本开始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同盟各国提供的各种贷款使共和国在政治上更加依靠它们。

另外一个大问题是土地问题。捷克斯洛伐克的田地和森林约有百分之三十左右属于一小撮大地产所有者。这样就引起了农村的骚动。统治者害怕农村地区酝酿的革命事件会和工人中间的革命运动联合起来。因此所有资产阶级政党提出了土地改革的要求，以便满足小农的土地荒。对于城乡革命运动合流的恐惧越来越厉害，因为工人的态度变得愈益激烈，并迫使1918年12月举行的社会民主党第十二届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没收大地产、矿山、大工业企业和银行。

1918—1920年是争取控制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未来发展方向的时期。民族委员会经过自动扩大，建立了临时国民议会。国民议会选出了第一届联合政府，所有政党(包括社会民主党)都参加了这个政府，担任政府首脑的是捷克金融资本的代表卡列尔·克拉玛什博士。托·加·马萨利克被选

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鉴于工人和农民的革命情绪，政府不得不采取权宜之计，作出了许多让步。政府准许了把某些民主自由变成法律(言论出版自由、集会自由和罢工权、八小时工作日、佃租的保障、国家失业救济金的发放、健康保险，诸如此类)。其中最主要的是提交议会审议的土地改革法案，根据这个法案将把差不多一千万英亩土地从大地产所有者手里剥夺过来。前土地所有者能够保留的田地面积最高不超过三百七十英亩，森林面积不超过六百一十七英亩；超过数额则分配给小农。可是，在作出这种让步之余，克拉玛什政府却加强了官僚国家机构，特别是警察和宪兵等武装部门。政府违背了自己原来的诺言，没有建立一支瑞士类型的民兵，却急于在法国军事代表团的支援下成立了一支军队(直到1925年总参谋长还是一个法国将军)。

当1919年3月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的革命运动又获得了新的推动力。同年六月间，东斯洛伐克的普雷肖夫城的工人们宣布成立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在西

方列强的倡议下，开始策动反对匈牙利革命的武装干涉运动，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都参与了这个运动。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被击败了，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也跟着溃败了。

但在1919年6月间捷克地方的市议会选举中，人民显示了他们反对克拉玛什政府政策的态度。资产阶级政党被击败了，社会党获得了多数。人民期望社会党将实行人民的基本要求，至少是实行关键性工业部门的社会主义化。克拉玛什政府辞职，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弗拉斯提米尔·突沙受命组织新政府。这个政府违背了人民对它的期望：突沙和农民党一起组成了一个联合政府，把最重要的一些政府职位交给资产阶级手里（例如内政部长、农业部长和财政部长），大体上它仍旧继续了前政府的政策。最主要的是，突沙阻止了工人们过去所提出的对资本家的企业实行国有化。为了答复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的这个行动，马克思主义左翼分子组成了自己的集团，作为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个独立运动，他们宣布拥护第三共产国际的原则。左翼领袖是波胡美·施美拉尔博士、约瑟夫·哈肯和安托宁·萨波

托茨基。

直到1920年初，政府才把一份宪法草案提交议会审议。接受这样的宪法，使人们又增添了新的失望，虽然宪法在形式上对全体人民保证自由和民主，但对工业企业和银行的私有制却毫未触及。政府过去答应宪法中对于最重要的生产工具将实行社会主义化的诺言，仍未履行。当然，长期以来所要求的人民应有工作的权利，也没有包括到宪法中去。在新的宪法基础上，1920年4月举行了第一次国民议会的选举，结果资产阶级被击败了，而胜利属于社会党一方面。虽然如此，突沙再度受命组成新政府，他仍无意放弃同农民党合作组织联合政府的原则。他对政策的宣布，简直是对竞选时所作一切诺言的讽刺。显然现在已经临到较量实力的时候了。

左翼势力正在全国各地开始集聚力量加强他们的地位。1920年夏，红军胜利进抵波兰，大大刺激了这里的革命运动，使其达到了最高潮。当政府试图参加反对苏俄的战役时，群众举行示威游行迫使政府宣布中立。但一当红军在波兰战线上的攻势被遏止时，资产阶级便同社会民主党右

翼勾结起来采取了反民主的措施。

在马萨利克总统的建议下，突沙政府辞职，为提名组织一个看守政府打开了道路。同时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的右翼领袖故意拖延党代表大会的召开，因为他们看到代表中有三分之二都支持左翼，这样他们就不能在代表大会上贯彻他们的政策。在过去所举行的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中，左派获得多数，现在这个选举被宣布无效，凡是同情共产国际的成员都被排斥于大会之外。但左翼分子在这种攻势面前并没有气馁，他们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红色权利报》(Rudé právo)，并于 1920 年 9 月召开了代表大会。左翼组成了一个独立政党，社会民主党内的大多数成员参加了新党。资产阶级认为进攻的时机业已成熟了，于是在 1920 年 12 月初发动了一次挑衅。警察奉马萨利克总统之命占领了左翼社会民主党总部和布拉格的人民院(现为列宁博物馆)。左翼领袖的答复是宣布一次总罢工，罢工蔓延全国，参加者将近一百万工人。在许多地方罢工发展成为工人阶级争取权力的实际斗争（在克拉德诺区和在俄斯拉万尼)。政府使用武力向工人开火并破坏总罢

工。数百名工人阶级的代表被逮捕并被判处徒刑，领导克拉德诺区罢工的安托宁·萨波托茨基也在其中。决定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未来发展方向的这场斗争就是这样结束的，而结果是有利于资产阶级。

工人从这次失败中吸取的教训是，他们的斗争只有由一个真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来领导才能取得胜利，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就是从这些经验中产生的。它是在1921年5月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前左翼的大部分成员参加了共产党，另外代表少数集团的其他工人政党的左翼分子也于1921年10月加入进来。共产党是作为一个群众性政党而建立的，它克服了工人运动中的分裂成若干民族集团的现象。同一年的春天，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加入了共产主义国际。

1918—1920年间资产阶级取得的胜利意味着，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继续依靠法国，并支持它的极端反苏政策。当1920年夏成立小协约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小协约国的成立原来是作为反对在与波兰干涉军作战中胜利挺进的

苏军的壁垒。另外一方面，它又是用来对付德国和匈牙利力求修订和约的意图的。小协约国又依靠法国以加强它在中欧和东南欧的势力。

1921—1923年期间，捷克斯洛伐克经济遭遇了严重的危机，受影响最重的是煤铁工业。到1922年底，全共和国的二十七座高炉中，只有三四座还在继续生产。在这个经济危机时期，资本进一步集中，银行寡头中的最强有力的集团（特别是工艺银行）的势力，越来越加强，而受损失的是德国和匈牙利资本。资产阶级之间的竞争加剧起来，捷克资产阶级也削弱了斯洛伐克资产阶级。经济危机意味着是较弱的斯洛伐克工业的灾难，许多工业部门整个倒闭了（例如克罗姆帕希的各铸铁厂都倒闭了，工人被解雇）。粗暴的反斯洛伐克政策是官方错误地奉行“捷克斯洛伐克主义”理论的消极后果，根据这个政策不承认有特殊的斯洛伐克民族，面认为只有一个使用两种语言的捷克斯洛伐克民族。

捷克资产阶级的地位加强起来，这也可以从土地改革的施行看得出来。在拟定分给小农的一千万英亩土地当中，有五百七十万英亩仍旧发还

了原主，余数当中约有一百五十五万六千七百八十英亩分给了中农和小农，每户获得的地段为二英亩半，可是二千户大地产所有者和资本家们则被当作所谓"地产保留者"，每户给予二百四十七英亩土地。因此这些地产所有者也就都支持农民党的政策了。许多农民只好又成为佃农，他们仍旧依附于大地产所有者。

资产阶级利用1921—1923年的经济危机作为向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开刀的良好借口。工资平均降低了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失业人数增长到四十四万。国家发给的失业救济金数目减少了，在1921年通过了一项法律，使"根特制度"① 开始生效，按照这个制度规定使过去由国家管理的失业救济金的支付改由工会办理。没有参加组织的工人就怎么也领不到救济金。反对这个政策的行动被最粗暴的方法破坏了，例如在斯洛伐克的克罗姆帕希城，在一次工人示威游行中有四人惨遭击毙。特别是1922年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法西

① "Ghent system"——1900年比利时根特城创始的一种失业救济制度，由工会向地方或中央政府领取失业救济金分配给失业工人。——译者

斯政变之后，反动集团更是嚣张。由农民党党魁安托宁·施维拉担任总理的新的联合政府，受到社会民主党的支持，使1923年共和国国防法得以通过，它的主旨在于反对共产党。这项法律是事实上侵犯了宪法，因为它大大限制了出版自由、公开批评政府政策的自由和陪审制的权利。但是面对着群众巨大的示威行动，显示出在共产党后面的力量，因此政府不敢贸然按预定计划解散共产党。

在1924—1929年间，欧洲战后的经济危机被克服了。伴随着资本主义暂时性稳定而来的是争夺市场的斗争，从而加深了各个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在反苏的战线上集结了巨大的力量，在西方列强的怂恿下，主要是靠着美国政府提供的道威斯计划贷款，德国帝国主义又复活了。1925年举行的罗加洛会议就是这种趋向的一个表现。罗加洛协定稳定了德国西部的疆界，使德国能放手向东方扩张以反对苏联，这意味着是法国外交政策的失败。这也标志着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外交政策的一个沉重打击，共和国的边境从此被置于危险境地，而法国在欧洲所起的优势影响现在被

美国和英国所代替了。因此捷克斯洛伐克统治集团不得不慎重地采取权宜之计，并力求更紧密地靠拢英国，同时也力求改善同德国的关系。捷克斯洛伐克企图通过它对反苏运动的出力以弥补它的不利地位，它在这里还有着另外一个物质利益，因为它正在以军火供给苏联的邻国。马萨利克总统本人以长于散布和平烟幕著称，捷克斯洛伐克在国际政策上反苏军事准备就是在这种烟幕下被掩盖起来的。

1923—1929年的经济繁荣使捷克斯洛伐克工业有了巨大的进展。军火工业的发展（比尔森的斯科达工厂和布尔诺的兹布罗约夫卡工厂）在全欧取得了最前列的地位；机械工业主要是汽车生产获得了巨大的扩展。在轻工业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大规模的新企业，例如兹林的拔佳制鞋厂。在工业企业中，大约二十五个康采恩保有全部资本的百分之八十，工业企业越来越受到财政资本的控制，三大银行集团占有决定性地位，这三个集团是以工艺银行、捷克贴现银行和农民银行为中心的。金融寡头对政府起着直接的影响；工艺银行的董事们每每出任财政部长。

经济繁荣和争夺市场的尖锐竞争给工业带来了一些麻烦问题。德国工业的无情的发展现在把捷克斯洛伐克从它过去在东南欧的地位上排挤掉了，迫使它只好向海外市场发展。捷克斯洛伐克在经济竞争中用来保住它的市场的主要手段之一是大量倾销，而受牺牲的则是劳动人民。虽然失业人数减少了，而工人的一般生活水平却并未见提高；生活水平甚至经常不断下降。在整个经济繁荣时期，资本家把工人的工资压低到差不多相当于战后危机时期所曾达到过的极低的同一水平。最重要食品的价格的上涨也导致生活标准的下降。大地产所有者和富农寻求摆脱困境的一个有效方法是对廉价的美国和阿根廷谷物开征“农产税”，这样一来就可以减少进口量从而维持国内市场的垄断局面。这种捐税的开征造成了谷物和面粉制品价格的上涨，并使中小农的地位每况愈下。

从反对生活费用昂贵的罢工和斗争中十分清楚地可以看出共产党的影响越来越大。在1925年的议会选举中，捷共变成国内第二大党（它获得了九十三万四千张选票，而第一大党农民党共获

得九十七万张选票)。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失败了，它试图通过拒不参加1925—1929年的联合政府的办法以挽回在群众当中的影响，因为这一届政府做了许多反人民的坏事，其中之一就是通过损害社会保险的法律。这个新政府即所谓“绅士联合政府”是完全由资产阶级政党组成的，甚至包括了国内少数民族的资产阶级政党在内。这个政府企图利用由于市面初露繁荣景象而给革命运动带来的暂时低潮，以加强自己在国内的地位。但这届联合政府存在不久，一当捷克斯洛伐克受到经济大危机的波及时便倒台了。

1929—1934年的经济危机是由1929年10月纽约股票交易所的破产开始的，这次危机打乱了整个世界经济体系，其悲惨后果(生产锐减、大量工人失业、国际贸易崩溃)使国际局势发生了变化。最重要的是苏联的地位提高了，因为它是唯一没有受到危机影响的国家。苏联威信的提高主要是在那些受到德国复仇趋向日益增长的威胁的国家当中，特别是在1933年希特勒登台执政之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也象法国一样，开始力图改善同苏联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小协约国逐渐

解体以后。这种趋向发展的结果便是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于 1934 年 6 月从法律上正式承认苏联。

在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危机直到 1933 年才达到顶点(这时生产量下降到只抵得 1929 年数字的百分之六十)，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 1932 年就已经达到了顶点。特殊的地方情况使危机的影响更见加深。在这里最主要的因素是，和其他较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起来，特别是和德国比起来（在一些最重要的国外市场特别是在巴尔干各国，德国都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劲敌)，捷克斯洛伐克的技术水平较低，工业生产中的合理化程度也较差。另外一个因素则是工人的购买力低，这也就使国内市场变得非常狭小。和西方各国比较起来，在这里萧条程度的加深一则是由于在生产总额中，农业所占份额较大，再则是由于农业方面自1927 年以来一直就处于危机状况。因此捷克斯洛伐克生产衰落的程度也大大超过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轻工业中最重要部门的纺织工业所受影响最为严重，纺织工业产品在对外贸易方面曾占第一位。对外贸易的衰落也导致了所有输出品工业部门的生产停滞和受到限制。这次危机给斯洛伐

克的打击危害更大，因为斯洛伐克的技术更加落后。

经济危机给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带来了极度的下降。根据官方统计资料，失业人数几达一百万大关，这首先影响到工人阶级，他们的工资标准也猛烈降低。受难最深的是斯洛伐克和捷克地方的德意志族边境地区，因为大多数出口工业都集中在这些地方。经济危机对中小农民也起了严重的影响，因为他们的产品价格急剧下降，可是他们不能象在大地产上那样，由于实行机械化和生产合理化的结果而提高产量，从而抵销价格的下降。手工业者也尝到危机的毁灭性恶果，正如同其他部门的工人一样，他们成为较大工业企业竞争下的牺牲者。

国内政治情况因民族问题的纠纷日烈而变得更加恶化。在斯洛伐克地方，斯洛伐克劳动人民的动荡不安和贫困被安得烈·格林卡所领导的天主教人民党所滥用，该党散布反捷克人的沙文主义思想，并为建立一个自治的法西斯统治铺平了道路。德国的国家主义运动日益猖狂，加强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意志民族中的分裂主义趋向，虽

然德意志民族的和其他的反法西斯主义者都为反对这种趋向而奋斗。纳粹党人运动博得了很大一部分德意志劳动人民参加他们的行列，由于这些人不满意于统治集团的民族和社会政策。在斯洛伐克的匈牙利少数民族当中也发现类似趋向。

尽管资产阶级当中不同集团之间是有利害冲突的，然而它们也有着共同的基础就是都惧怕工人阶级。因此它们的纲领乃是致力于镇压工人阶级运动、取缔共产党、组成右翼的半法西斯政府。当时有两种趋向在继续发展中：一方面，在资产阶级政党中法西斯右翼的活动越来越加强，另外一方面，公开的法西斯政党在加强活动，继续显示出它们自己的锋芒，尽管事实上自 1929 年的议会选举之时起，右翼社会党再度参加了政府。1932 年组成的新政府，业已开始执行一个露骨的法西斯化政策。一项权能赋予法令被通过了，这个法令大大限制了议会的权力，而授权政府得以放手处理某些最重要的问题；非常措施的法律加强执行了，这个法律授权政府敉平最轻微的“骚动”；出版自由受到限制；共产党人的报刊被没收了，共产党本身也差不多被迫转为地下活动。在 1929 年

举行的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选出了以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为首的新的中央委员会，随后共产党便领导组织了一个大规模的罢工运动，这是工人们对大资本家企图以牺牲工人阶级来解救危机的企图的答复。运动发展的顶点是1932年摩斯特褐煤矿区的北波希米亚矿工的一次巨大罢工，这次罢工是因工人生活标准急剧下降和工人被解雇而引起的。这次罢工的重要意义不限于捷克斯洛伐克，因为这是第一次有其他部门的劳动人民，例如小商人和店员坚决站到工人一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革命工会一起组织了若干次大规模的罢工运动。同时由于领导了反对政府的类似法西斯措施和保卫民主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使共产党甚至在工人阶级以外的各阶层中也赢得了越来越高的威信。在1933年的纳粹事件之后，共产党第一个警告全体人民当心日益加剧的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号召全体人民为维护民主权利而斗争。

当纳粹政府在德国执掌政权之后，捷克斯洛伐克的国际地位变得异常恶劣，因为纳粹党人公开宣称他们主张强行修改凡尔赛和约，因此也就

是要改变捷克斯洛伐克的疆界。于是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以维护共和国。政府追随法国的先例，于1935年5月同苏联签订了互助条约。但是根据捷克斯洛伐克方面的请求，苏联提供援助的条件是要法国也同时提供援助。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就是用这种办法试图不惜一切代价以维持亲西方国家的外交方针。然而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反动集团，因为想要利用德国帝国主义来反对苏联，所以积极支持纳粹党人。因此，与苏联缔结的盟约成为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最关心的问题：尽管反动的资产阶级力加阻挠，但捷克人民所关心的唯一问题就是要看到这个条约的真正执行。

危机后的经济恢复极为缓慢。还没有恢复到危机前水平的时候，又出现了一次新的危机的征象。重工业由于军火的需求而超过了1929年的生产水平，但轻工业又受到1937年新危机的袭击。对外贸易额还不及1929年的一半。经常的失业人数仍旧很高，而实际工资远远落在1929年的水平之下。在这些年间，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准不断恶化，增强了他们的不满情绪，以致资产阶级感到越来越难以再用老一套的办法来统治

他们。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即以总统府所在地布拉格城堡命名的“城堡集团”）是由马萨利克领导下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国家社会党人组成的，他们走英法路线，想通过部分取消民主权利和加强国家行政管理来解决当前难关；而另外一派以农民党为首的最反动的一派则号召公开建立一个德国类型的法西斯独裁制。当然，所有这些计划意味着是要使捷克斯洛伐克完全服从希特勒德国。

从1934年起，法西斯主义的危机日益加剧。但在捷克斯洛伐克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不可能组成一个单一的法西斯政党。这里有了好几个法西斯主义中心：格林卡的斯洛伐克天主教党、汉伦的苏台德德意志党（这是农民党中的法西斯主义死硬派），以及少数独立的捷克法西斯主义团体。法西斯分子开始威吓工人阶级运动和一般进步舆论，而首先是集中他们的力量反对共产党。但在1935年的议会选举中捷克法西斯党团遭到了失败，而共产党却进居于第四大党（在社会民主党紧后面）。与此相反，斯洛伐克和德意志法西斯运动却更见猖狂起来了。苏台德德意志党终于获得了德意志族居民大多数的选票，并成为共和

国中最强大的政党，虽然共产主义者和反法西斯主义者曾尽最大努力遏止这种法西斯恐怖。捷克反动分子现在理解到他们必须向这些集团靠拢，于是农民党便同汉伦党徒进行关于组成一个联合政府的谈判。

面对着迫在眉睫的法西斯危机，共产党坚决地领导了反法西斯的进步力量，并且呼吁组成一个群众阵线，以团结一切反法西斯的人士和争取获得政权。到 1935 年年终当马萨利克在连任三届总统职务之后因病退职时，组织群众性阵线的必要性就更加明显了。统治集团各政党当中出现了分裂。以农民党为首的右翼，除了农民党即所谓国家统一党之外，还包括有各个商人的政党以及其他派别，毫不顾及联合政府中其他友党（社会民主党和国家社会党）的愿望，径自提出聂梅茨博士作为他们的总统候选人。为了确保聂梅茨的当选，他们不仅需要联合政府以外的法西斯党团，而且还需要联合汉伦党徒。以外交部长贝奈斯博士为首的另外一个集团，也就是由社会民主党和国家社会党人领导的集团，采取了犹豫不决的态度。共产党单枪匹马在产业工人当中展开组织运

动，并设法在农民党的一般党员中策动发出各种抗议的表示，这样一来就掀起了一片反对反动阴谋的风暴，以致在最后的时刻右翼集团发生了分裂，于是民主力量所支持的候选人贝奈斯博士在共产党人的投票帮助下当选为总统。反动集团甚至在当时就喊出了“同希特勒达成协议”的口号，并准备让希特勒来支配捷克斯洛伐克，可是现在他们的这个图谋失败了。民主集团显示了它的优越力量。但同时它还是暴露了自己的弱点，那就是它还没有适当的组织基础，由于右翼社会党人的反对，未能组成一个大众阵线的政府。

在 1938 年 3 月强行实现德奥合并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的地位也就变得特别危急。不久以后，苏台德德意志党领袖康纳德·汉伦奉了希特勒的秘密指示，在卡尔洛维-伐里公开宣称他本人和他的党徒效忠于纳粹主义，并提出一个广泛自治的纲领，实行这个纲领将意味着是事实上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解体。随后汉伦派暴徒开始在边境地区制造一系列的胡作非为的恐怖事件。在斯洛伐克，格林卡的党也展开了一个自治运动。可是反对这种意图的大规模群众示威运动，显示

了普通人民决心保卫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从1938年5月21日颁布的局部动员令，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当时据报德国武装部队在捷克斯洛伐克边境正在进行调动部署，德国的突然进攻的危机业已迫在眉睫。

联合苏联共同来保卫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可能性是不符合西方列强的利益的，它们宁愿牺牲捷克斯洛伐克从而帮助纳粹德国组织反苏十字军的计划。希特勒原来就打算在必要时用武力强占捷克斯洛伐克。可是由后来发现的德国总参谋部成员哈尔德将军的一份文件资料中看出，在1938年希特勒的实力还不够强大，尚不足以击败坚守在防御设施强固的边界上的装备精良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因此在1943年或者1945年以前，他不打算发动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攻击。但是当他看到西方大国愿意不战而牺牲捷克斯洛伐克时，他就变更了自己的计划并立即开始了行动。为了替他扫清道路，西方大国派遣了一个以朗西曼勋爵为首的代表团到捷克斯洛伐克，这个代表团明显地支持汉伦的要求并企图诱使捷克斯洛伐克投降。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事实上屈从了割让边境地区

(在这里居住的绝大多数是德意志族)的要求，这是早在英国首相纳维尔·张伯伦和希特勒在贝赫特斯加登的第一次会晤中就议定了的。在戈德斯堡举行的第二次会晤中，希特勒又提出了新的领土要求，这一次是支持了波兰和匈牙利的法西斯党人。英国和法国的代表们把这些要求送交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慑于舆论的反对，它未敢立时加以接受。只是当英法发出最后通牒之后(在这个文件中这两个大国又拒绝在捷克斯洛伐克遭到德国攻击时给予援助)，并且是在捷克斯洛伐克不可能单独抗御纳粹德国的托词下，政府才投降了。英国和法国甚至威胁捷克斯洛伐克说，如果它不接受希特勒的要求，它将被认作是侵略者。事实上，共和国的所谓"孤立"只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辩解，因为苏联政府业已宣布它的决定：假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提出要求苏联履行盟国的义务时，即使与捷克斯洛伐克订有盟约的法国拒绝提供援助的话，苏联仍将单独提供这种援助。但是捷克斯洛伐克并没有接受这些建议。统治集团由于害怕工人阶级的力量和维持它们的阶级优越地位起见，宁愿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以贝奈斯总统为首的

政府未经召集议会讨论就决定投降了，按照宪法规定只有议会才有权决定国境的变更。

鉴于人民的坚决反对，把投降的决定付诸实施则是另外一回事。9月22日，由共产党领导的大规模群众示威游行和总罢工，迫使政府只得退却。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要求保卫共和国抗御希特勒。在这个紧要关头，人们可以看出社会民主党右翼和国家社会党领袖阻止组成共产党号召的联合一切反法西斯力量的人民阵线政府政策的后果。在这个决定性的时节，人民阵线政府未能取得政权，而躲在扬·赛罗维将军的傀儡政府后面的投降主义者仍旧掌握了实权。新政府颁布了总动员令，这个法令倒是认真地实行了。但这只是一种计谋以转移人们对以后相继举行的一些谈判的注意。终于在1938年9月29日在慕尼黑举行了希特勒、墨索里尼、达拉第和张伯伦的会议，这次会议中没有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参加。慕尼黑会议承认了纳粹德国的所有领土要求，这样一来就等于批准了对捷克斯洛伐克主权的无比的侵犯。

慕尼黑会议的直接后果就是进一步的领土割

让。帖欣被波兰强占过去了；南斯洛伐克和外喀尔巴阡乌克兰地区被匈牙利霸占了。在被强占的领土上，数十万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落入法西斯恐怖分子的手里。捷克斯洛伐克丧失了三分之一以上的领土和居民，将近损失了全部工业的百分之四十，更不用说还失去了有战略意义的边疆。虽然这个新的疆界被认作是和国界线一样的，但实际上这个边界线的建立就是要极力使这个国家在经济和军事上变成无能为力。慕尼黑会议意味着将捷克斯洛伐克置于纳粹德国的势力范围之内。上层资产阶级的统治集团，以新首相兼农民党党魁贝伦为首，利用了慕尼黑不幸事件建立起法西斯政体。紧接着慕尼黑会议之后，在1938年10月里，政府颁布命令取缔共产党的活动，共产党被迫转人地下工作。各个资产阶级政党，包括国家社会党在内，都并人单一的法西斯政党——“国家统一党”中去了，而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的“国民工党”同统治当局保持合作。一切进步势力现在都受到迫害。1938年10月里，贝奈斯总统在他的外交政策的主张失败之后宣告辞职，反动分子把他们提出的候选人叶美尔·哈恰博士扶上

了总统宝座。但在普通人民中间都不支持法西斯政体。

尽管捷克上层资产阶级愿意同柏林达成协议，但德国帝国主义却并不放弃他们的最终目的：占领整个残余的共和国。这个方针是受着两种因素决定的：德国垄断组织的利益和战略动机（准备进攻波兰和苏联的战争）。为了达到分裂共和国的目的，纳粹政府利用了斯洛伐克和遗留下来的外喀尔巴阡乌克兰地区的法西斯运动，以及留在布拉格、伊赫拉伐、沃斯特拉伐和布尔诺地区内德意志少数民族集团中的为纳粹政府效力的人。他们蓄意造成一种印象，使人认为已陷入无政府状态，似乎政府已无力保护德意志民族公民的安全，从而挑起这些集团和当局之间的冲突和公开斗争。这样一来，德国为了欧洲的“和平与秩序”的利益而进行武装干涉就成为“公正的”了。这种局势首先发生在斯洛伐克。1938年10月在西利那举行的会议上，所有资产阶级政党都出席了，以约瑟夫·蒂索为首的格林卡的法西斯党夺取了斯洛伐克的政权。未被格林卡党徒容许参加西利那会议的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事后也表示了同意。

只有共产党反对以法西斯主义强加于斯洛伐克，并进行地下斗争继续争取自由。鉴于斯洛伐克分裂主义者挑起的骚动，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于1939年3月宣布在斯洛伐克实行戒严。斯洛伐克法西斯主义者请求柏林政府给予他们援助，于是在希特勒的建议下，所谓斯洛伐克国便在1939年3月14日宣告成立。次日，即3月15日，哈恰总统未经取得宪法规定的授权，就在柏林签订了一项协定，把“捷克人民的命运交托给大德意志国家元首的手里”，并建立了所谓“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捷克地方被纳粹军队占领，劳动人民受到纳粹政府的奴役。外喀尔巴阡乌克兰和东斯洛伐克的部分地区被霍尔第统治下的匈牙利所占领。西方各大国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下也曾对德国政府的这种侵略行动提出抗议，但它们仍旧在事实上承认了这种占领。只有苏联政府拒绝承认中欧的这种新局面。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创立和建国以来的最初二十年间，在捷克和斯洛伐克的科学和文化发展方面具有重大意义。受到数世纪的压迫之后，

捷克语言再度成为官方语言（在斯洛伐克，斯洛伐克语是官方语言），民族文化不再处于维也纳的监护下。教育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布尔诺和布拉迪斯拉发新的大学的创办，新的工学院和农学院、一所兽医专科学校、一所矿冶学院和其他专科学校的建立，在科学和技术发展上具有重要意义。在许多科学研究方面进行的工作是举世闻名的，例如，在东方学研究方面，极谱仪以及在医药方面的若干部门。从书刊杂志的出版数量上，可以看出科学进步的表现。

在捷克散文作家当中，卡列尔·查佩克（卒于1938年）的作品在全世界都有他的读者，例如他的游记作品《英国来鸿》和《北方游记》；他的小说《与蝾螈的战争》、《克拉卡底蒂》和他的戏剧《鲁尔》（R.U. R.），等等。雅罗斯拉夫·加雪克（卒于1923年）的讽刺小说《好兵帅克》也闻名于世。作家兼新闻记者埃冈·埃尔温·基施（卒于1948年）用德文写的作品，在报告文学方面具有极高的文艺水平。捷克诗歌方面也极为繁荣，有许多杰出的诗人写出了他们的名著：彼得·别兹鲁次、依里·伍尔克、斯坦尼斯拉夫·科斯特卡·

纽曼、弗兰纳·施腊麦克、约瑟夫·霍腊、雅罗斯拉夫·赛费特、维特兹拉夫·聂兹瓦尔及其他等人。在文艺评论和艺术史方面也反映了艺术的发展。这些方面最重要的人物是佛郎蒂舍克·哈佛·萨尔达(卒于1937年)。兹丹涅克·聂耶德利是一位卓越的历史学家、音乐理论家和文化巨匠。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1918—1938年间，极大多数的艺术家、诗人、作家和评论家都是进步趋向的热烈拥护者，其中有许多人加入了共产党，例如兹丹涅克·聂耶德利、斯·科·纽曼、维特兹拉夫·聂兹瓦尔及其他等人。

捷克音乐通过一些大作曲家的作品在全世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例如，列奥什·雅纳切克（卒于1928年）和他的歌剧《耶鲁法》、《卡蒂雅·卡巴诺瓦》、《福克斯·夏佩斯冒险记》；维特兹拉夫·诺瓦克(卒于1949年)、约瑟夫·苏克(卒于1935年)和苏克的学生波胡斯拉夫·马丁努(卒于1959年)，以及他的歌剧《桥上的喜剧》，等等。在音乐演奏家当中，使捷克音乐扬名海外的有著名的小提琴家佛郎蒂舍克·昂得里切克（卒于1922年)和扬·库别利克(卒于1940年)，捷克音乐家

协会管弦乐队（1896年创办）和乐队指挥瓦茨拉夫·塔里赫（诞生于1883年），捷克四重奏乐队的弦乐四重奏，以及歌剧演唱家卡列尔·布里安（卒于1924年）、叶玛·德斯汀诺娃（卒于1930年）和奥塔卡·马夏克（卒于1939年）。奥塔卡·谢弗奇克（卒于1934年）的捷克小提琴学校获得了远及国外的好评。

艺术的发展是很错综复杂的；这方面的发展对西欧当代绘画的反映极其敏感，而在个别情况下对西欧当代绘画方面起了启发作用。例如，瓦茨拉夫·施帕拉（卒于1946年）和叶美尔·费拉（卒于1953年）、奥塔卡·库宾（诞生于1883年；他以奥特冈·考比涅的名字闻名于西方）、约瑟夫·查佩克（卒于1945年）、扬·兹尔扎维（诞生于1890年），及其他等人的绘画。马克斯·施瓦宾斯基（诞生于1873年）的作品在绘画艺术上占居重要地位。

布拉格旧城广场上胡斯纪念像的雕刻者拉迪斯拉夫·萨洛恩（卒于1946年）、佛郎蒂舍克·毕列克（卒于1941年）和扬·司徒尔沙（卒于1925年）在雕刻方面创造了许多杰出的作品。

斯洛伐克文化过去一直处在匈牙利的压制下，因此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成立对斯洛伐克文化生活的发展起了重大的影响。有鉴于此，所以在这里文艺方面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动甚至比捷克地方的文艺创作来得更加活跃。在马丁·库库钦、J·G·塔约夫斯基和扬科·耶生斯基的作品中，充分发挥了现实主义文艺评论的精神。彼得·伊列姆尼茨基（卒于1949年）的长篇小说也占有最重要的地位；扬·斯姆列克成为当代优秀的诗人。有一些艺术家曾尝试创造独特的斯洛伐克民族形式，他们也利用了西欧现代主义派的艺术。在这些艺术家当中有卢多维特·富拉（诞生于1902年）、米库拉什·加兰达（卒于1938年）和科洛曼·索科尔（诞生于1902年）。完全在捷克音乐学校培养出来的新的一辈斯洛伐克音乐家现在已经初露头角了，在这些人当中应该提及斯洛伐克歌曲作曲家米库拉什·施奈德-特尔纳弗斯基（卒于1958年），以及器乐曲方面的米库拉什·毛哲斯（卒于1944年）。1920年在布拉迪斯拉发创办的斯洛伐克音乐会管弦乐队，对于斯洛伐克民族音乐的进一步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成立以后，1919年在布拉迪斯拉发创立了第一所斯洛伐克大学。捷克教授最初帮助培养了新的一代斯洛伐克知识分子，在创办这所大学的当时，他们的人数可说太少了。除了大学之外，斯洛伐克学会的恢复，以及1926年萨法里克学会的创立，也表现了科学的进步，萨法里克学会成为斯洛伐克的最高科学研究机关。

第 十 章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为自由而战

1939—1945年

在所谓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里，大权操在德国占领军手里。保护国政府只是一个行政事务机构，实权属于横蛮的恐怖主义当局。纳粹独裁统治的野蛮统治方法，即秘密警察（盖世太保）、特别法庭、集中营和瓦斯室的逞凶兽行，首先影响了劳动人民。与此同时，纳粹党人试图对全国的文化和经济生活实行德意志化。大工业被德国垄断组织吞并，过度的食品输出使农业遭受掠夺。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产所有者是支持哈恰统治的主要力量。工人阶级和中小农民代表反抗纳粹统治的主要动力，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

民族解放运动中起着主导作用；反法西斯斗争的其他力量则来自小资产阶级和中等阶层，以及来自知识分子。共产党的活动受到中央委员会领导干部的指导，中央委员会的为首者是留居莫斯科工作的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和扬·施维尔玛。从战争一开始起，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就开始组织了反纳粹的示威运动。在这些普通斗争的过程中，逐渐结成了一个广泛的民族阵线。这些行动使欧洲社会舆论确信，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和叛国政府的政策毫无共同之处。1939 年 11 月的学生示威游行引起了巨大的国际反应。为了进行报复起见，纳粹党人于 11 月 7 日封闭了所有捷克大学，并把数千名大学生关进集中营。大战以后，11 月 7 日被宣布为国际学生节。法西斯当局迫害的主要对象是共产党党员，有二万五千名共产党员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献出了他们的生命。

在所谓“斯洛伐克国”里实行着法西斯统治。在这里通过了新的宪法，建立一个所谓“劳资协作”的政体，从而剥夺了工人组织独立工会的权利。另外一方面，天主教会却被赋与无限大权，因

为它对普通人民具有巨大的思想意识上的控制力量，于是教士变成了国家的栋梁。通过没收捷克人和犹太人财产而富裕起来的斯洛伐克经济，经历了一度的真正表面繁荣时期。军火企业雇用人数占工业劳力的一半。1939年9月，斯洛伐克政府和希特勒德国肩并肩地对波兰进行战争。但这个政策引起了人民的不满，因此在许多地方斯洛伐克军队中都表现了抗拒情事。在1939年春天共和国分裂之后形成的地下共产党，领导了反对法西斯统治和争取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斗争。

英法国家奉行的对希特勒德国退让的政策，其中心目的是要驱使德国同苏联交战。他们指望这样一来就可以使这两个国家两败俱伤，于是西方大国在全世界的地位得以加强起来。

聚集在法国和英国的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流亡分子本身也同意这个政策。早在1939年秋季，他们就在法国成立了民族委员会，并开始在逃亡国外和侨居国外的捷克斯洛伐克公民中组织军队。1940年法国沦陷之后，委员会迁移到英

国，并改组为捷克斯洛伐克临时政府，在这个政府中贝奈斯总统起着决定作用。西欧各国政府承认了这个临时政府，但它们却并不保证捷克斯洛伐克将在慕尼黑会议前的境界内重新建国。直至1942年8月5日，西方各国政府才正式给予了这种保证。

在伦敦的临时政府所奉行的政策是保证使资产阶级在战后获得政权。它也和西方大国一样，认为战争的结局，苏联将成为大大削弱了的国家。为了实现这些计划，有必要格外限制人民对占领军的抵抗，特别是因为这种抵抗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因此伦敦的广播电台经常向捷克和斯洛伐克的人民发出呼吁，要他们等待命令，暂时不要采取军事行动。这个政府对西线的外国军队方面也抱着同样的目的。在伦敦的流亡政府当局也曾表示，这些军队只是一种“象征”性质，并不求其在前线作战，而只是占据这个国家，等待胜利以后来“恢复”秩序。因此在英国曾经采取了特殊安排，以便使捷克斯洛伐克官员能够接管县长的职务①。

① 县长(hejtman)是官僚国家行政机关的主要代理人，实际上是因袭于慕尼黑会议前共和国时代继承的奥匈旧制。

此外，这些外国军队实际上直到敦刻尔克之役的末期才开赴前线(另外一方面，空军力量则在战起之初就投入了战斗)。

在这个时期里，贝奈斯总统曾同以西科尔斯基为首的波兰流亡政府举行谈判，打算组织一个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联邦，这个联邦将在战后作为反对苏联的基地。

另外一方面，在战时集中在莫斯科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袖对解放斗争所抱的想法，却和伦敦流亡政府根本不同。如前所述，共产党员从沦陷的最初时刻起，就进行了反抗占领军的不妥协的斗争。他们不仅关怀共和国的解放，即使在这个时期就已经对捷克斯洛伐克在战后究竟应该成为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国家，或者人民应该着手建设社会主义作出了抉择。慕尼黑时期和其他时代的经验显示出，只有当劳动人民掌握了政权时，才能保证慕尼黑事件不会重演，也不会再有一个 1939 年 3 月 15 日的事件。

1941 年 6 月 22 日，希特勒德国突然向苏联进攻。在艰苦的战斗中，苏联显示出它是唯一能

够担负阻止德国侵略军进攻重任的力量，截至这个时候为止，德国侵略军已经在波兰、丹麦、挪威、南斯拉夫、希腊、比利时、荷兰和法国接连不断取得胜利。但是，在1941年12月里，“闪电战”却被遏止于莫斯科的大门外。在这场战争的最初日子里，西方大国就同苏联站在一道组成了反对德国的联合战线。对德国及其伙伴地位不断增强的恐惧，超过了对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反对。国际局势的转变也促使在伦敦的临时政府修改——至少是在表面上——其反苏态度。1941年7月，苏联承认这个政府为捷克斯洛伐克的合法政府，这就大大加强了它的地位。同年7月18日，苏联政府同它签订了一个互助条约，根据条约允许在苏联境内建立一支捷克斯洛伐克武装力量。苏联承认慕尼黑协定前的疆界这一事实也具有重大意义，在当时西方大国对此尚在犹豫不决。

德国和苏联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发生了怠工事件，这激怒了占领者。结果雷茵哈特·海德里希被派到布拉格以接替康

斯坦丁·冯·纽拉特充任德国监护者，于是恐怖政策进一步加强了。因此伦敦政府[①]组织了1942年夏天的暗杀海德里希事件。这是普遍受到欢迎的报复行动，并且在国际公众舆论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应。当然这意味着在国内遭到重大损失，因为纳粹当局采取了加紧的报复活动。大规模屠杀捷克乡村里狄策居民的事件是在世界公众舆论面前引起最大激忿的一次行动。“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哈恰和保护国政府公开同意这些纳粹罪行，显示出他们是民族的敌人，并且使这个政府在捷克人民当中的威信更见降低了。设在伦敦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务委员会被迫就此事发出一个声明，大意是说波希米亚的哈恰政府和斯洛伐克的蒂索政府的行动是背叛捷克和斯洛伐克人民的罪行。这种恐怖行为使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受到重大损失，地下党组织的中央委员会被破获和被消灭了。可是，到1942年秋天，一个新的地下领导集团又成立了。共产党人遭受牺牲（在这里我们应该提出杰出的作家兼评论家尤利乌斯·伏契克的被处

---

① 指在伦敦的捷克斯洛伐克临时政府。——译者

死）的另一原因是由于，只有共产党组织积极的抵抗，而受伦敦流亡政府节制的地下组织主要只限于承转指示。

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苏军的节节胜利前进，给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带来了越来越充沛的革命情绪。在 1943 年成立了第一支游击队并开始活动。反法西斯的斗争推动了和加强了人民阵线，这个阵线团结了反法西斯力量，而作为骨干的则是工人阶级。自从 1944 年春建立了地下抗战团体之后，工人当中的领导核心共产党的组织加强起来了。相反地，保护国政府和支持它的捷克资产阶级，却采取了完全妥协顺从纳粹统治的态度。

苏军所取得的新的成就彻底打垮了纳粹军的最优秀军团。苏军战败德国和解放中欧的前景业已变成即将到来的现实。在这些事件的压力下，流亡伦敦的政府便不得不把捷克斯洛伐克的国际政治地位置于靠拢苏联的基础上。于是在 1943 年 12 月 12 日签订了《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人民的抵抗运动和共产党对这个条约的生效是有影响的。

在斯洛伐克，抗战运动也集聚了力量，而蒂索政府参加反对苏联的战争，既得不到人民的支持，甚至也不能获得自己军队的拥戴。随后，当捷克斯洛伐克军同苏军并肩作战反对纳粹军并在1943年索柯洛沃一役表现了优异成就的时候，斯洛伐克军的士兵便跑到苏军一边，并加入了捷克斯洛伐克军。这样一来，这支武装力量便壮大起来了，在1944年春变成了第一捷克斯洛伐克军团。

1944年夏，苏军向波兰境内推进，使所谓“斯洛伐克国”的政治危机发展到了顶点。它的国家结构动摇了，游击队运动发展成为群众性运动。1944年8月29日爆发了斯洛伐克民族起义，游击队占领了斯洛伐克中部大部分的重要中心，各地守备队也一个接一个参加游击队。与此同时共产党成立了全国委员会，并组织了地方国民兵。从德国战俘集中营里逃出来的苏军和盟国士兵也加入了起义军，起义军又和斯洛伐克游击队取得了联系。苏联直接派遣军官充当游击支队的指挥官，并用空投武器、弹药、食品和其他物资以接济起义军。但是苏联提供的最大援助乃是在喀尔巴阡

发动攻势，在这条战线上拖住了大量敌军。经过杜克拉关一役激战之后，苏军于 1944 年 10 月 4 日进入了捷克斯洛伐克境内。

一支法国游击支队在斯洛伐克起义中起了卓越的作用，特别是在伐河上的斯特列奇诺城附近的一役中，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在反对法西斯的共同斗争中牺牲了他们的生命。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建立了一个纪念碑以表彰他们在斯特列奇诺的英勇行为；法国政府曾派遣一个代表团参加 1956 年举行的这个纪念碑的揭幕典礼。

“斯洛伐克国”政府在起义发生不久之后即召请德国党卫军前来支援，但德国党卫军并未能采取任何闪电攻势击溃起义军。直到 1944 年 10 月纳粹军才得以在斯洛伐克境内的大部分地方击败起义者。然而，直到苏军完全解放全国以前，在斯洛伐克的山区，游击战一直在继续着。

斯洛伐克民族起义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斯洛伐克人民向全世界表明了他们不愿意攻打苏联，他们要消灭法西斯斯洛伐克国，他们支持重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

在捷克地方，特别是从1944年夏天起，抗战活动变得越来越活跃了。游击队切断了铁路线并阻碍了纳粹军队的行动。在斯洛伐克民族起义的时期，有许多捷克人越过斯洛伐克边境加入了解放部队，结果斯洛伐克当局宣布凡非法越过前线者将处以死刑。早在1945年4月解放斯洛伐克之后，苏军就在摩拉维亚土地上有了立足点。

当这个国家行将解放的时候，民族委员会的重大任务在于支援挺进中的苏军。不久捷克地方解放了，民族委员会接收了政权。工厂委员会也这样领导工人们保卫他们的工厂，防止撤退的德军破坏。

形势的发展迫使以贝奈斯总统为首的伦敦流亡政府于1945年春天移往莫斯科，并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代表举行了关于建立新政府和改变解放后的国内政治关系的谈判。资产阶级的代表不得不放弃他们打算恢复慕尼黑会议前的资本主义共和国的原来计划，并且他们也只得顺应事实承认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人阶级将成为国内的指导力量。

1945年4月4日在科希策（东斯洛伐克）建立了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阵线的新政府，这是捷克斯洛伐克历史上第一次在政府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资产阶级。在举行议会选举以前，这个政府以党派原则为基础，包括了所有未出卖祖国利益或未同纳粹党人合作过的各政党的代表。这些党派就是：共产党、天主教人民党、国家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社会民主党人兹德涅克·费林格担任总理，共产党主席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担任第一副总理。新政府宣布了它的政策，这个政策通常被称为“科希策政府纲领”，共产党人在起草这个纲领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这个纲领表达了民族和民主革命的基本要求。它是以捷克和斯洛伐克两民族完全平等的这个概念为前提的。这个纲领奠定了以捷克斯洛伐克与苏联同盟为基础的新的外交政策。纲领中宣布以民族委员会为新的国家政权机构。占领军的财产，以及支持这个政体的捷克和斯洛伐克资产阶级分子的财产，均予没收并归国家管理。同时宣布禁止法西斯政党的活动。

到 1945 年 4 月底和 5 月初的时候，波希米亚的抗战活动发展到了顶点。作为领导抗战活动最高机关的捷克民族会议，是在科希策纲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从战事的结局和德军所选择的撤退路线来判断，布拉格显然将是崩溃的希特勒军的最后防线。德军在柏林溃败的消息传来，大大提高了人民的战斗情绪，以至在 5 月 5 日星期六的这一天，已经无法抑止人民的起义。于是共产党发布了攻击令。第一次突击之后，纳粹分子开始了一次反攻：有一些建筑物遭到德军的炮轰，其中包括古老的布拉格市政厅，同时坦克在街头横冲直撞。人民在街头筑起障碍物以抵御敌军，并英勇地同优势敌军作战。起义者抢夺过来的布拉格电台，呼吁各地支援，于是其他被占领的城市也起来加入了起义。

在这些日子里部分美军也开进了西波希米亚。德国占领军和保护国政府的代表试图谈判使美军来占领捷克地方以挽救他们的命运。苏军司令部理解到布拉格受到德军威胁危险的情况，立即调整他们在柏林附近作战的部队，抽调部分兵

力急驰救援，坦克部队于5月9日黎明时刻开抵布拉格。这样一来，这个城市就得以幸免于毁灭，布拉格的人民热烈欢迎苏军。德军司令部的计划失败了，不多几日之后全国其余部分相继解放。捷克斯洛伐克重新建立起一个自由民主的共和国。

第十一章

人民民主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头十年

1945—1955年

法西斯占领时期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现代史上最沉重的危机。这个时期使国内的社会和政治关系暴露无遗，并显示了各个社会阶级和政党的作用和地位的真面目。1945年，民族和民主革命获得了胜利，这个革命的推动力量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普通人民。这个国家现在变成了人民民主的、有一个民族阵线政府的国家，在当时它包括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或多或少参加过抗战活动的捷克和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根据波茨坦会议上美国、英国和苏联所作出的决定，共和国境内的德意志居民——在慕尼黑协定时期和在

沦陷期间，他们使捷克民族遭受巨大的灾难，同时他们又有构成新的第五纵队的危险——现在被遣送出国，但那些反法西斯的德意志人则不受决议的影响。边境地区重新由内地迁来的人民定居下来。金融、工业和农业大资产阶级在慕尼黑协定前共和国时代的垄断地位，使它们得以操纵了全国工业的三分之二以上，他们和外国资本家一道对所有政府政策起着决定性作用，现在民族民主革命剥夺了他们的经济和政治权力。这个阶级的反动作用和在沦陷期间他们的叛国行为，现在得到了清算。

工人阶级的主要同盟者是小农。他们的土地要求在慕尼黑会议前的共和国时代得不到满足，只有在工人阶级掌握政权时才能得到满足。

1945年秋，依据科希策纲领的要求实行了对银行、保险公司、矿山和大工业的国有化。这样一来，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工业转入了人民的手中；同时有一百七十万公顷多的土地分配给了十七万中小农民和农业工人，这意味着使他们的情况获得重大的改善。

在1946年5月举行第一次议会选举的时候，

这些措施的成果已经很明显了，而其主要推动力量则为共产党。共产党在选举中获得了百分之三十八的选票，成为共和国的第一大党。它和社会民主党一道在议会中占微弱的多数。贝奈斯总统授命共产党主席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组成一个新政府。

1946 年 6 月 8 日，新政府向新选出的制宪国民议会提出它的纲领，在这个政府里根据选举结果包括了民族阵线的各个党派的代表。国民议会的主要目的是要在两年之内准备一部新宪法，以便巩固民族民主革命的收获，其要点就是设置各民族委员会、实行国有化和建立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之间的新关系。此外，纲领还要求制订一个 1947—1948 年的两年经济计划，其主要任务在于消除战争创伤，使工业产量超过战前指数的百分之十，和提高生活水平。纲领中突出的要点包括有：斯洛伐克的工业化，实行有利于工人的税务改革，实行各阶层劳动人民的社会保险和健康保险，实行新的教育条例和调整地方区划。这个复兴纲领在制宪国民议会上获得全体一致的通过。解放以后的两年半之内，即在 1947 年就达到

了战前的工业生产水平。慕尼黑会议以前的共和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花了八年的时间才达到同一目的。

国内复兴建设越来越大的成就引起了反动派的抗拒，他们不愿意看到自己的特权地位受到损失。在民族阵线中的某些党派方面也清楚地暴露出这种趋向，在这些党派中有许多党员原来是属于在沦陷期间通敌叛国并站在共和国敌人一边的那些党派，现在这些党派都受到取缔。在制订宪法的过程中，无论在政府中或在议会中，反动分子都不愿意把原来在民族阵线中所有各党派同意了的那些革命条款包括进去。反对势力对外交政策问题上也施加压力，他们想要削弱同苏联的同盟关系，并阻止签订同人民民主波兰的条约。在1947年由于严重旱灾所引起的农业歉收期间，极端分子的活动猖狂一时。他们把当前的艰难局势认作正是转变国家政治发展趋向的好机会。大地产所有者和富农拒不供应谷物，并喊出他们的口号："情况越坏，对我们越好"。他们指责共产党应对歉收所造成的困难负责。在这种情况下，总理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向苏联政府请求援助。

他的请求得到了同意，于是捷克斯洛伐克获得了一批低价的谷物。威胁着全国的饥馑的危险扫除了。共产党建议对小土地所有者因歉收所受到的损失至少应给予局部的补偿，办法是对百万富翁开征一种新税。政府中共产党以外的党派，包括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在内，开始反对这个建议，但当共产党向人民发出呼吁时，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在群众的压力下便不得不屈服，这样一来"百万富翁税"终于在议会中获得通过。

在斯洛伐克，反动势力也在蠢动，人民民主政体的敌人在那里利用民主党领袖散布反捷克的情感，并就斯洛伐克民族机关和共和国政府的职权划分问题制造无穷尽的纠纷，试图阻止政府的各项措施在斯洛伐克推行。根据1946年春的一项秘密协定，民主党替受取缔的格林卡的人民党中教会法西斯分子开道，使他们得以大规模地钻入国家行政机构。和某些外国势力勾结的斯洛伐克反动势力反对共和国的阴谋现在也败露了。工厂委员会在布拉迪斯拉发召集代表大会要求行政委员会辞职(这个机关在斯洛伐克执行政府的职能)，斯洛伐克农民在1946年的选举中因受到民

主党的蛊惑宣传而表现动摇，现在已抛弃了民主党转向斯洛伐克共产党一边，因为共产党始终支持小农和中农的要求，特别是有关新的土地改革的要求。工人和农民势力的结合，于是现在成立了一个新的行政委员会，它能够有效地实现人民的愿望。

与此同时，反动势力在民族阵线里的共产党以外各党派中的影响加强了，他们竭尽一切努力来制造政府的危机。他们试图提出一些纯粹恶意挑拨的建议，例如要求过分提高国家公务员和公共机关雇员的薪金，以及普遍提高津贴，这样做的结果将会刺激物价，破坏货币的稳定和导致通货膨胀。这种意图就是要利用困难局面以便制造一次事变，从而为资本主义复辟扫清道路。

共产党人警告其他党派不要采取最后结局将不利于他们的行动，同时共产党人准备以力求完成两年计划和执行政府纲领来迎接在 1948 年 5 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他们提出的竞选口号是："争取国民中的多数"；于是觉悟到共产党是捍卫他们自己利益的工人，便大批加入到共产党的行列中。当反动派看到在选举中共产党人必将获得多数的

时候，他们想到1920年的例子，于是打算把政权交给一个看守政府，这个政府将按照他们的利益执行选举。

另一方面，工人要求实行进一步的国有化和一个新的土地改革。根据总工会的倡议，2月22日在布拉格举行了工厂委员会的代表大会，28—29日又召开了农民协会的代表大会，以便讨论这些要求。由于日益高涨的群众运动，反动集团便加速执行他们发动叛变的计划。

在2月17日，国家社会党、人民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的部长们，分别以彼得·曾克尔博士、扬·施纳麦克阁下和科奇瓦拉博士为首，破坏了政府的会议，他们作为借口的是一些有关国家保安团中个人的小问题，这些问题无论如何说不上是中央政府的职权范围，而只是属于内政部长的职务。2月20日，十二名部长呈请辞职，这是事前秘密取得贝奈斯总统同意的，另外十四名部长继续留任。他们事先商量好，总统不接受部长们的辞职，于是可以在他们仍旧参加政府的基础上造成新的情况，并在处理危机的当中力求把共产党人排除于政府之外。这样一来，总统就可以提

名组成一个不包括共产党员部长的政府，如果这一点未能做到，那么就指定一个预先挑选出来的看守政府。随后，看守政府就可以开动选举机器，使共产党人丧失他们的势力。反动派指望可以获得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以及他们已经在军队和国家保安团中组织好的某些集团的支持。

在共产党方面则诉诸于人民。2 月 21 日在布拉格旧城广场上召集了一次群众大会，在大会上，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总理报告了政府危机的原因。参加大会的数十万人民通过了一项决议，递交贝奈斯总统，要求他接受反动部长们的辞职，并由总理提出真正忠于民族阵线纲领的并愿效忠于人民民主共和国利益的新人选。可是贝奈斯总统却拒绝对部长们的辞职作出清楚的解释。

在星期天，2 月 22 日，召开了工厂委员会的代表大会，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在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安托宁·萨波托茨基发言之后，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对所有雇佣人员在五十人以上的企业实行国有化，对所有批发商业、对外贸易、百货商店、制药厂、建筑企业、印刷所、医院和疗养所实行国有化。其

次，决议中还提出了应立即把社会保险条例制订成法律，并要求把工会中央理事会提出的切实可行的临时调整国家公务人员和公共机关雇员薪金的建议付诸实施。代表大会表示赞成农民提出的实行新的土地改革的要求，为了坚决支持所有这些要求起见，决定于2月24日即星期二，在所有企业和机关举行一次一小时的象征性罢工。

反动党派也曾竭尽一切努力要使它们在各方面参加代表大会的代表成员投票反对这个决议案。但到了投票的时候，尽管他们作了徒然的努力，而在八千名代表当中，只有十票反对这个决议。

同时在全国，由不同意反动部长们的行为的党派成员组成了民族阵线的行动委员会。民族阵线的中央行动委员会成立起来了，其中包括共产党、社会民主党、人民党和国家社会党的代表。更新后的民族阵线认为，接受反动部长们的辞职是民主地、合乎宪法和议会原则地解决危机的唯一办法。

2月24日，工厂委员会的代表大会宣布的一小时象征性罢工实现了。工人和雇员投票赞成代

表大会的决议，有二百五十万人批准了这个决议。

反动部长们现在才认识到他们已经成为空头将军，甚至在劳动人民当中他们自己的支持者也抛弃了他们。他们把唯一的期望寄托在贝奈斯总统身上，希望他不致接受他们的辞职，因为他还在犹豫中。

在2月25日，即星期三的一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送致总统一个函件，其中提到自己的立场，并指出共产党代表不能同力图破坏共和国的那些部长进行谈判。在这一天的下午，广大的群众聚集在布拉格的文采斯拉斯广场上听候总统的决定，因为总统邀请总理于下午四时到总统府会谈。当哥特瓦尔德出来的时候，向聚集的群众宣称，贝奈斯总统业已接受了他的关于建立一个新政府的全部建议。

尽管在最初贝奈斯总统的观点和工农的观点不同，但他还是帮助了加强这个国家工人和农民的权力。至少他还没有背离共和国的法律和宪法。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能够权衡自己政党的力量和劳动人民的力量。他衡量了后者的力量并顺从了大多数人的愿望。

在斯洛伐克，二月事件的情形也和捷克地方一样。2 月 26 日民族阵线所属全斯洛伐克行动委员会成立，但民主党的领导方面发生了变化，该党改组成为斯洛伐克复兴党，党的领导权掌握在一批没有同前格林卡法西斯组织合作过的人手中，并清洗了反动分子。

在 3 月 10 日的制宪国民议会的会议上，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总理就改组后的民族阵线新政府的政策发表了一个声明文件。声明中包括补充前政府纲领最重要部分的主要原则，由于反动部长们的怠工，过去这些部分尚未制订出来。声明中也很重视政府在选举前将要完成的一些特殊新任务，其中有几点是工厂委员会和工会组织全国代表大会，以及农民协会代表大会提出的。在这些要点当中特别着重提出的是：对所有资本家的各种企业凡雇佣人数在五十人以上者均收归国有，对所有超过五十公顷(一百二十三英亩)的大地产和所有投机买卖的土地或租佃给劳动农民的土地，均予征购。3 月 10 日以及第二天里，都在继续讨论有关政府政策的声明。在国民议会的三百名议员中，到会的有二百五十一名，而出席代

表当中有二百三十人（一百零六名共产党员和一百二十四名其他党派代表）投票赞成改组后的民族阵线政府的声明。制宪国民议会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最后制订一部宪法，这部宪法于5月9日通过，并于1948年6月9日正式公布。

“五九宪法”使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实行人民民主和建设社会主义，建立一个两个斯拉夫民族即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均享有平等权利的统一国家的事实，得以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有关作为立法机关的斯洛伐克民族议会以及作为斯洛伐克国家政权执行机关的行政委员会的条款，是宪法中提供的斯洛伐克人具有平等地位的具体表现。宪法中又明文规定保证工作权、工作的适当报酬权和休息权。共和国的经济制度的原则应该是把矿产资源、工业、批发贸易和银行收归国有，土地所有制采取“耕者有其田”的原则。保证劳动农民可以获得的私有土地达五十公顷。宪法保证保护中小企业和私人财产的不可侵犯。在这里也保证男女完全平等：妇女可以和男子一样享受教育，从事所有职业、一切职务并享受同等报酬，宪法保证同工同酬的原则。禁止任何形式的民族、宗

教或种族歧视。所有学校均须受国家的监督，一切公民均有享受教育的权利。宪法正式规定民族委员会(地方、县及大区)为行使国家主权的地方机关。虽然在战前共和国的宪法中也载有人民是国家主权的唯一来源的原则，但现在这些措施却将其从一句纯粹空话变为现实。

5月30日举行了国民议会的选举，改组后的民族阵线提出了一个候选人的联合名单。反对这个名单者均弃权投空白票。有选举资格的选民有百分之九十参加了这次选举。在七百二十万个有资格的选民当中，六百四十万(百分之八十九点三)张选票投给民族阵线，只有七十七万(百分之十点七)张选票是空白票。

6月7日贝奈斯总统辞职。6月14日在历史上著名的布拉格城堡弗拉第斯拉夫大厅，由国民议会一致通过选出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为共和国总统。第二天，提名组成了一个新政府，政府成员没有多大变动，安托宁·萨波托茨基被提名为总理，他是一个多年的工会工作者和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

在二月事件同资产阶级作斗争中，工人阶级

的统一加强了。社会民主党内的右翼分子暴露了他们从事反人民利益的活动，而左翼分子则支持共产党的政策。结果在1948年6月间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合并，这样一来，经过许多年以后，工人阶级在政治上重新又统一起来了。

两年复兴计划顺利完成之后，共和国又着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1949—1953年)。这个计划的基本任务在于，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发展机械工业的方法来改变工业结构。由于扩展重工业因而有必要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来发展整个经济，并且必须用现代化技术来装备工业、农业、运输业和其他企业。在这个基础上将可以保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提高劳动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斯洛伐克经济上的高速度发展，消除它的落后性并使其提高到捷克地方的水平，也是这些变化中的重要部分，只有通过这种办法才能使两个民族的平等成为现实。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是五年计划的基础。农业生产还大大落后于工业，因为战前共和国的大规模生产受到大地产的限制，因而不能满足工业和全体居民日益增长的需要。此外，小农场又无法利用机械化的手段

和现代化农业技术：根据苏联的经验，唯一的出路就是逐渐把独立的农户联合成农业合作社。

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了，包括发展重工业和机器工业的基本任务。1953年的工业生产量，达到了计划目标，比战前最高产量的1929年超过了一倍，而按人口计算的生产则增长了一倍半，在这方面甚至赶过了象法国这样的大国。斯洛伐克的工业化特别令人满意，在这里工业生产量较比1937年增长了三倍半。将近一半的农村里建立了农业合作社，再加上国营农场在内，所耕种的农田总面积共占全国农田数目的一半左右。计划经济消灭了失业，并大大提高了居民的购买力。由于这些良好的成果，因而能够在1953年6月间实行币制改革，取消配给制和实行自由市场买卖。

在纳粹占领的几年期间，文化生活严重衰退，但1945年以后的时期标志着科学、艺术和教育方面一般都有异常的进展。许多新的学校建立起来了，大学学生的人数有了极大的增长。在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斯洛伐克科学院和捷克斯洛伐克

农业科学院的主持下，创立了一些新的科学研究所。

在科学进展方面最大的功绩应归之于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院长兹丹涅克·聂耶德利院士（诞生于1878年）。他对民族学术方面巨大的贡献是他的最著名的一些作品：胡斯派赞美诗史、作曲家贝德里赫·斯美唐纳和兹德纳克·菲比赫的研究、《国家剧院中上演的歌剧史》、关于弗·伊·列宁的一本书和为数众多的文学研究作品（即指论波哲娜·聂姆错娃和阿洛伊斯·伊拉塞克的著作），以及《捷克民族史》（尚未出版）。

在文学方面有一些艺术上成熟的作品，例如大诗人维特兹拉夫·聂兹瓦尔（卒于1958年）在战后写的诗歌（包括著名的《和平之歌》），小说家马丽·普伊曼诺娃（卒于1958年）和她的小说《十字街头的人民》、《玩火》、《生死斗争》，作家瓦茨拉夫·雷萨契（卒于1956年）的小说《自投罗网》和《战斗》。在年轻的一代中，最著名的有扬·德尔达（诞生于1915年）和他的故事集《静静的栅栏》和长篇小说《在你手掌心中的一个城市》、卡列尔·普塔契尼克（诞生于1921年）和他的小说

《1921 年诞生》，扬·奥特切纳谢克(诞生于 1924 年)的《突飞猛进》、《公民布里赫》和《罗密欧、朱丽叶和黑暗》，巴维尔·科果特(诞生于 1928 年)和他的戏剧《爱情的自白》。

在当代捷克作家当中，尤利乌斯·伏契克(1903—1943 年)获有特殊的荣誉，这个反法西斯的英勇斗士被纳粹分子处死了。他在纳粹监狱中所写的《绞刑架下的报告》是捷克书籍中译成外文的创最高纪录的一本；截至 1957 年为止，这本书已经在三十五个国家里译成了七十一种语言，并出版了一百五十七版。伏契克替报刊写的文章以及文艺评论也得到高度评价。

在艺术方面，一些艺术家在长期以来的传统基础上创作的作品获得了最优越的成果：在雕刻方面有卡列尔·波科尔尼(1891 年生)，卡列尔·里狄茨基(1900 年生)和文森特·马科夫斯基(1900 年生)；在油画方面，卡列尔·斯沃林斯基(1896 年生)和阿道夫·萨布兰斯基(1909 年生)；版画方面有西里尔·博达(1901 年生)。

1945 年以后的捷克音乐也不逊于战前所获得的声誉。在国外最著名的作曲家是阿洛伊斯·

哈巴(1893年生)和瓦茨拉夫·道比阿什(1909年生)。至于在音乐会演奏方面，荣誉应归于斯美唐纳、弗拉赫和雅纳切克的四重奏、吹奏乐五重奏和捷克九重奏等室内音乐大合奏。

捷克电影《皇帝和面包师》、《约翰·胡斯》、《新战士且看今朝》、《1921年诞生》、《毁灭的发明》和《狼穴》等影片曾在数届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在许多地方得到观众们的好评。依里·特恩卡(1912年生)的木偶片进一步提高了电影艺术的水平，特恩卡在战前原是一位有名的插图画画家。

战后斯洛伐克文化的进步与捷克地方堪称并驾齐驱，在某些方面甚至还走在更前面了。在斯洛伐克作家和诗人当中我们可以提及作家佛朗蒂舍克·赫契科(1905年生)和他的小说《木村寨》，卡塔丽娜·拉扎罗娃(1914年生)和她的小说《黄蜂窝》，以及诗人沃依特赫·米哈里克(1926年生)和米兰·赖奇亚克(1926年生)。

在这里产生了油画家马丁·卞卡(1888年生)、拉狄斯拉夫·古德纳(1921年生)和玛丽亚·麦德维茨卡(1914年生)，版画艺术家文梨特·格洛兹尼克(1919年生)和奥勒斯特·杜巴依(1919

年生)，以及雕刻家鲁道夫·普里比什(1913年生)。

斯洛伐克电影方面最新制出的优秀影片有《故乡》和《四十四》。

在音乐方面，欧根·苏洪(1908年生)的作品，例如《克鲁蒂纳伐》，扬·齐克尔(1911年生)的歌剧《扬诺西克》和《别格·巴雅齐德》，都是国际上著名的杰作。斯洛伐克音乐家协会创办了一个卓越的管弦乐队。

*　　*　　*

当杰出的政治家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于1953年3月逝世时，安托宁·萨波托茨基被选为共和国总统，组织新政府的重任则落在威廉·西罗基身上，他是斯洛伐克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的领导人。1954年国民议会选举以后，这个新政府仍继续执政，在这次选举中民族阵线的候选人获胜。

在1954—1956年间，主要的政治和经济问题是克服国家发展道路上的某些困难，这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遗留下来没有解决的。首先就是社会主义工业和农业之间的严重不相称，尽管过

去业已获得很大成就，但农业生产基本上仍停留在战前的水平上，因而成为更快地提高生活水平途中的障碍。于是1954年6月的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使国民经济均衡发展作为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方针，今后生活水平的提高将有赖于这一方针。这是1954年和1955年经济计划的首要任务，而这个计划的作用则是为第二个五年计划(1956—1960年)准备条件。在1956年6月共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讨论了这些指示，这也给公共生活中进一步实行民主化的措施提供了刺激因素。捷克斯洛伐克经济的任务在于，要在按人口计算的产量方面，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第二个五年计划是走向实现这一目的的道路上重要的一步。

在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时代，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共和国同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牢固同盟和友好团结，保障了它的安全。捷克斯洛伐克继续竭尽一切努力以求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发展和加强同非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科学和文化的友好接触。

*　　　*　　　*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捷克斯洛伐克历史的整个过程，我们可以不断看到某些显著的特征：争取民族生存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热衷于社会正义，以及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意识上要求民主。在这个民族的历史上有一些最著名的时期都是致力于追寻这些高贵的目的：胡斯运动、1848年的革命中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民族复兴运动，以及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在人民民主的捷克斯洛伐克，这些目的得以实现了：长期以来追寻的民族独立已经获得了，劳动人民有了保障可以不断提高生活水准，工作权得到了保障，失业和饥饿的冷酷威胁业已清除，人民变成了国家的真正统治者。

大 事 年 表

公元

600	萨莫帝国(624—659 年)
800	大摩拉维亚帝国。默伊米尔一世(830—846年)；腊斯提斯拉夫 (846—870 年)； 斯瓦托波勒克(870—894 年)。波希米亚封建主义的肇始。
900	大摩拉维亚帝国的沦亡(约当 906 年前后)。初期封建捷克国家的形成：瓦茨拉夫公爵(921—929年)；波列期拉夫一世和二世(929—999年)；布拉格主教区的建立(973 年)。
1000	匈牙利王斯蒂芬一世统治时期 (995—1038 年) 斯洛伐克依附于匈牙利；捷克君主弗拉底斯拉夫二世获得国王的称号 (1085年)。斯拉夫文学和文化的地位为拉丁文化所篡夺。艺术方面罗马风格获得发展。
1100	捷克国家为争取脱离神圣罗马帝国取得独立而斗争。捷克贵族地位增强 (世袭领地所有权进一步巩固)。
1200	十三世纪的经济发展(殖民地化、城市的成长、

银矿的开采)。普什米塞二世(1253—1278年)的侵略政策;阿尔卑斯地方的征服;捷克国家成为一个大国。瓦茨拉夫二世(1278—1305年)。

1300 捷克对波兰和匈牙利的统治。普什米塞王朝灭亡(1306年)。卢森堡王朝继承时代(1310—1347年)。约翰王(1310—1346年)。西里西亚和卢齐支归并于捷克国。布拉格大主教区的建立(1344年)。查理一世(1346—1378年)。创设布拉格大学(1348年)。捷克文学的各个部门获得进步(斯蒂特尼的托马斯)。歌德艺术繁荣的时代。布拉格成为欧洲最先进的城市之一。查理成为神圣罗马皇帝。

1400 瓦茨拉夫四世(1378—1419年)。杨(约翰)·胡斯(卒于1415年)和胡斯革命运动(1419—1434年)。特罗茨诺夫的扬(约翰)·杰兹卡(卒于1424年);塔波尔(城市同盟)的建立(1420年);大普洛科普将军(卒于1434年);卢森堡王朝的西吉斯孟(1436—1437年)。波迭布腊迪的依里(1458—1471年)。匈牙利王马特菲·柯尔文发动反对乔治的十字军。彼得·赫尔契茨基(卒于1460年)。"捷克兄弟会"的建立。波兰雅格隆王朝(1471—1526年)。捷匈国家的兴起(1490年)。捷克人文主义的开端。晚期歌德文化。

1500 雅格隆王朝封建寡头政治的统治。贵族和市民

之间的斗争。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被选即捷克王位(1526—1918 年)。市民阶级反哈布斯堡运动被敉平(1547 年)。路德教派的传播。市民文化的发展(人文主义与文艺复兴)。"兄弟会"的文化活动。杨·布拉霍斯拉夫。反抗侵犯斯洛伐克边疆的土耳其人的斗争。

1600 鲁道夫二世(1576—1611 年)把神圣罗马帝国京都迁至布拉格。新教徒贵族的反抗。颁布宗教自由令(1609 年)。捷克各等级反哈布斯堡王朝的起义(1618—1620 年)及其在白山战役的失败(1620 年)。三十年战争(1618—1648 年)。卢齐支割并于萨克森(1635 年)。强制恢复天主教化。捷克地方的瑞典军。扬·阿莫斯·考门斯基(科明尼乌斯;卒于 1670 年)。哈布斯堡王朝邀聘外国贵族前来。捷克农奴的群众起义(1680 年)。捷克地方手工制造业的开端。巴罗珂艺术。

1700 玛丽亚·泰勒莎(1740—1780 年)和约瑟二世(1780—1790 年)的寡头专政政体。纺织工业和玻璃制造业的成长。西里西亚沦亡于普鲁士(1763 年)。捷克地方的大规模农奴起义(1775 年)。农奴制的废除(在捷克地方为 1781 年;在匈牙利为 1785 年)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兴起。哈布

斯堡政府的德意志化政策。捷克地方和斯洛伐克的民族运动。捷克音乐扬名海外。

1800 拿破仑战争(1801—1813年)。哈布斯堡君主国的梅特涅反动专制政体。工业革命的开端。捷克地方和斯洛伐克民族运动的开展。斯洛伐克文学语言的勃兴。捷克地方和斯洛伐克1848年的革命。弗兰茨·约瑟一世(1848—1916年)和专制政体。奥地利在与意大利战争中(1859年)的失败。立宪政体的开端(1860年)。1866年奥地利败于普鲁士。1867年奥匈国家二元体制的建立。斯洛伐克的匈牙利化。工人革命运动的成长。1878年捷克-斯拉夫人社会民主工党成立。十九世纪下半叶捷克地方重工业和机械工业的发展。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初端。本世纪下半期在文学和文化方面的成就。斯美唐纳和德沃夏克获得世界声誉。

1900 工人为争取普选权而斗争。1905年俄国革命的影响。赢得普选权(1905—190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奥匈国家的瓦解和1918年10月28日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成立。为共和国今后的发展方向而斗争(1918—1920年)：资产阶级获得胜利。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成立(1921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1929—1934年)。捷苏同盟条约的签订(1935

年)。法西斯威胁日甚(在共和国的德意志居民区和在斯洛伐克)。康纳德·汉伦领导下的纳粹运动抬头:企图使边境地区脱离共和国。1938年9月29日德、英、法、意四大国的慕尼黑协定。

所谓“斯洛伐克国”宣告登场(1939年3月14日),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被纳粹德国占领,成立所谓“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1939年3月15日)。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伦敦的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缔结同苏联的条约(1941, 1943年)。斯洛伐克民族起义(1944年8月)。苏军解放捷克斯洛伐克。1945年5月5日的布拉格起义。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成为民族阵线新政府中的主要力量。共产党在1946年的议会选举中获得胜利。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政府(1946—1948年)。资产阶级政党二月事变的失败(1948年)。第一个五年计划(1949—1953年)。

索　　引

三　画

四 画

五 画

六 画

七 画

八 画

九 画

十　画

十一画

十二画

十三画

十 四 画

十 五 画

十 六 画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捷克斯洛伐克史纲
作者＝
页数＝２２３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书名
目录
正文